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編

2025年

人文社會學系

金筆獎

書寫暨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



目次

	頁數
114年金筆獎合輯序	1
獲獎名單	3
得獎作品	
 學術論文組（碩士班）	
【優等】	
香蕉種植如何成為山村資本累積的一時之選：中臺灣淺山地區的土地利用初探	廖鎮邦 5
【優等】	
面對面思考：為什麼我只能研究鴿子，而不是埃及聖鸚	張琦昀 27
 學術論文組（高年級）	
【特優】	
從女性主義觀點初探中職啦啦隊文化	戴靜茹 45
【優等】	
都市中寵物狗的飼養現況與挑戰：以美里市為例	翁佑瑄 62
【優等】	
科學城大學：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內的半導體行動者看大學、半導體世界的關係	林于婷 88
 學術論文組（低年級）	
【特優】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天的實錄》中以馬廷奈家為例比較台灣鄉村的社會型態	蕭廷睿 107
【優等】	
朝鮮女足的強盛——威權統治下的自然性	王泓鈞 112
 文藝創作組	
【特優】	
在雨中尋回的溫暖	王泓鈞 118
【特優】	
濁水溪上的渡口與渡船媽	廖鎮邦 124

114年金筆獎合輯序

羅烈師

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系主任

我必須先無畏地讓模糊臨到我的雙眼，再調動任一邊的目鏡，使兩個視窗合而為一，形成原視窗大小兩倍大的視窗，最後再轉動焦距，讓眼前的輪廓現形並被細節填滿。

——張琦昀

114 學年度金筆獎計有七位同學共九篇作品，經簡美玲老師、潘美玲老師、林秀幸老師、吳映青老師等老師評審，在 22 篇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金筆獎是本系課程學習成果的展現舞台，這些作品來自同學碩士論文的初步成果、修習課程的期末報告、東南亞移地課程田野調查、參與政府計畫以及個別創作等成果。

七篇學術論文包含香蕉種植、埃及聖鸚、寵物、職棒啦啦隊、朝鮮女足、半導體工作者、鄉村文化等主題；兩篇文學創作與繪本則為雨中趕火車的老人與渡口的媽祖。這些作品涉及跨物種、女性以及跨領域等主題，呈現了本系一貫的教學發展特色。

寫作是人社系同學重要的基本能力與競爭力，可以表現在各種不同的文類中，金筆獎之設立即鼓勵同學積極鍛煉自己的書寫能力。廖鎮邦與王泓鈞兩位同學同時獲得學術論文與文藝創作組兩組獎項，可見足以駕馭兩種不同文類，令人激賞。特別是廖鎮邦更以繪本獲選，是本系金筆獎開辦以來的首例，特別值得一提。

張琦昀的論文以初學操作望遠鏡的經驗，細膩而生動地展開自己被主要報導人「分派」到鴿或聖鸚研究的故事。望遠鏡從兩個視界調整到一個世界的過程是琦昀整篇文章的隱喻，用以表達自然與人文的合一，亦即「我不是外於世界，而是在世界上做一位更好的伴侶物種」。我喜歡這個隱喻，跟琦昀借來表達超越與悠游於不同文類書寫的美麗期盼。

獲獎名單

學術論文組（碩士班）

【優等】

廖鎮邦 / 香蕉種植如何成爲山村資本累積的一時之選：中臺灣淺山地區的土地利用初探

張琦昀 / 面對面思考：爲什麼我只能研究鴿子，而不是埃及聖鸚

學術論文組（高年級）

【特優】

戴靜茹 / 從女性主義觀點初探中職啦啦隊文化

【優等】

翁佑瑄 / 都市中寵物狗的飼養現況與挑戰：以美里市爲例

林于婷 / 科學城大學：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內的半導體行動者看大學、半導體世界的關係

學術論文組（低年級）

【特優】

蕭廷睿 /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天的實錄》中以馬廷奈家爲例比較台灣鄉村的社會型態

【優等】

王泓鈞 / 朝鮮女足的強盛——威權統治下的自然性

文藝創作組

【特優】

王泓鈞 / 在雨中尋回的溫暖

廖鎮邦 / 濁水溪上的渡口與渡船媽

得獎作品
(學術論文組)

學術論文組 (碩士班)

【優等】

香蕉種植如何成為 山村資本累積的一時之選： 中臺灣淺山地區的土地利用初探

廖鎮邦

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作品介紹

本文探討了中臺灣淺山地區的土地利用模式，分析族群遷徙、土地利用、農業技術、地理環境如何形塑地方社會。論文關注香蕉產業在日治時期與戰後如何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並透過「間作」技術，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促成農民的短期資本累積。

透過歷史文獻、田野調查與產業資料分析，本研究呈現淺山農業與區域發展的互動關係，並關注香蕉種植如何塑造當地社會文化，如「包仔粿」與「阿拉粿」等傳統食物如何與香蕉產業產生關聯。因此「包仔粿」與「阿拉粿」也成為甌脫之地——中臺灣沿山地區，族群界線消弭的最佳例證。

一、問題意識：中臺灣淺山地區的土地利用

在臺灣農業發展史中，土地利用模式因權力知識、地域環境、民變戰亂與社會互動的不均地理而展現多樣化面貌（David Harvey 2008）。中臺灣的淺山地區作為連接平原與高山的重要地帶，不僅擁有多樣的自然資源，還承載了特殊的土地利用形式。同時也因為地形的崎嶇不平，接納不同族群的甌脫之地，為當地農業發展注入有別於平原的發展模式。

日治時期，臺灣大規模的農業改造工程以嘉南大圳為代表，八田與一的成功開通不僅改變了嘉南平原的水利狀況，還引入了「三年輪作制」，即一年種稻、一年種甘蔗、一年種雜糧。這種制度利用不同作物對水量需求的差異，達到節約大圳總用水量的效果。同時，這樣的作法大幅擴大了原本狹窄集水區旁的可耕地範圍，擺脫過往看天田、雷公埤的地貌，成功改善了耕作條件，使嘉南平原的作物結構更加多元化，成為臺灣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起點（陳鴻圖 2000）。

然而，與嘉南平原的現代化大規模農業不同，中臺灣淺山地域因地勢限制，難以依靠大規模水利工程，因此農民需要在有限的條件下發展具有地方適應性的土地利用模式。那麼，為什麼明明知道中臺灣淺山地區缺乏穩定的灌溉水源，還會有人想前去開墾耕種呢？

這促使筆者更進一步提出研究發問：「誰在中臺灣淺山地區開墾？」、「中臺灣淺山地區曾經有過哪些旱作？」、「中臺灣淺山地區與旱作作物的地理環境與物質性如何影響地方社會？」、「中臺灣淺山地區的農業技術跟平原地區的農業技術有何不同？」

這些問題促使筆者重新審視中臺灣淺山地區的土地利用變遷過程與其複雜性。因此，筆者希望透過爬梳香蕉種植在中臺灣淺山地區的歷史脈絡，分析為何香蕉種植能夠成為山村累積資本的一時之選。

二、中臺灣淺山地區，族群揉雜的甌脫之地

(一) 甌脫之地與中臺灣淺山地區歷史簡介

中臺灣淺山地區，意指北起大安溪流域，南至濁水溪流域的這片重巒疊嶂，遍布丘陵的地區。這種地形特徵，在歷史上常被稱為甌脫之地。

甌脫一詞最早見於班固《漢書》（1962：3750）。「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甌脫」最早指邊境上的土堡崗哨，後來引申為帝國無法管轄的地帶，但非如上述字面般「棄地」的不毛之地。

據葉高華（2023：18-20）揭示，高山原住民族部落大多居住在內山地區，淺山地區應為其傳統領域，作為獵場之用，並不定居在此。大清帝國統治臺灣時，象徵實際治權的所及邊界的土牛紅線，便到臺中盆地、南投盆地東側戛然而止，意即漢人政權的實質治理能力僅到這裡。

因為再往東擴的淺山地區，不僅擁有不定時會出草的番害，也有著恙蟲病、瘧疾……等熱帶疾病——常被史書統稱的瘴癘之氣（鄧相揚 2002：50）。

「當時南投縣內陸地帶，集集、水裡、信義等都是瘧疾嚴重流行之地區，此些地區位於森林茂密的環境裡，地勢低窪使得瘧蚊滋生容易，加上生活環境與衛生環境落後，瘧疾的流行在此地區成了一項常見的事」（張婉菁 2003：41）

這種地形利於人群的躲藏，也不利於帝國管轄。因此一如施添福（1996）在〈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所揭示，清帝國沿土牛設隘，除了防止生番下山出草之外。這些在此奉帝國之命在此戍邊的有力之家，也會成為在此屯田的人，不但一定程度的控制或壟斷紅線界外的物資交換，也潛移默化的擴展了漢人屯墾的實質範圍，加強了清帝國對於甌脫之地的治理能力。

日治時期「……把1895年之前清廷所列為界外的番地的中央山脈、花東縱谷一帶的原住民反抗，做了比較的徹底的『征服』，並且把他們移住到較可以監視的地區，讓他們學習日文與現代教育，同時，轉化他們的生產經濟方式，放棄粗放農業與狩獵，轉而從事定點的水田耕作，給他們的土地叫做所要地。」（張茂桂 2003：224）。這時中臺灣淺山地區，才開始被國家機器踏入，來自島外的政權至此真真切切地，在此擁有治權。一隻看得見的手，也默默的伸了進來。

「資本現在已經開始向具有共產部落制度的蕃地敲門。近年來政府的措施，是使高山蕃頻向山麓平地移住。蕃地林野一方面因這些高山蕃社的下山政策而獲得自由；另一方面，經由區分調查，為殘存蕃社設立保留地，分成社有地與官有地。如此獲得之官有地，或作官業利用，或撥作民業。於是，森林產物採取與鳳梨栽培等資本家的企業得以興起。結果，資本征服臺灣全土。」（矢內原忠雄 1985：28-29）

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的建設與集集支線的鋪設，即是資本征服內山的痕跡！

這也重構了此地的族群組成、地理環境與產業樣貌，「一位在昭和三年從新竹竹東舉家遷徙來到水里的阿伯回想到當初來到水里的景象：『……本來水里咱記勒所在攏是「溪」，攏總是一勒大溪，所以名稱是「水裡坑」，那因為記勒溪當時阿沒水庫ㄟ水固定在流，做大颱風就卡大水，謀做颱風就卡謀大槓ㄟ水，所以人就可以住，可以種菜啦、種香蕉啦來生活！……』」（余立海口述稿，轉引自張婉菁 2003：35）

據《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記載，臺灣客家話當中的坑有兩個意思，第一個坑，意指兩山中間的凹陷，也就是山凹處。第二個坑意指山間因雨水沖刷出來的小溝渠，時常有雨水流經的山溝，意思幾近於閩南話當中的河流或者溪流，但有暗指流量不穩定的意思，不一定總是有水流。

報導人自述來自竹東，又在口述中稱「溪」為「坑」，因此可以判斷對方

是客家人。因為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的興建，讓原本有水的溪埔地乾涸，得以耕作，吸引外地人來此移墾。

集集支線更是在運載完，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的機械之後，成為統治者與資本家一同攫取山林資源的觸手。東勢林場、四角林林場、丹大林場、萬大林場，抑或臺北帝國大學實驗林……等，族繁不及備載的諸多林場或稱林區，逐漸遍布淺山地區與內山地區。

戰後，著名的林業鉅子孫海開設的振昌木業，便是標得前述的丹大林區伐木權，促使大量的林業相關人口往返淺山地區的水里坑——車埕與內山地區的林區內，淺山地區的水里坑——車埕因此成為中臺灣最重要的林業中心，時人稱之小臺北。現今日本明治神宮的鳥居，即是來自此時期的丹大林區。

同時退輔會也將隨蔣氏政權流亡來臺的一部分退伍士兵，安置於淺山地區就地拓荒開墾，曾以「啞巴村」登上人間雜誌（陳斐雯 1986：78-91），實質上位於南投名間的彰化農場新民分場，即屬此類。

因此，中臺灣淺山地區從大部分人口零星稀疏的棄地地域到族群揉雜的地域，這種地域性質的轉變，其關鍵歷史進程是在大清帝國劃設土牛到日治時期的征服。

(二) 族群再移民：誰？什麼原因？搬到中臺灣淺山地區

在漢人屯墾的實質範圍逐漸擴張之下，平埔族群面臨番地盡失的局面，為求生存發起四次大遷移：第一次大遷徙，中部平埔族群往蘭陽平原移動；第二次大遷徙，中部平埔族群集體往埔里盆地移動；第三次大遷徙，在中部平埔族群移居蘭陽平原後，壓縮到原本噶瑪蘭族人的生存空間，造成噶瑪蘭族人南下至奇萊平原；第四次大遷徙，臺南、高雄一帶的西拉雅族，往臺東移動，與當地卑南族人交涉無果後，從大武北遷到大庄一帶。

在這其中，特別是中臺灣平埔族群往埔里移動，規模最大。「第二次大遷徙則發生於1823年，中部平埔族集體向埔里盆地移民，除了洪雅及道卡斯參加者較少，中部平埔族群幾乎參與……」（CH Lee 2018）

南投縣中寮鄉人陳彥斌（2023：83-84）曾在回憶集，「稱母親是『伊呦』，不是只有我家兄弟，番子巴庄我的這一代，有七八成都是這樣稱呼，而距離番子巴庄才幾公里遠的鄉親寮街道的同學，稱呼母親都是媽媽……我開始懷疑『伊呦』是洪雅族人對母親的稱謂。」再綜合其自述第七代父系祖先居住於南投縣名間鄉萬丹社，可以判斷萬丹社的洪雅族人移入南投中寮丘陵的平林仔平原。

除了帝國主導的漢人有力之家的族群再移民以外，民變、戰亂，也是讓客家再移民，進入內山的其中主因。據陳逸君（2017）所撰《社會動亂與信仰：探討雲林詔安客與天地會的關係》一文揭示。天地會事件對張廖姓的直接影響之一是大量遷移至臺灣，集中於雲林的西螺、二崙及崙背地區。張廖姓後裔在臺灣族譜記錄中，部分有參與天地會跡象，但因怕受牽連，祖籍地不願明確留下相關資料。

筆者即為張廖姓詔安客，南投祖厝為圖上的桃米坑，即在林爽文於大里杙之戰敗逃後的行軍路線上。再對照《臺灣舊地名之沿革》一書：「乾隆五十三年，清廷平息爽文役後，實施屯番之制，今中寮鄉平林溪兩岸的溪谷平原〔即平林仔〕……招佃人墾荒以徵租……乾隆年間，來墾者有福建省漳州府南靖縣李明敏、詔安縣吳財乾、田有秋、田瑞永，龍溪縣吳思昌等人」（洪敏麟 1984：457）

可確認筆者家族定居桃米坑時間，早於清帝國實施屯番之制，有高機率應是林爽文的天地會殘部。

林爽文事件後，也使得中臺灣的人群重新分布，依自身族群集中於特定地區。「在漳泉客分類、結盟並陷入分類仇殺彼此燒毀庄社的情形下，彰化縣人

群分類的版圖亦重新調整。大甲溪沿岸淡彰分界一帶的漳人逃往大里代〔按：貓霧揀〕、水沙連（即台中盆地南半部及南投盆地），客民反向逃往大甲溪一帶，彰化縣城附近及海岸平原的泉人則逃往鹿港一帶。」（柯志明 2021：562）

其中中臺灣的內山地區，臺中盆地南半部與南投盆地，則以漳州人爲絕對多數，以東勢、新社爲核心的大甲溪一帶，則以客家人爲絕對多數。

特定的產業資源，抑是吸引族群的再移民成因。邱正略（2014）指出：「南投縣於清末開山撫番之前屬於水沙連番地，當時的客家人非常稀少。隨著開山撫番政策的推行，中部內山地區的樟腦業也隨之興盛，伴隨而來的就是一波波的客家移民遷入，逐漸形成客家聚落。」

霧峰豪紳林朝棟因戰功卓著，獲巡撫劉銘傳特許頒發「林合」墾契，准許其在中路沿山地區招佃開墾，並享有全台樟腦專賣權，從中獲取可觀利潤。爲了確保樟腦的生產與運輸安全，林朝棟修築了一條由東勢角馬鞍嶺延伸至埔里社大坪頂的官道，沿線設置碉堡與柵欄，並派遣「棟軍」駐守，兵力分爲三支隊伍：前哨隊駐紮於馬鞍嶺，中哨隊駐紮於北港溪，左哨隊駐紮於水長流，形成完善的防衛體系。這間接促成了台中東勢客家人，從新社一帶越過頭拒山，著此官道移墾南投國姓。

綜上所述，中臺灣淺山地區的族群再移民當中的族群組成，包含受限史料而面貌未清的中臺灣的平埔族群、奉命戍邊的漢人有力之家、躲避戰禍的漳州人與客家人、起義失敗潛伏山中的客家流民、養贍埔地的漢人佃農、伐樟製腦的客家移工、舉家遷徙移墾溪埔的客家移工、定期往返淺山內山的伐木工人與木材商、流亡來臺的中國退伍士兵。

三、 中臺灣淺山地區產業特徵：環境如何塑造當地產業

中臺灣淺山地區的崎嶇不平，又充斥瘴癘之氣，在金雞納霜隨日本殖民在臺灣普遍推廣之前，該區域內適合耕作，又能夠形成聚落的地方不多。

從林爽文事件後，大清帝國以屯番養贍埔地，作為沿山族群空間部署的新秩序。就能窺見中臺灣淺山地區足以作為新聚落移墾的養贍埔地並不多，反映該區域的資源分布呈現不均地理——隨機零散而非均勻分布，並且資源高度稀缺。這種地廣人稀的特徵，反映在當地的主要一級產業的結果，就是需要大量的勞動人口，才足以維繫生活，運轉、操持這個產業的日常庶務。

回顧歷史，從清治到戰後，中台灣淺山地帶的主要產業是閩樟製腦、砍材燒炭、採集竹筍山產下山交換、種植香蕉、椪柑、枇杷；內山地區則是伐木輸出、種植梅子、溫帶水果為主。

「那時家園只是自富州大山山脚下延伸到濁水溪的一片雜木林。父親帶著陳家家族開始墾荒，先將雜樹砍下，燒炭賣錢，清出的土地種上蕃薯以糊口。以蕃薯葉與野溪旁的銀合歡葉餵豬，再以豬糞製成堆肥以改良土質。山脚下有日本人留下的小圳，每年農閒期則導入濁水溪的污泥以增厚表土。慢慢地，這些充滿大小石塊的荒地成為一畝畝田地，可以種稻、種香蕉。在香蕉價格良好的五十年代，所有的土地都種滿香蕉……山區人家生活更窮困，沒有土地可種稻，只有翻山越嶺挑著竹筍和山產與平地人家交換糧食。」（陳加忠 2017: 34）

這些產業都是需要大量體力勞動，放伴換工的勞動密集產業，墾荒、伐木、砍柴、燒炭需要人丁興旺，最好整個村子都同心協力的做，容易形成單一的規模化產業地景。

「日據時代水里ㄟ香蕉最……勝ㄟ時代，香蕉最勝就系水里這帶，水里這條線，規山隆開捆（開墾）種香蕉，套卡信義、上安、郡坑囉隆總系，

所以冬席ㄟ香蕉系透卡頭社那一方面隆總系種香蕉。簡單說，記麥ㄟ檳榔園就系那時準ㄟ香蕉園！」（余立海口述稿，轉引自張婉菁 2003：66）

據余立海的描述，滿山遍野的香蕉，景象猶如如今水裡坑的檳榔地景。可以想像，放眼望去，山坡上掛滿了一串串金黃的香蕉，四周盡是香蕉田與香蕉樹的單一規模化產業地景。

我們也能夠從臺中香蕉產地鳥瞰圖得知，1938年之前的中寮曾經與水裡坑，同為淺山地區香蕉產量最高者，多達20萬籠。亦是臺中香蕉產地產量最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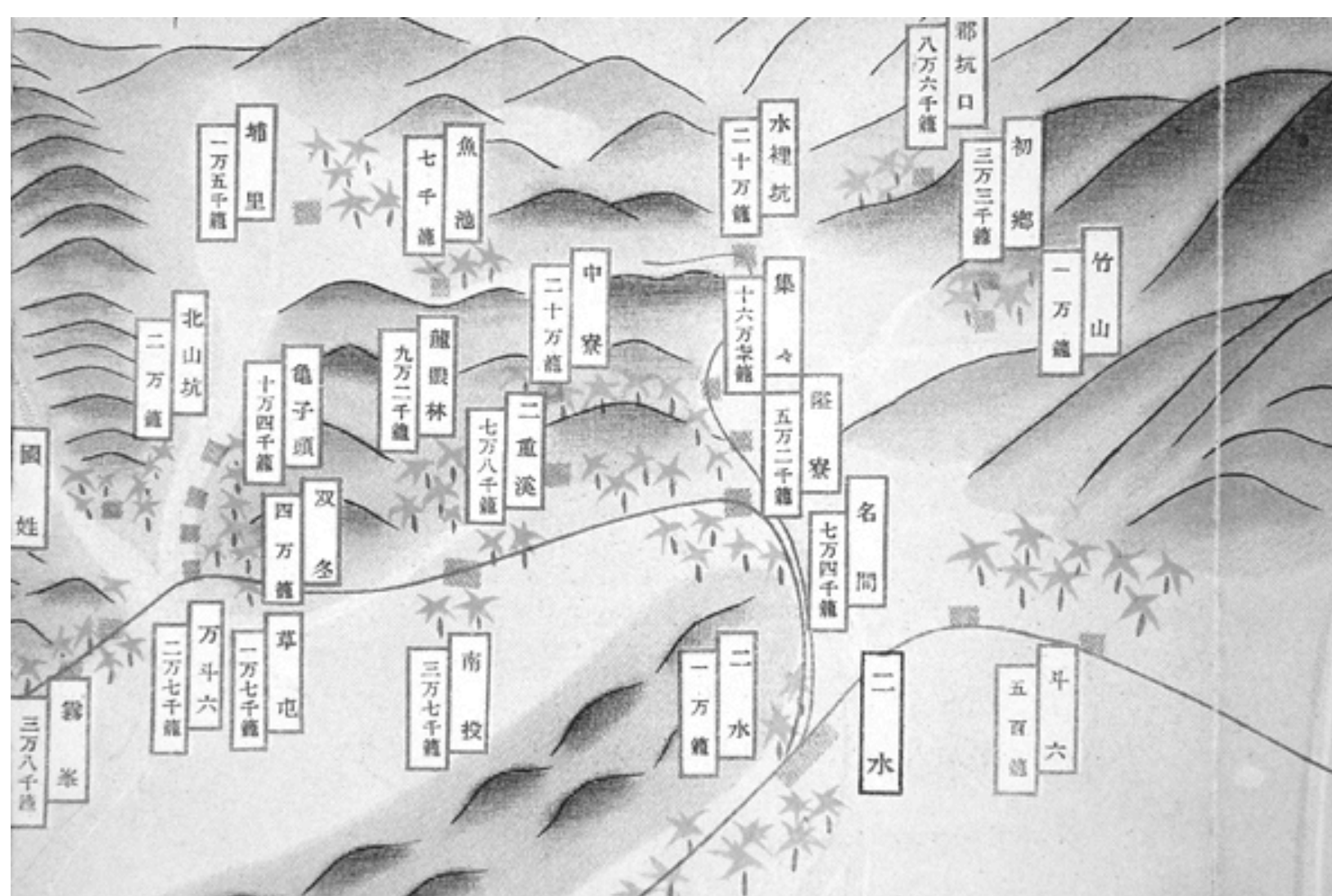


圖1 臺灣バナナ鳥瞰圖（部分）

圖片來源：轉引自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1938，《台灣香蕉》。

不同於平原運輸方便，淺山崎嶇不平，用人力把這些農產挑出去交換糧食，更是一大考驗外。這樣地廣人稀的地方，平均每個聚落能以地方自產糧食涵養的定居人口數量，必然低於平原。

因此其實高度仰賴外來的流動人口，支撐當地的主要一級產業。

「……每100公斤是600元上下，農民挑100公斤香蕉到集貨廠到貨，

就是一般勞工一個月薪資……經濟的起飛也使中寮人口大增，1967年人口數達25,720人，而撰寫此文時的2023年，中寮鄉人口是13,733人。幾乎少了一半。」（陳彥斌 2023：58、171）

這些外來人口擔任的職位，通常具一定技術門檻，呈現高度的專業分工，難以轉移拓展用在地方的其它一級產業。因此當地方的主要一級產業的匱乏時，不甘心淪為產業後備軍的他們，通常會選擇流動，再次逐水草而居——像是無樹可砍的伐木工人、沒有樟樹可製腦的腦丁、沒貨可載的貨運司機。

「這些流動的人口中，又以伐木的技術工為最，這種伐木的工作並沒有辦法短時間被訓練，它是需要一定的技術操作能力才有辦法運行斧鋸來伐木，或者說，這需有一定的經驗才有辦法判斷木材如何搬運、疊架、運送……等等。因此，伐木施做的技術工都需從外地請來，這些人往往跟台灣的宜蘭、嘉義、新竹、豐原……等地有著相互的關係；這與日據時期及率先開發的宜蘭太平山林場、嘉義阿里山林場、豐原八仙山林場、竹東林場鹿場大山、花蓮木瓜山林場等地之伐木事業有著緊密的關係。由於這些地方在日據時期已經開始生產大量的林木，林木的經濟生產在此地區培育了許多以林木產業為生的技術人員，經驗與技術的養成亦促使這批人大量往其他林木砍伐的城鄉流動。」（張婉菁 2003：59）

當這些勞動密集產業蓬勃發展，將會帶來運輸的突破，從公共、單一、定時變成私人、多元、隨時，這些提升輸出當地物產量體的方式，會促使這些交通不便的山村聚落彼此整合，形成一個通往平原都市跨地域的運輸網絡，並藉此迎來現代化。這些運輸方式，也成為山村資本累積不可或缺的重要且關鍵的工作崗位。

「『除了用貨車載運香蕉，在魚池鄉頭社盆地那裡種植的香蕉也有用「犁仔甲」托運的方式：香蕉用專門裝香蕉的米籬（長、直較高，與一般裝米用的米籬上寬下窄不同）裝起來，香蕉疊起來以後大概到阿嘛棍（脖子）的高度，再夠用「犁仔甲12」拖企水裡根蕉市仔，犁仔甲一車可以裝六籬（六浪，台

語) 的香蕉，最多可以裝到七籬。拖告水里，抵火車頭旁的青果合作社有人負責收香蕉，他們會負責將香蕉分類，分裝，裝做一籬一籬在配火車運送出去。」(蕭建智)『水里由於火車的運送便利，因此成為當時香蕉集散的一大中心，所有水里、信義、魚池地區的香蕉都運送至水里來。所有的香蕉都運到這裡交，經過驗收、包裝後再配火車出去。』(李文潔)」(轉引自張婉菁 2003: 67; 括號是原本就有的。)

上火車後，先轉運到臺中火車站，再運送到臺中青果市場進行揀選分級。一等蕉再從臺中火車站出口至基隆火車站，從基隆港出口至韓國與日本。



圖2 台灣香蕉輸送經路一覽圖

圖片來源：轉引自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1938，《台灣香蕉》。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海洋性的貿易活動與流動的人口，帶來了中臺灣淺山地區的開發。

「反應在我們研究對象的是與之息息相關的臺灣近山社會史，是十八世紀

以來海洋貿易與流動的人口、原住民與移民者在處理土地資源時的合作與競爭、帝國行政官僚移墾社會武裝組織等等，相互形塑了一個充滿競爭的、動態的商品化社會……也就是說，海洋性的商品經濟，促成山區的經濟開發，使得雙重性的稻作、菜園、養畜，以及山林產業的拓植必須同時併存，便也意味著勞動力密集地被需求。」（連瑞枝、莊英章 2010：10）

也因此，一旦地方主要的一級產業衰弱，不再有辦法提供工作崗位，抑或通往海洋貿易的運輸線路有所阻滯。這些人將再次流動移轉，他們所離開的客居地的公共運輸也將首當其衝的消滅。

「香蕉的運輸，也使中寮廣設輕便車軌道，番子巴庄也有從炭頂、後寮坑、庄中央、湖桶的頂城線。這些輕便車軌道，大都在1959年，被八七水災沖毀。」（陳彥斌 2023：171）

據朱書漢（2018：180）表示，因修繕經費過高，便以待修繕狀態一路到被拆除。但目前筆者尚未查到資料表明，輕便車軌道拆除後，對中臺灣淺山地區的產業有何影響，尚待努力挖掘。

綜上所述，中臺灣淺山地區產業特徵為高度依賴運輸線路、當地主要一級產業物產採單一規模化種植、勞力密集、大量雇用流動人口、流動人口職位技術高度專一性，難以同一技術兼職。

四、源自於樟腦需求的間作：香蕉種植如何成為山村資本累積的一時之選

（一）間作：因樟樹造林而生的農業技術

自中法戰爭的開港以來，樟腦的開發從台灣北部逐漸向中部山區擴展。清代採伐原生樟樹以提煉腦油與腦砂，但並未考量「永續」開採的問題。換句話

說，清代僅進行樟樹的砍伐，並未展開任何造林或保育樟樹的措施。

林滿紅 (1997: 74) 在《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一書中提到清政府眼光短淺，未曾有補植樟樹的計畫：「台灣樟樹的栽植，雖至日據台灣時期始盛，但在1860至1895年間，外國人已屢次提倡補植，也就是在砍下天然樟樹地區，種下新的樟樹。不過因樟樹種下之後需40至50年方能採收，所以清末台灣的人民及政府均未做過這種長期的投資。」

許彩梁 (2005: 30) 指出，1899年6月22日，總督府依據律令第15號頒布《台灣樟腦及樟腦油專賣規則》，正式確立樟腦專賣制度，並著手整頓樟腦生產事業。自1900年起，政府開始推行官營造林。然而，為確保樟腦原料能持續供應，於1907年2月28日依律令第2號公布《台灣樟樹造林獎勵規則》，以吸引民間參與樟樹造林，期望樟腦產業得以實現「永續經營」。

雖然造林成功之後，造林地將歸民間的造林者所有。但是，「……造林造到樹木長高，都是長達好幾十年的時間，這期間只能不斷投入資金，除了兼差以外無法有任何收入，要一直到樹木長到可以賣人之後利潤才開始回收。這著實是一件讓人困擾的事情，但臺灣總督府當時允許的某一項技術卻可以稍微解決這種困擾，那就是「間作制」。1900年起，臺灣總督府已經開始種樟樹，也深知造林有這個問題，直到1904年一位叫伊藤貞次郎的技手，引進了一種叫「間作」的技術。所謂間作，就是在林間隙地種植一些無礙於樟樹生長的作物，例如蕃薯、生薑、落花生、大小豆、陸稻、蔬菜等等。」（張家綸 2016）

因此發展出了一套造林經濟體系。內地資本家從統治者手上攬下土地，再將土地租賃給本島人，委託種植樟樹並照料；本島人則透過間作種植獲利。統治者有了他想要的樟樹、內地資本家擁有他想要的土地與轉租收入、本島人能擁有造林期間間作作物的所有獲利。可謂是多方共好的絕妙策略。

但是事實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當時，沿山地帶多為官有林野地，農民

多數無法獲得土地所有權，因此常越界私墾。就算從內地資本家手上獲得土地承租權，也由於短期收益的壓力，農民傾向於種植生長週期短、回報快的作物。也因為土地並不是自己的，追求收益最大化，所以耗竭地力。

「此土地在申請許可前，已經過長時間的樟腦採取、煙草及甘蔗耕作等經營，故在進行造林時，地利已經耗盡，草生地相當多，加上地形陡峭，岩石地多，造林困難。」（出自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392冊，文號1）

攬下土地，獲得造林權的大寶農林部如上回覆，對造林事業結果不滿的總督府。

（二）能快速累積資本的香蕉：短期間作的農民的最優選

然而，地力是如何耗盡的呢？這跟香蕉種植的盛行有關。

「1902年香蕉首度輸入日本後大受歡迎，結果帶動了臺灣香蕉產業的興起，不僅從平地種到了山地，甚至還改良成適合生存於山地的芭蕉。由於其分布於與樟樹生長區域重疊的中低海拔山地（約海拔1200公尺以下），加上具有容易種植、生產費低廉等特質，而且其葉片又可以幫助樟樹苗木遮蔽過於強烈的日照，因此迅速成為臺灣中部樟樹間作的主要經濟作物。當然，這也成為大寶農林部可以同時解決作業生計，也可以額外增加收入的經濟作物，所以他出租了土地，也鼓勵幫他種樹的作業人員種芭蕉。1910年、1915年和1920年頭汴坑、萬斗六甚至成為臺中〔市大屯郡〕芭蕉的生產中心。」（張家綸2016）

香蕉從種下到採收，生長期只要9個月，能夠幫助農民短期收益最大化，因此成為臺灣中部間作的主要經濟作物。

日本人稱香蕉為「高嶺之花」，這個比喻形象地表達了香蕉作為熱帶水果

的稀有與珍貴。其香甜可口的特性，對於位處溫帶的日本而言，更顯得彌足珍稀，彷彿是高山峻嶺間的稀世奇花（尾崎秀樹編 1997）一般。由此不難看出，日本人對台灣香蕉的高度喜愛與珍視，幾乎將其視為難得的珍品。

「『就是他爸爸說不要嫁給我，兩擔香蕉就比我一個月的薪水還多啊！一擔香蕉五百五，那我當老師的薪水四百八。』（陳景恆老師）『阮老伙阿（爸爸意）一禮拜割香蕉二十幾擔，一個禮拜可能有兩天或三天的香蕉期，一擔可能就一百斤，一百斤的香蕉五百五。謀愛嫁給他ㄟ！哈哈……。』（師母）」（陳景恆夫婦口述稿，轉引自張婉菁 2003：75；括號是原本就有的）

「那時我家大埔、半路寮兩山區，共有六甲多地，幾乎全種香蕉。『香蕉期』都要雇工挑擔，每期收成1000公斤以上，被視為番子巴庄的『香蕉大戶』。大哥曾轉述父親生前說：『我們家香蕉收割兩期，就可在南投最熱鬧的民族路買一間店面』」（陳彥斌 2023：58）

因此在日本人的迷戀下，香蕉為臺灣內山地區帶來可觀的外匯。如此龐大的收益，一路從日治時期持續到戰後。

（三）短暫的間作：獲利不對等的造林經濟體系

但是樟樹苗只要兩三年就能夠長的比香蕉高，由於林下缺少陽光，因此不出幾年，就必須放棄間作作物的種植。

據周林阿娥（1915 生）口述，談及小時候隨父親到台中太平區頭汴坑開墾土地，從種香蕉到入山結腦的歷程……

「我家原本住在東勢，在我六歲左右，因為家中生活困苦，阿爸有聽人家說，到東汴大湖桶地區開墾種香蕉，利潤不錯，於是舉家搬遷到這裡開墾，當

時大湖桶和茅埔一帶，多是芒草叢生之地，我們種番薯、樹薯後就開始種香蕉。日本人進來這地區，一開始是造林，並沒有煉腦油。這地區雖說是大寶的林地，但當初日本人並沒有，強迫將我們的香蕉種植的收回造林，不過他們還是在香蕉墾地上種下樟樹、相思樹，過幾年林木長大了，香蕉樹因為被樹擋住陽光種不活長不好。當時日本人請臺灣人協助看顧著林地，大家根本不敢把日本人種的造林木砍掉，所以只好放棄種香蕉，另謀出路。我爸約了兩個夥伴入深山，到石岩地區，經埔里事業區林班地範圍砍樟腦結腦油。當時砍樟樹沒有人管制，我想可能因為樹是天然的關係吧。當時山上的樟樹都很大，大約有三四尺那麼粗……我爸他們住的房子是隨使用芒草編一編蓋成的，不像現在的房子那麼堅固那條路線常有番人經過，當時的我縱使知道他們已經和漢人和好了，但是我和他們擦身而過的時候，心裡還是嚇得直發抖呢！……」（周林阿娥口訪紀錄，太平區東平里，2005年4月17號。轉引自許彩梁 2016：54）

如此，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實際上日人將農民視為除草的工具。當農民協助清除難以處理的芒草後，日人便能輕鬆獲得造林與撫育的成果。然而，隨著林木成長並逐漸形成遮蔽，農民不得不放棄種植香蕉的墾地。由於他們並無承租權，最終只能另尋生計。

綜上所述，我們除了得知，看似三方共好的造林經濟體系，仍是獲利不對等外。番薯、樹薯、生薑、落花生、大小豆、陸稻、蔬菜，也是該區域旱作的常見作物。

五、香蕉種植對中臺灣淺山社會的物質性影響：阿拉粿與包仔粿

歷史悠久又只在特定地域流行的食物，可以視為地方社會受物質性影響，產生的固著性痕跡。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探討其由來，觀察這個特定地域當中的器物變遷，進而藉此一窺當地的族群互動。

在南投有兩種近似福佬草仔粿與客家艾粿的食物，阿拉粿與包仔粿。

阿拉粿，主要流行於現居埔里的道卡斯族、噶哈巫族、巴宰族……等平埔族群當中。該稱呼音譯自福佬話「遏仔粿 (at-á-kué)」，因為需要摺疊葉子包裹粿身，閩南語稱此動作為「遏 (at)」。平埔族群對其的特有稱呼即是阿拉粿，各平埔族群對其的族語稱呼，僅是糯米製品的集合性名詞，類似英文的dumpling一詞，可以代表水餃、湯圓、小籠包，因此下述行文以阿拉粿稱呼。「埔里以外原住民族並無類似食品，同為道卡斯族之苗栗新港社亦無阿拉粿，可能暗示此食品為各族群遷徙至埔里盆地後才發展而成，亦或源頭來自噶哈巫族或巴宰族等近代居住於埔里之族群。」（南島之眼文化工作室 2021）

中部平埔族群，在邵族的引薦之下，集體往埔里盆地移民，「這些移民到南投埔里的中部平埔族人，每年必須將收成裡的5%繳納給地主埔社族人……又有一部分要拿出來作為邵族水社族人的『屯餉』」（林遠沖 2024）。直到1904年臺灣總督府取消一田二主，大租權消滅後，邵族水社族人才改以收取酒水、阿拉粿、肉品等食物，埔里平埔族群，稱此為「撿粿」。因此阿拉粿可能是因為撿粿，而發展出來的食物。

據蘇彙伶（2019）描述，阿拉粿的製法演變進程如下，「過去因為生活困苦，將糯米磨成粉後，以石頭壓密使水分流出，然後加入黑糖揉勻成團，再把糯米糰包入月桃葉中蒸熟食用，就是阿拉粿。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發展，阿拉粿有了新口味，[噶哈巫]族人會在糯米粉中加入艾草，粿團內包入餡料，再小團包入月桃葉中蒸熟，增加阿拉粿的風味。現代阿拉粿口味有鹹有甜，鹹的包蘿蔔乾絲、香菇、冬蝦，甜的包敏豆加薑……」

然而流行彰化田中（黃騰威、周佩儀 2024）、溪州（洪嘉琪 2018）、二水（蘇凌 2021）至南投的漢人族群間的包仔粿。據現有資料顯示，主要以香蕉葉包裹加入鼠麴草或艾草的粿團，只有溪州使用月桃葉為包材。粿團當中最常見的餡料是蘿蔔乾絲、香菇、冬蝦、白胡椒粉，這種餡料專稱為菜脯米，通常再加入爆香過的紅蔥頭。

由於上述阿拉粿與包仔粿兩者的相似性，包仔粿可以被認為是受阿拉粿製粿技術影響，而被包裹起來的草仔粿或艾粿。不管是客家族群、福佬族群，都會用包仔粿祭祖敬神，埔里的平埔族群也會在農曆11月15日的過年，以阿拉粿祭拜祖靈。據筆者所知在南投的漢人族群，也會將包仔粿作為中元節的孤魂野鬼、中秋與尾牙的土地公祭品。在此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平埔族群、客家族群、福佬族群互動的痕跡，與相互涵化的結果。

透過香蕉葉取代月桃葉，並且融入各族群的文化當中。在此我們可以觀察到中臺灣內山地區族群紛雜的人們，共同受香蕉產業的物質性對該區地域文化的影響。

六、結論

中臺灣淺山地區，是個族群紛雜，由族群再移民組成的社會，主要再移民動力為政治壓迫、產業需求與生存策略。族群組成包含受限史料而面貌未清的中臺灣的平埔族群、奉命戍邊的漢人有力之家、躲避戰禍的漳州人與客家人、起義失敗潛伏山中的客家流民、養贍埔地的漢人佃農、伐樟製腦的客家移工、舉家遷徙移墾溪埔的客家移工、定期往返淺山內山的伐木工人與木材商、流亡來臺的中國退伍士兵。並且因為地理環境，而有高度依賴運輸線路、當地主要一級產業物產採單一規模化種植、勞力密集、大量雇用流動人口、流動人口職位技術高度專一性，難以同一技術兼職……等這些產業特徵。

在中臺灣的淺山地域，農民盛行使用稱為「間作」或「寄種」的種植方式。這種方法將較快收成的作物種植在田溝，而較慢收成的作物則種植於田畦。這樣的配置一方面彌補了慢收成作物生長期內的收益空白，另一方面也有效利用了土地資源與水源的分配。

這種農法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日治時期。當時沿山地帶多為官有林野地，農民多數無法獲得土地實權，只能依靠細緻的耕作方式提高產出。此外，由於短

期收益的壓力，農民傾向於種植生長週期短、回報快的作物。香蕉作為一種快速收益的作物，便成為農民的首選。

香蕉的大規模種植，創造了該地域獨特的物質性，透過香蕉葉取代月桃葉，並且融入各族群的文化當中。在此我們可以觀察到中臺灣內山地區族群紛雜的人們，共同受香蕉產業的物質性對該區地域文化的影響。

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其他作物的生產模式，以及這些模式如何塑造地方經濟與社會結構，為我們理解農村發展提供更多啟示。

參考文獻

朱書漢，2018，《運轉臺中：臺中火車站與周邊設施之發展（1903-2017）》。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

林芳渝，2013，《臺灣中部枇杷農作的生產與銷售——以時間地理學的視角》，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林滿紅，1997，《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聯經出版社。

林遠沖，2024，〈道卡斯、邵族人重現「撿粿」儀式還原歷史記憶〉。《原視新聞網》，7月15日。<https://news.ipcf.org.tw/131569>，取用日期：2024年12月30日。

邱正略，2014，〈腦丁、隘勇與客家移民——埔里、魚池比較研究（1875-1945）〉，《興大人文學報》。臺中：國立中興大學。

南島之眼文化工作室，2021，〈紅瓦厝的阿拉粿〉。《國家文化記憶庫》，8月10日。<https://cmsdb.culture.tw/invisible/EEF9BC42-C051-4E07-B1EB-9C728397E650>，取用日期：2024年12月30日。

- 施添福，1996，〈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收錄於《臺灣史論文精選（二）》，臺北：玉山社。
- 柯志明，2021，《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臺北：中研院社研所。
- 洪敏麟，1984，《臺灣舊地名之沿革》。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洪嘉琪，2018，〈有人佇咧毋一包仔粿〉。《我愛溪州I Love Hsichou》，2月10日。https://love-hsichou.blogspot.com/2018/02/30-2018-tshi-khak-ah-kue-1_10.html，取用日期：2024年12月31日。
- 班固，1962，〈匈奴傳〉。頁3750，收錄於《漢書》卷94，據清光緒26（1900）王先謙《漢書補註》刊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
- 張茂桂，2003，《社會學與臺灣社會》，〈族群關係〉。臺北：巨流。
- 張家綸，2016，〈林業家的難題：日本時代的臺灣芭蕉、蕉農與抗爭〉，《故事》，1月19日。<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taiwans-plantain-banana-farmer-and-struggle-in-the-japanese-era>，取用日期：2024年12月31日。
- 張婉菁，2003，《水裡坑林業地景與生活空間之社會建構》，嘉義：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彩梁，2005，《太平地區山坡地土地利用變遷之初探》。台中：靜宜大學生態學系碩士論文。
- _____，2016，《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坑休閒農業區香蕉產業資源解說手冊》。臺中：臺中市太平區農會。

連瑞枝、莊英章，2010，《客家·女性與邊陲性》。新竹：交大出版社。

陳加忠，2016，《竹山陳家的故事》。台北：白象文化。

陳彥斌，2023，《山城番子巴：我的故鄉我的家》。臺北：玉山社。

陳斐雯，1986，〈等天一亮，太陽依舊會照耀在這大同農場上〉。《人間》
13：78-93。臺北：故鄉出版社。

陳逸君，2017，《社會動亂與信仰：探討雲林詔安客與天地會的關係》。雲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詔安客家研究計畫——詔安客原鄉生活文化的追尋。

陳鴻圖，2000，《嘉南大圳對土地改良及農作方式之影響（1924-1945）》。
《國史館學術集刊》1：187-223。

黃騰威、周佩儀，2024，〈彰化田中陳吳貴足阿嬤的包仔粿〉。《雙口呂文化
廚房》，4月2日。<https://siangkhaulu.com/blogs/52>，取用日期：2024
年12月31日。

葉高華，2023，《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

鄧相揚，2002，《台灣的心臟》。南投：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

蘇 凌，2021，〈【菜市人生場】二水，鐵路不轉人轉〉。《鄉間小路》，1
月15日。<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51351>，取用日期：
2024年12月31日。

蘇彙伶，2019，〈噶哈巫傳統飲食-阿拉粿〉。《國家文化記憶庫》，無日期。
[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d=217841&indexCode=Culture_](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d=217841&indexCode=Culture_Place)
[Place](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d=217841&indexCode=Culture_Place)，取用日期：2024年12月30日。

CH Lee, 2018, 〈邦聯之後，平埔族群大遷徙〉。《原視界》，11月8日。
<https://insight.ipcf.org.tw/article/55>，取用日期：2024年12月24日。

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1938，《台灣香蕉》。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1985，《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帕米爾書店。

尾崎秀樹編，1992，《中國商工地圖集成》。東京：柏書房。

David Harvey（大衛·哈維）著，王志弘譯，2008，《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臺北：群學。

學術論文組 (碩士班)

【優等】

面對面思考：為什麼我只能研究鴿子， 而不是埃及聖鸚？

張琦昀

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作品介紹

本文為作者初次參與調查外來入侵種埃及聖鸚的田野工作，嘗試回應來自生態背景報導人對跨領域研究的疑問。文中我會藉由伴侶動物鴿子的對照，同步思考聖鸚與人的關係。其次，我將以三個田野故事為例，分別以一般人的觀點以及Haraway提出的伴侶物種概念分析多於人的關係，兼論及聖鸚的機會主義者身分。最終我除了會說明自然與文化二元如何主導本文問題意識的產生，也會指出伴侶物種概念會這麼回應本文的問題意識：我不能簡單地說我要研究其他存在者，意即我不是外於世界，而是在世界上做一位更好的伴侶物種。

我初試啼聲的田野，是參與生態公司的埃及聖鸚¹ 巡查工作，然而我頭一次參與，就疏於準備重要的工具——望遠鏡。他們一邊以望遠鏡工看對岸的狀況，一邊對於人文科系的生態菜鳥，飛越領地跨足到自然，研究聖鸚，由衷地向我預告：「我們的工作就是常撲空。」（2024/10/28 阿杜），並遞上另一個多準備的望遠鏡讓我親自體會。起初我沒有調整眼距及焦距，就直接將雙眼望入左右兩個目鏡，不管閉起任一隻眼睛，回應我的僅有各一邊的模糊色塊，也就是說我什麼都看過了，卻也什麼都沒看清楚，甚至不知道自己正撲向什麼。使用望遠鏡作為田野的第一堂課緊接著展開，我必須先無畏地讓模糊臨到我的雙眼，再調動任一邊的目鏡，使兩個視窗合而為一，形成原視窗大小兩倍大的視窗，最後再轉動焦距，讓眼前的輪廓現形並被細節填滿。當單一圓形大視窗映現清晰的影像時，我不再感覺自己在觀看，反倒像被包含進自然的供應，無需額外創造對觀看一方的想像巡。既然我不用再耗費心力進行聯想活動，那麼面向對方，並接受他以任何方式展現自己，豈不是更容易？因此本文希望帶大家回歸我們身來就已具備的能力——面對面，而回歸的過程就像調整望遠鏡一樣，需要先練習面對我們目前習慣的觀看方式，才能再調整回原先就在我們身上的可能性，所以我一樣繼續推進初次田野的後半段經過，先從意識到他人習慣觀看我的方式開始。

面對聖鸚的難以捉摸，移除工作者轉而建議我另一條學飛的路徑，即藉由與不穩定的自然相對的人，去捕捉更確定的關係。他們以自身觀察鴿子與衆多人互動的經驗，建議我研究與人有長遠歷史記憶與關係的鴿子²。基於報導人對我的想像與設定，我被分類為適合研究與人關聯的動物，而含混不定的自然界則要交給自然科學領域的他們，因此我勢必要回應「為什麼我只能研究鴿子，而不是埃及聖鸚？」。以下我將帶上於淡水河兩岸河濱公園的田野以及在文獻上蒐集的經驗材料，搭配一副左、右目鏡各象徵自然與文化的望遠鏡為分析作具。Descola（2011）指出將自然與文化對立的二元思想，在研究方法與組織上的分疏，導致了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分割，用研究物質現象與道德現象的中介情境變得非常困難。自1990年代左右開始，越來越多的人類學

¹ 以下皆簡稱聖鸚。

²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以及《臺南新報》的文字記錄，鴿子為通訊目的而引入臺灣，日本政府透過報紙對民衆宣傳飼養鴿子當寵物，爾後，愛鴿者也在日本政府的鼓勵下成立組織，舉辦鴿子的長距離競速活動，並且在中日戰爭開打後，部分鴿子被收編至軍隊內作為書信的傳遞者。近期鴿子多作為賭注、娛樂的賽鴿來飼養。報導人對鴿子的印象主要放在人對鴿子的依賴，比如他們提到慣於餵食鴿子是某些人的心靈寄託，以及學生時期透過鴿會組織覓得打工機會。

家開始關注本體論的研究——即對存在本質的多種經驗與理解進行探討與理論化，像是 Holbraad (2009) 認為人類學家應該追求的清晰性必須是認識論的這一觀點，與人類學思想中最具特色的特徵相矛盾，即它是朝向差異，有時稱為「他者」(the Other)，所以真正的他性必須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理解，而非認識論的角度，但是這不代表因此要取代掉認識論，Descola (2011) 就提醒人類學應當是要去理解所有的存有論——包括西方的自然與文化二分，究竟是怎樣從全人類理應是共通的實踐出發，卻在不同時間、地點達成了各自的不證自明性 (Descola 2011: 63-68)，然而分類方法即使避免以自然/文化二元對立作為解釋基礎，它們仍然是某種形式的分類 (或如布魯諾·拉圖爾在2009年評論德斯科拉和維維魯斯·德·卡斯特羅之間辯論時所說的「類型」)，因此 Paolo Heywood (2018) 強調重點不在於本體論又落入哪一種分類中，而是在民族誌與理論之間的相遇中產生新的分析形式，這種方法所生成的事物，無論我們是否稱之為「本體論」，總是來自於與差異和他性相遇的特定情境 (Henare 等 2006 ; Holbraad 和 Pedersen 2009 ; Pedersen 2012) 。

我將於展開飛行練習的期間，借助 Haraway 提出的伴侶物種概念，學習調整望遠鏡的眼距及焦距為自然與文化合一的本體論模式。首先，我選擇攜帶研究鴿子的提議，藉由伴侶動物鴿子的對照，認識聖鸚和鴿子如何被放在一般人將自然與文化分開的視角。其次，我將以另外兩個田野故事為例，分別繼續以一般人的觀點，以及本文的核心概念——伴侶物種分析多於人的關係，兼論及聖鸚的機會主義者身分。最終我除了會說明自然與文化二元如何主導本文問題意識的產生，也會指出伴侶物種概念會這麼回應本文的問題意識：我不能簡單地說我要研究其他存在者，意即我不是外於世界，而是在世界上做一位更好的伴侶物種。

一、兩個望遠鏡視界：鴿子與聖鸚的異中之同

我們是何時開始喪失與生俱來不費心力的能力，換得一種更為複雜，但是卻又看不清楚的觀看方式？這就要先從兩千年前至今，持續影響人類思想框架

的柏拉圖說起。柏拉圖透過將真實存在與抽象和永恆連結，取代破碎、轉瞬即逝的感官經驗，從掌握秩序與確定性獲得在世的慰藉。柏拉圖的思想對於我們最顯著的影響，就屬我們以原理原則而非內容來理解事物。我們透過原理原則的分離與階層化，讓事物長出相對於我們，具極端差異的心智骨幹，聖鸚先是在生物分類法鳥綱的層次就與哺乳綱的人類分離，再來因鸚科依賴濕地，被含納進水鳥類群；同時他會攝食水中生物以外的食物，因此被標誌上機會主義者的身分，使他成功在非原生地台灣的野外繁殖，威脅到鸞科鳥類的棲息空間，而被列入外來入侵種，移除工作者進而透過這些原理原則生成管理辦法。在人類具有理智，自然就一定沒有心智的二元論思維中，「文化」與「自然」是主要二元對立的例子，文化意指人類，自然意指人以外的其餘生物。自然/文化將人與其他動物區分開來，並高舉人類在其他所有一切之上，主宰者人類誠然能為聖鸚繫上管理的關係，更不用說是與人關係親密的鴿子了。由自然、文化各站一邊的世界觀，時常將我們的思考限制於任一邊，我們不是將自然作為對象的思考他，就是脫離自然（世界）思考文化。

相對於鴿子在日治中期引進台灣，他們幫助人傳遞書信，甚或成為家庭的一分子；埃及聖鸚自1979年引入台灣，即作為動物園的展演動物，和大眾生活的距離之遙不只限於空間，更是出於在記憶中與電腦選字上對鸚字不容易提取，而導致其名字遭簡化或遺忘。當聖鸚成功在野外繁殖，成為外來入侵種之時，大眾多半急於跟他劃清關係，像是以其顏色與外型類比作惡的象徵巫婆鳥、死神鐮刀，乃至於不同群體的移除工作者，對聖鸚施以抑制生命的作為，截至今日許多人都在想像一個沒有聖鸚存在的台灣。這裡呈現動物與人親疏關係的對照組，我再進一步以伴侶動物的概念來思考。伴侶動物出現在1970年代美國獸醫界與相關領域的醫學研究，伴侶顧名思義是家庭的陪伴者或是服務於人，一般來說人不會宰殺、食用他們的伴侶，比如毛小孩、鳥朋友。很明顯的，脫離人類的管理並且在野外壯大族群的聖鸚，屢屢展現的不馴，使他必然被排除在伴侶動物之外。儘管如此，人類的雙手仍然持續介入自然，接下來我們先從聖鸚如何促動台灣人的生活，又反過來被壓抑行動談起。

鳥友是一個異質性的群體，這裡指手持望遠鏡賞鳥，以及配有高倍率鏡頭，俗稱大砲的拍鳥人士，他們身上的工具表明遇鳥時的習慣。自從外來入侵種聖鸚出現在工具可及的範圍內，他們不再只是以雙眼捕捉或是較勁拍攝技巧，而是開始一致地拍下照片，並且增加標記位置，上傳平台的動作（圖 1）。移除工作者據以透過鳥友紀錄下的一隻隻聖鸚，找到聖鸚位於紅樹林的巢區位置。紅樹林是淡水河水文的一環，多數人在兩河的活動以船運為主。最常取用河川資源的漁民，深知紅樹林又多一層危險，不曾踏足至紅樹林內。

我沒進去過.....我之前載一個研究生到紅樹林裡面架攝影機，那天是陰天，而且已經下午了.....他在裡面迷路了二、三個小時才出來.....那個漲潮起來是很危險的！（2024/10/17 阿志）。

除了研究生親臨聖鸚位於紅樹林的巢區，移除工作者為了移除聖鸚，也開啓在紅樹林裡頭工作的前例。他們仰賴紅樹林樹幹的支撐，跋涉於黏膩的泥灘地，取得聖鸚的蛋或是遭槍擊中的成鳥屍首（圖 2）。移除工作者除了生態公司人員外，原住民與公務員也持槍先後加入。2019 年起原住民持合法獵槍狩獵的範圍從傳統領域向外延伸到都市、農田、濱海、濕地（圖 3），而公家機係的巡山員³則開始接受例行性的槍枝培訓，增加巡山以外的巡查⁴及槍枝移除聖鸚的工作（圖 4）。

以下我會先以移除工作者走入紅樹林執行移除工作為例，呈現自然與文化二分的思考。Ingold (1996a)⁵ 早已揭示理解世界不是建造，而是參與，不是對世界的看法，而是在其中採取一種看法，因此我將邀請 Haraway 陪伴我們一起來到移除工作者的工作現地，接續介紹如何在疊合自然與文化下，採取伴侶物種的看法。

³ 目前全台僅台北工作站的巡山員在台北河濱公園實際參與巡查及槍枝移除，其餘各縣市接受培訓者現階段只作為儲備人員。

⁴ 2024 年起聖鸚的野外個體已遭抑制，但族群分散停棲點不易掌握，因此在移除的最後階段需仰賴團隊密集巡查，發現個體或巢區立即安排予以移除。資料來源：114-117 年度強勢外來入侵種移除防治及復育計畫。

⁵ Ingold, Tim., 1996a, "Human worlds are culturally constructed: against the motion (I)" in *Key debates in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pp.112-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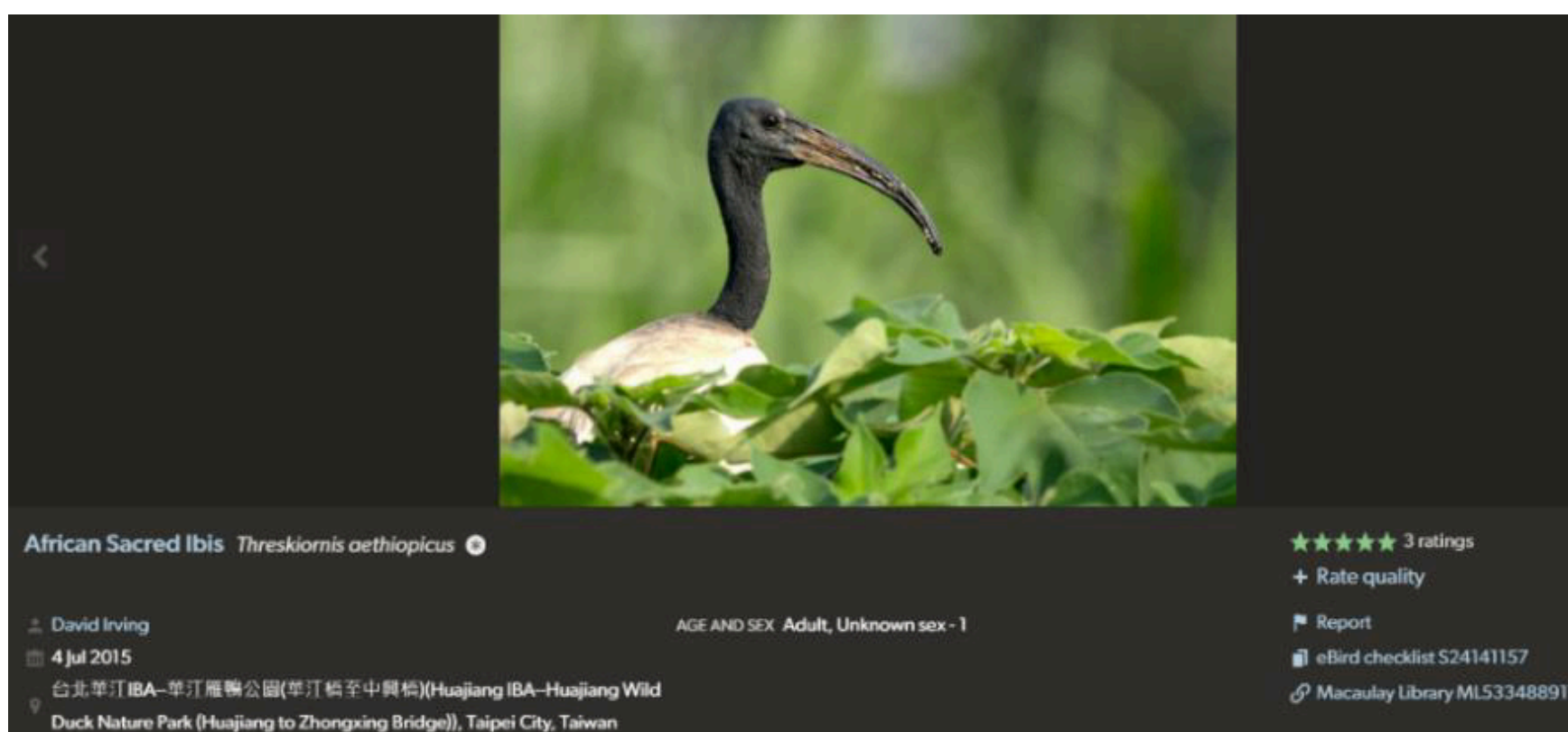


圖 1 鳥友上傳的高清聖鸚照片，左下角為標記的拍攝地點。

圖片來源：ebird



圖 2 由於泥灘地軟爛，移除工作者只能以跪爬方式前進。

圖片來源：《臺北。埃及聖朱鷺攝影集》，公務員報導人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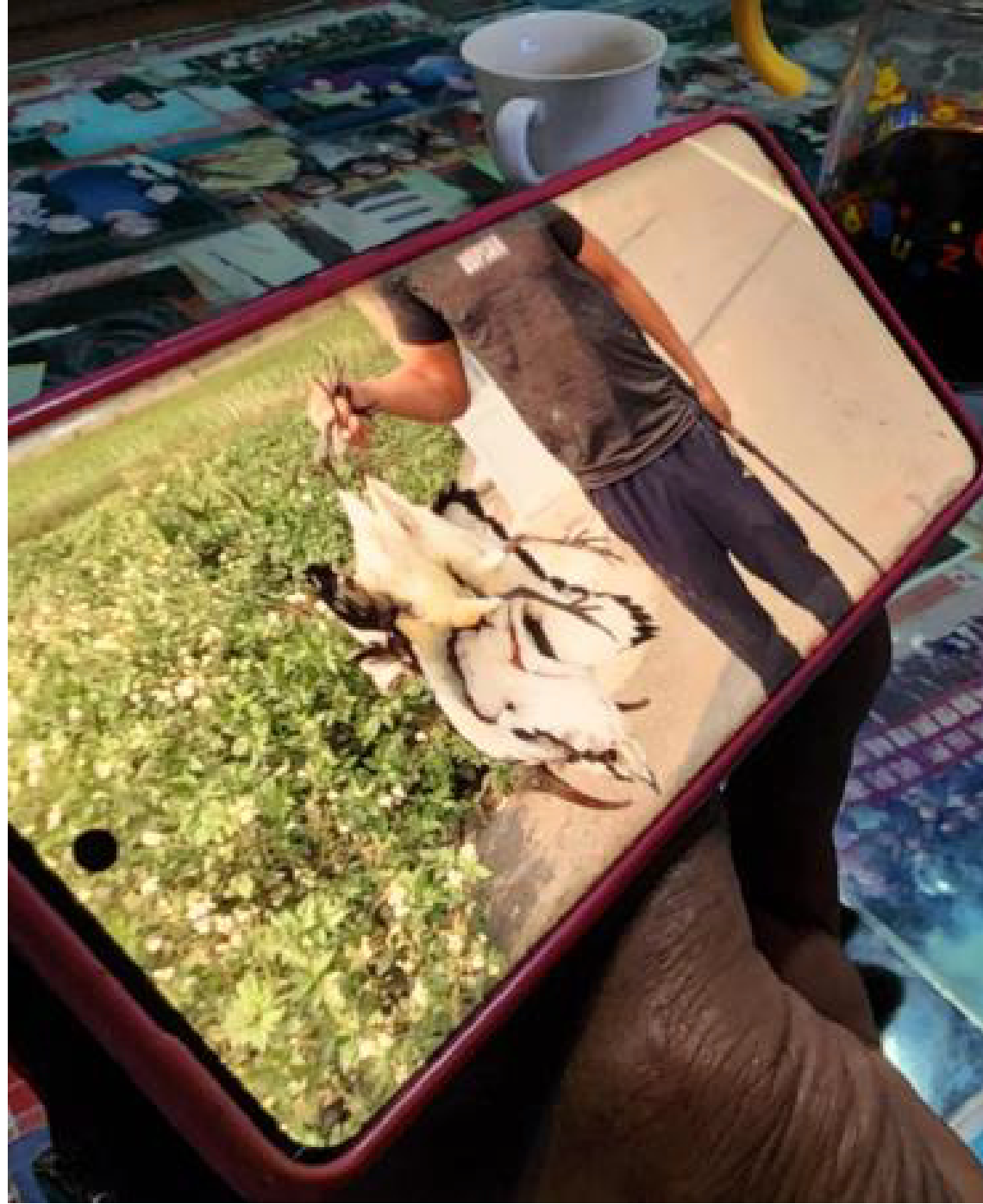


圖3 獵人集中在田間撿拾的聖鸚屍首。

圖片來源：筆者翻拍報導人相片



圖4 巡山員在淡水河畔巡查。

圖片來源：筆者攝影

二、人如何在紅樹林行走？

關渡地區自1978年起，由零星水筆仔的支持根凝聚泥沙，減少風浪對泥灘地的侵蝕，鞏固住的泥灘地，進而讓胎生苗可以落地生根，拓殖形成紅樹林景觀⁶。每年4、5月部分水筆仔的莖內組織成爲星天牛幼蟲的食物，使紅樹林乾枯死亡，遇外力容易折倒，與此同時死亡的相反——新生也在發生，鷺鷥科、聖鸚選定紅樹林的樹冠層開始營巢繁殖子代。9月接獲移除聖鸚巢穴任務的移除工作者們，待颱風過境後，返回工作崗位。他們一行人在進入紅樹林前，看準漲退潮時間，以雨鞋取代布鞋，並且將收闔的情感和布鞋一同滯留於陸路，透過穿戴上理性角色與專業的裝備，始能踏進紅樹林微微敞開的窄門。他們首先眼觀四方，比對颱風前後的紅樹林景觀，颱風的風雨爲紅樹林留下一地交錯層疊的斷枝，其中較粗的是水筆仔的木材，明著較細的是鳥類的巢材，另外也有部分攔腰折斷的倒木阻擋去路。評估過環境的狀況後，領路的移除工作者接著搜尋從前在水筆仔樹幹綁上的紅色布條，朝布條的方向斟酌著如何跨出每一步，在親身示範踏進單純的泥灘地會陷入難以脫身的泥沼後，領路者引導大家轉而踩上鋪有斷枝的地方（圖5）。所有人以單手握住不遠處未受摧折的水筆仔樹幹，將自己的身體拉近水筆仔，從水筆仔各部分得到支撐住身體的力量，才能讓後腳向前再跨出一步。矛盾的是，他們有時握住的水筆仔會應聲斷裂，使他們險些絆倒，或者是水筆仔如果以橫躺之姿出現在眼前，卻又成爲他們繼續前進的阻礙，所幸枯枝容易攀折，他們將攀折下來的部分鋪在前方的地面，其餘較粗的主幹則往兩旁擺，於是一條通往聖鸚營巢區的路，在泥灘地、水筆仔、星天牛、鳥類、風和人的無意間拼接中堆砌出來。整體來看，他們不特別爲達成任一方的目的而行動，當然他們更不是爲了達成身體都要在泥灘地之上的共同目標，而是在不是全好也不是全壞的關係中，互相承載起彼此生命的重量，且看泥灘地與紅樹林，沒有泥灘地在紅樹林（胎生苗）之上，就不會有紅樹林在泥灘地之上。

⁶ 本文的水筆仔爲數量僅一棵時使用，多於一棵的水筆仔皆稱爲紅樹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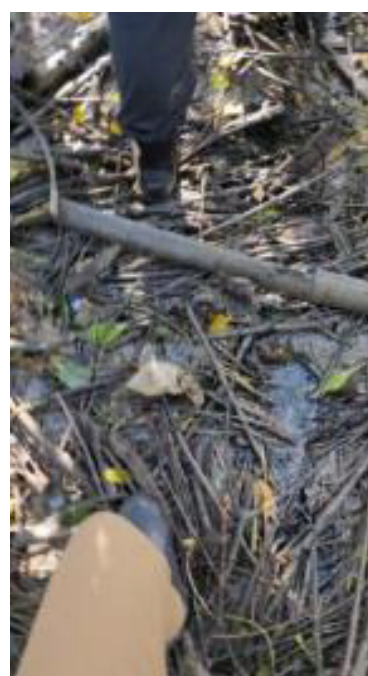


圖5 移除工作者行走在紅樹林的斷枝上。

圖片來源：筆者攝影

(一) 未經調整的兩個望遠鏡視界

以上的田野故事，讓我們先大膽地置放於望遠鏡調整前的自然及文化視窗前，並邀請生態公司移除工作者體會眼前的視野，他們對於眼前所見並不陌生，因為至少在高等教育的自然科學就已開啓嚴明的訓練。他們透過老師的提醒以及研究方法的掌握，學習不讓情感介入生物體，讓情感歸文化；可用肉眼看見的個體生命活動歸屬自然，這般訓練也是一種篩選機制，沒辦法遏阻文化滲進自然的人就會被篩出，「生科有篩選機制，所以學期中有同學休學、轉系可能就是不大能適應情感不能放下去。」（2024/12/20阿淇），由此可見成為自然科學專業者，已經不只是學科的篩選，更是介入自然前，再確認代表文化的自身身分。

再確認過移除工作者熟習前述望遠鏡的使用方式後，我們來看他們究竟看到了誰？他們從自然視窗望過去的，是模糊到難以區分差異的泥灘地、水筆仔、星天牛、鳥類、風，統稱非人類或物；文化視窗望過去的則是有著人類形體的自己。接下來他們繼續手持望遠鏡，告訴我們究竟看到什麼？他們先是習以為常的閉起望進文化視窗的眼睛，才開始說明熟悉的演化生物學對生物相互適應的看法，簡單來說就是物種間，經自然選擇出特定的生物特徵以適應彼此，像是鳥類由基因衍生出的生物特徵——巢形，必須得是有結構的，才能在不比地面有更多的支撐下，安置於紅樹林的樹冠層上。當移除工作者猶豫地張開望進文化視窗的眼睛時，他們除了掙扎於溢出既有的自然專業領域外，也會

因為人類並非以紅樹林為生活棲地，不具有由自然選擇出來的特定特徵，而使人與紅樹林的相互適應不能成立。為了要鼓勵他們多分享一些文化視窗的看見，因此就請他們暫時跳開學科的框框，繼續以個人經驗說明為什麼人能在紅樹林行走？

前段的發問點名紅樹林是人固定的互動對象，顯然增進移除工作者的回答信心，他們講起國中時期的物理學習，順帶讓我們一起回憶帕斯卡原理。原理指出只要接觸面積越大，擠壓到泥沼的力量就會越小，越不會陷進泥沼，因此移除工作者在行走時，才要使用腳下及手邊的水筆仔斷枝，使腳步被大面積給接住。進一步分析他們望進兩視窗的視界，文化一邊是一顆人類的大腦，儲有分類、分層的概念化知識，比如帕斯卡原理、面積公式；自然一邊是只能計算得出長與寬乘積的模糊塊狀物影像，以挪去生物特徵，換得使自然穩定下來的數字，由此可知智人所在的世界是許多數字符號的集合，可以測量並計算出固定的結果，以致於辨明塊狀物是否為水筆仔顯得不重要，只要是任何可以擴大面積的物，就能讓人踩著向前行，簡單的說就是人用理智在紅樹林行走。對於前述扼要的小結論，移除工作者除予以肯定外，也想趁機申明自己不只有一顆外人看來只裝滿書的大腦，「獵人都說我們是死讀書」（2024/10/17阿杜），因為當移除工作者在行走時，也經常遇到超越理智所能計算的事件。最直接的經驗就是尋求倚靠的水筆仔的乾枯與否，是計算不出來的，所以每當要握住水筆仔樹幹時，多人團隊就是一項優勢。他們只要倚靠領路者的指導，就可以透過觀察與模仿，了解手該落在哪一棵紅樹林身上，也就是說此時在他們的文化視窗裡，出現多於一位的移除工作者，他們透過社會互動學習行走的技巧；而另一邊的自然視窗同樣還是那一模糊的塊狀物，可能是給人支撐用的竿或其他輔助工具，總之由人決定它是什麼，不是什麼，因此在這個由人主導的世界，只要向他人學習，就可以在紅樹林行走。最後讓我們在移除工作者們爭論著某幾次照著他人做，卻跌個半死，質問「連人都不能信任了，還能信任誰？」暫時打住。

總的來說，未經調整的望遠鏡視界，呈現代表文化的人主導自然，也就是世界的樣子。人類穩定世界的過程，動用了心智以及更多的人，對世界施以符

號固定住，但是自然的難以駕馭依舊如常發生，並且成爲縈繞在心理的問題，就像移除工作者最後的質問，透露被人拋回世界，只會迎來孤獨與無力感，難道我們得在被拋離世界後，才能解除被自然禁錮的魔咒嗎？因此接下來我想邀請大家，和我一起向 Haraway 學習將望遠鏡的兩個視窗疊合爲一個視窗，並且調整焦距，參與進移除工作的現場。

(二) 調整後的一個世界

Haraway 不著急於調整望遠鏡，反而先輕盈地接住移除工作者的質問，請我們從面向移除工作者的脆弱性出發。進入紅樹林的移除工作者恐在密林中迷失方向，或是陷進泥沼無法脫身，而伴隨著漲起的河水被淹沒在水下，尤其不斷地直視聖鸚的死亡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使得死亡無時不離他們很接近，因此他們試圖從有限的肉身出逃，直奔腦內穩固的知識基石或者同樣脆弱的他人身邊⁷，聽從大腦和他人的指示，爲自然標記一種必然可以幫助到自己的用途，然而遠超過人理解之外的自然，始終再提醒我們死亡與相隨的孤獨仍在。Haraway 這時遞上調整後的望遠鏡，兩視窗的重疊讓移除工作者身旁多了清晰分明的非人類，我們看見孤獨的反面——夥伴關係的可能，Haraway 爲其命名爲伴侶物種。

進一步說明伴侶物種的概念，首先伴侶物種是一個比伴侶動物⁸更大且更異質的類別，它將夥伴的範圍擴及非家養的有機生物，包含田野故事出現的紅樹林、星天牛、鳥類，伴侶物種之間和人都是以一副會死亡的肉身相伴。相伴意味身體的靠近，最容易理解伴侶物種意象的動作是面對面，具體來說就是一方的凝視得到另一方的回望。爲了不讓具體動作限縮面對面的意象，讓我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你在家門外聽到家中毛小孩興奮的叫喊，是不是即使還沒看到他，你還是知道此時他濕潤的鼻子正在搜尋著氣味，而毛茸茸的尾巴正快速地擺動，趕緊呼喚他的名字回應他，所以面對面不代表我必須看到伴侶物種，而是我對伴侶物種的身體、行爲等存在本身的尊重。且讓我們繼續回到移

⁷ 「我們會在工作結束後團體閒聊……有點像集體療傷吧。」 (2024/12/20 阿淇)

⁸ 見頁30。

除工作者與水筆仔相伴的例子，移除工作者面向身體近處的水筆仔移動，他的眼前是水筆仔盤結的根系扎入泥灘地，支撐住整株樹體，以及其枝條不會沉入泥灘地裡，顯然這位夥伴跟人的形體有非常多的差異，他能以支持根在泥灘地站立得穩，卻不能移動身體；人會陷進泥灘地動彈不得，卻可以伸展四肢。問題來了，該怎麼跟這位不同於人的夥伴建立關係呢？我們會發現差異在人與水筆仔之間，都各有缺乏，藉由兩方的相互連接而構成無法站立的人，被可以在泥灘地之上的水筆仔各部分拉拔；無法移動身體的水筆仔，被可以伸展四肢的人移除阻礙身長的一部分。

以上美好的夥伴關係，似乎容不進折倒的水筆仔，讓移除工作者跌一跤的可怕，同樣都是人與水筆仔，關係可能既是美好的又是可怕的嗎？面對這個疑問，Haraway 請我們回到的不是人與水筆仔的身分，而是他們面對面的「情境」，情境說明不是只關注對象，而是面對面時發生什麼事？在樹枝斷裂與移除工作者慘摔的情境中，水筆仔這位夥伴的枝條是什麼顏色？樹皮外表長什麼樣子？移除工作者緊繃的身體有增加施力嗎？正是不斷變動的身體在該情境的相會，讓載有歷史堆疊的身體之間的差異有了改變，這時的水筆仔雖然莖部早已被掏空，但是他仍靠支持根屹立不搖；人雖然無法單靠自己在泥灘地站立，但是他的四肢可以尋求外援，就在人握住水筆仔的脆弱，而折斷樹幹墜入泥灘地，這段可怕的关系就此構成。正如我們所見，關係不是只看對象是誰，而是面對面當下激起的火花，如此關係不會只落入一組人指向美好或可怕的二擇一，而是既可能是美好又是可怕的。想必看到關係可能是可怕的，又倒退回沒有可信任夥伴的境地，於是乎我們可以做的無非是更了解伴侶物種，以更好的和他們聯繫，比如水筆仔若是枝條枯黑，樹皮裂開或不正常剝離，移除工作者就可以知道這時他的上半身是脆弱的，爲了尋求倚靠，轉而將重心壓低，改握下方的根系，或者是尋找其他的伴侶物種，但是另有即便了解，卻不易在面對面中發現的情形，像是水筆仔與星天牛過去的伴侶物種關係，構成水筆仔內隱於肉身的莖變爲中空，卻仍可能向外促成情境的發生。這也就回應到我們始終要承認自然的複雜是超越我們所不及，我們只能以局部的視角面向夥伴，並盡己所能的在差異之間促進彼此生活的可能，同時也承認不可能的發生。再一次我們要回答爲什麼人能在紅樹林行走？因爲人和伴侶物種共同構成一副「向上」

的身體，讓他能在紅樹林行走。

綜合以上，我們和其他非人物種在必然的死亡中，透過建立夥伴關係，我們面對他們的面迎接欣喜與可能的失落貫穿於其中。接下來，我們會進入2024年由移除工作者在紅樹林周圍草澤區，所拓殖出的移除工作現場——誘引站。誘引站的設立展現移除工作者對聖鸚身體、行爲的了解，但是誘引站的成果仍不如預期，因此藉由以下兩節對誘引站執行與成果的分析，我們將繼續由兩個視界到一個世界的調動練習。

三、誰創造了誘引站？

隨著聖鸚的數量減少，移除工作者轉變工作策略，改爲引誘零星個體集中於一地再進行移除，他們憑移除經驗發現相對於多數鳥類取用源自自然的食物，聖鸚還會食用非典型鳥類的食物——廚餘，其對垃圾場等不尋常覓食棲地，以及對民衆丟棄路邊剩餘食物的利用，坐實機會主義者的標籤，移除工作者因而在關渡紅樹林周圍的草澤區定置誘引站，以魚鰓、魚膽等人不會去食用的魚類組織⁹加上魚飼料，試圖以新穎的食物吸引聖鸚至紅樹林築巢繁殖。他們固定每週分趟載運魚雜、魚飼料至誘引站，定期淘汰並更換新的原料。抵達誘引站時他們先換上雨鞋，並攜上裝有魚飼料的麻布袋步入高草區，朝萬綠叢中一點藍的位置前進。所謂的誘引站就是由三個兩百公升的藍色塑膠桶，以及記錄塑膠桶動態的攝影機，再加上輔助作具垃圾夾所組成。這時桶內已有上回乘滿的魚雜，再度添上的魚飼料堆起三座小山，其中一人以垃圾夾將魚飼料搗入魚雜內，重複同樣的動作直到魚飼料穿透魚雜的表層，均勻的混合在一起爲止。

以上是移除工作者更新食物新穎的身體反覆實作（圖6），這副勞動的身體等待著那一副喜愛人類食物殘餘的身體到來，但是他們翻攪出的卻是其他新穎食物的擁戴者。最先到來的食客是肉蠅，他們早一步在人類的鼻腔充滿臭味

⁹ 以下簡稱魚雜。

分子前，嗅到美味的可疑氣息，至於移除工作者則是嗅到氣息背後的涵義「蒼蠅過來也很好 …… 會吸引其他鳥過來 …… 這個過幾天就會有味道了！」（2024/11/8 阿杜）。肉蠅的賞味工程一點也不馬虎，他的唇瓣（即昆蟲的嘴唇）和跗節（即昆蟲的腳）上都長有具化學感覺功能的纖毛，食物必須先通過其跗節上纖毛的測試，才會被其口器親嚐，此外跗節上的纖毛也是載運腐敗菌革蘭氏陰性菌的絨毛座椅，當他的腳成功觸及魚雜大陸的那一刻，就已經在為魚雜的滋味評分。顯然魚雜在肉蠅的腳感覺起來味道還不錯，他的口器接著湊上去，為了使食物變成流質再吸收，他吐出富含酶的口水以溶解食物¹⁰，加上乘著肉蠅腿部纖毛抵達的腐敗菌革蘭氏陰性菌，他們一同加速了魚雜分解的速度，並在分解中生產嗅覺新意——腐臭味，進而吸引來另一位食客，夜間活動的嗅覺型哺乳類動物溝鼠聞香而至，移除工作者對照攝影機畫面與地板留下的痕跡說道：「（地板）洞挖成這樣，應該是溝鼠 …… 我看攝影機晚上都會有東西爬上來（桶內）。」（2024/11/22 阿杜）。溝鼠為連通美食區在地面鑽出的不同孔道，使得地板凹凸不平，連帶讓魚雜桶傾斜，以至於移除工作者在攪拌時使魚雜溢出桶外，擴大誘引站於地面的範圍。最終誘引站撤除後，移除工作者翻看攝影機錄到的影像，果不期然有喜鵲、八哥、黑面琵鷺現身，但是聖鸚出沒的紀錄顯示為零。



圖 6 移除工作者每週兩次更換桶內的魚雜，添加新飼料，並以垃圾夾攪拌。

圖片來源：筆者攝影

¹⁰ Fisher, 2021, 〈被蒼蠅拜訪過的食物還能吃嗎？——來認識經常「梳理」身體的大自然清道夫！〉。《泛科學》，12月10日，<https://pansci.asia/archives/336519>。取用日期：2025年8月29日。

(一) 未經調整的兩個望遠鏡視界

移除工作者再次拿回望遠鏡，他們對於話題終於和聖鸚有直接的關聯充滿自信。誘引站想法的形成，是移除工作者在移除過程中，對聖鸚覓食環境以及行爲的第一手觀察。聖鸚會季節性利用不同的覓食棲地，除了泥灘地、農田、魚塭外，更包含了垃圾場，這些地方提供植物種子、魚類、甲殼類、軟體動物、昆蟲、蜥蜴、小型哺乳類（任永旭 2011：12），以及垃圾、廚餘等人類剩餘食物。移除工作者效仿垃圾場具固定的地點、傾倒垃圾時間及份量的人爲管理環境，再加上聖鸚的機會主義者身分，表明其改變覓食技術或飲食的頻率較高（Lefebvre et al. 1997, 1998; Nicolakakis & Lefebvre 2000）¹¹，更確定他會對新穎食物加以利用，因此操作出一個定點並定期更換魚混成物的誘引站，誘使聖鸚過來覓食。由此可見，移除工作者將聖鸚看作機會主義者身分的個體，去配對一個全然由人控制的誘引站，這麼一來誘引站便脫離了自然世界，由人設置、更換、撤除的工作時程填滿誘引站所有的歷史空隙，除了預先設定好自然視窗一邊的聖鸚，可以爲誘引站史添上一筆，其餘的物種都屬於可以被隱藏的偶然訪客。既然誘引站由移除工作者安排地點並定期更新食物的原料，理所當然是他們創造了誘引站，不過移除工作者還有一個疑惑，那就是怎麼會是一個接著一個的非目標物種來到誘引站？反而不是機會主義者聖鸚？

(二) 調整後的一個世界

這一次我們自己將文化視窗與自然視窗重疊，讓誘引站回到不只有人的世界，而是存在同樣對新穎食物好奇的肉蠅、革蘭氏陰性菌、溝鼠與其他鳥類的世界。按照誘引站從無到有的時間序，最先由移除工作者刻意在草澤區擺放了魚雜，繼之吸引肉蠅攜革蘭氏陰性菌前來，他們在長距離移動與分解食物速度的差異下，肉蠅載著革蘭氏陰性菌移動到誘引站，而革蘭氏陰性菌快速分裂的細胞，生成一群夥伴加快魚雜分解的速度。在誘引站交會的肉蠅與革蘭氏陰性

¹¹ Daniel Sol, Sarah Timmermans & Louis Lefebvre, 2002, "Behavioural flexibility and invasion success in birds." *Animal Behaviour* 63, pp.495-502.

菌成爲伴侶物種，他們共同構成新的氣味、顏色、物質狀態的魚雜，Haraway (2016) 將如同誘引站，讓物種相會的地方稱爲接觸區 (contact zone)，接觸區沒有個體加環境的概念，只有隨著伴侶物種的共同構成，成爲一個包含伴侶物種歷史的動態活躍地帶，好比說新生成的氣味分子將擴大原有的誘引站範圍，亦即接觸區的網絡向外擴散，進而牽引生活在地底的嗅覺型哺乳類動物溝鼠，溝鼠的存在雖爲移除工作者增添工作難度，卻也和移除工作者共同構成魚雜不只在桶內，也在地面的新範圍。爲過去的歷史所疊加的誘引站，以富含氣味以及鮮活的蒼蠅、溝鼠的魚雜混成物，最終吸引喜鵲等鳥類造訪。不能否認移除工作者也參與在接觸區當中，但他只能做到部分的參與，因爲肉蠅、革蘭氏陰性菌以及溝鼠也在以自己微小的一部分，參與誘引站的創造，換句話說不只有機會主義者聖鸚才會受到新穎食物的吸引，因爲在網絡中現身的肉蠅、革蘭氏陰性菌、溝鼠與其他鳥類，擾動了機會主義者的邊界，他們主動連結新穎，再爲彼此創造新穎，所以誰不是機會主義者？

四、結論

回到自然與文化合而爲一的世界，無論人或者非人都只是一副有必然終點的身體，兩副身體以本然的面貌相遇，也就是說鴿子、聖鸚與我在肉身之外的框架可以得到釋放，並可能是彼此的伴侶物種。作爲伴侶物種，我可以如何尊重他們？首先當我表示要研究聖鸚時，就需審慎對待研究二字，我不是指研究就不與尊重畫上等號，而是可以去釐清研究的內涵，以免輕易理解成以人爲中心去操弄研究對象，相反要從同聖鸚一起參與在故事中的連結同時出發，比如在泥灘地的情境，聖鸚連結到鷺鷥科鳥類，透過不單只對聖鸚，而是對雙方行爲的理解，才有可能更貼近共同構成的聖鸚行爲表現。再來便會面對如何精確理解鳥類的行爲，我們會發現在面向鳥類的同時，也意識到自身精準詮釋鳥類行爲的限制，但是這種限制將不再被歸屬於由意義之網編織的自然，最終永遠不能爲社會科學身分的研究生理解，而只是過去積累至情境當下，偏重於社會科學知識限制了理解，同時我肉做的身體不像固定不變的意義之網，反而是不斷在變動、更新，透過靈活的連結增進理解鳥類的人事物，像

是科學家、漁民甚或是一台望遠鏡。我只有在限制中承認自己是一位不夠好的伴侶物種，才能再向外連結中共同成爲更好的伴侶物種。

參考文獻

任永旭，2011，〈入侵種埃及聖鸚棲地選擇與生殖生態〉，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位論文。

李威宜，2013，〈評Philippe Descola, L'ecologie des Autres: Anthropologie et la Question de la Nature〉。《臺灣人類學刊》11(2)，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李培芬，2019，《2019 臺北市自然保護區域及其周邊環境監測計畫成果導告書》。臺北：臺北市政府委託研究計劃。

Haraway, Donna J.,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3): 579-599.

_____, 2008, *When Species Meet*.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_____, 2016, *Manifestly Harawa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eywood, P., 2012, Anthropology and what there is: Reflections on 'ontology.' *Cambridge Anthropology* 30: 143-151.

_____, 2018, "The ontological turn: school or style." Pp. 224-235 in *Schools and Styles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Matei Candea. Oxon: Routledge.

Pedersen, M., 2012. "Common nonsense: A review of certain recent reviews of the 'ontological turn'." *Anthropology of This Century* 5. http://aotcpres.com/articles/common_nonsense/. (Date visited: August 29, 2025).

Rose, Deborah Bird (黛博拉·羅斯) 著，黃懿翎譯，2019，《野犬傳命》。台北市：紅桌文化。

學術論文組（高年級）

【特優】

從女性主義觀點初探中職啦啦隊文化

戴靜茹

人文社會學系

作品介紹

2024年世界棒球12強賽冠軍賽，中華隊以4比0大敗日本隊，是隊史第一次勇奪國際賽事之冠。如此輝煌成績，在社群網路上讚美、狂歡之餘，也有人提出「終於不再只是啦啦隊附屬中華職棒」，指出近年來啦啦隊聲量似乎遠高於球隊本身。

筆者亦是困惑如何解讀啦啦隊的熱潮，是男性凝視中被性化的存在？或是個體獲得更好經濟報償的機會？其存在之於球隊、球迷，又是如何中介賽事進程與觀賽體驗？

在性別平權意識方興未艾的當代，本文試圖回顧中華職棒啦啦隊的歷史、組成、身體展演與勞動、社群互動等，扣連女性主義理論的脈動，結合二手資料與文本分析，探討個體所展現出的行動與能動，並放置回結構中給予解釋。

最後，本文將透過以上對「啦啦隊女孩」提出的理解，回歸到女性主義的終極目標——「拆解父權違建」，以提倡對運動平等、性別平等的呼籲為行動，期以建造一個以符合性別友善為願景的運動場域。

一、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生長於台南，筆者家庭的兩處住所皆位在棒球場附近，分別是歷史悠久的台南棒球場，以及甫落成的亞太棒球場。雖是無心插柳，「看棒球」卻也因此成為家庭的休閒活動之一。記憶中，主播的情緒起伏、球迷發自肺腑的嘶吼，乃至場外販賣熱狗堡的攤販，都是球賽的精彩之處。求學時期，一度疏遠了這項活動，直至稍微能應付課業後，回歸球場，卻覺得記憶中的球場不對味了。仍然是熱血奔騰，只是啦啦隊的存在主導了球賽的氛圍、干涉了應援的節奏，和十多年前的體驗相左。這種說不上失望的情緒難以言喻，上網回顧球賽的精華時，演算法也少不了推播啦啦隊女神的花邊新聞與舞蹈剪輯，一時間對球賽的悸動化為虛無。

筆者學習舞蹈多年，即便不是專家卻也略懂皮毛，看得出哪些啦啦隊員是真功夫，哪些可能是急就章，儘管如此，這也不構成「談不上喜歡」的原因，這種困惑的情緒，使筆者開始思考「啦啦隊」在球賽中的功能，深掘潛藏的厭女情結（misogyny），試圖以女性主義理論觀點，替自己梳理出這種複雜情緒的起源。

(二) 問題意識

本文試圖探討在這個性別平權意識方興未艾的時期，啦啦隊如何中介球賽進程與球迷情感？藉由分析職棒啦啦隊的歷史、組成、身體展演與社群互動，扣連女性主義理論的脈動，並分析個體所展現出的行動與能動，該如何被放回結構中看待、並且被闡述？本文將透過以上對啦啦隊女孩提出的理解，回歸到女性主義的終極目標——「拆解父權違建」，以提倡對運動平權、性別平權的呼籲為行動，期以建造一個以符合性別友善為願景的運動場域。

(三) 研究範圍

以中華職棒啦啦隊為核心，佐以中華職棒發跡史、網路媒體興起等因素的線性時間軸，討論啦啦隊女孩被鑲嵌在歷史脈絡中的發展；復次，將以身體、服裝、社群等面向，討論啦啦隊成爲一種性別符碼，在女性主義的脈動中如何被定位。

(四) 研究方法

本文將採用文本分析、並以2003-2024年間啦啦隊新聞報導的二手資料回顧，討論啦啦隊的職業本身如何成爲一種「性/別化」的存在，並酌加參考網路媒體、社群評論對中華職棒啦啦隊/員的撰文與評價進行討論，試圖提出在當今性別平權意識興起的時代，啦啦隊該如何被解讀、展演。

二、文獻回顧

性別作爲一種社會範疇，同時也是社會結構與空間互動的社會產物。運動及其組織可被視爲一介性別空間，將男性置於女性的主導地位（Shaw & Hoerber 2003）。其中，「男支配、女服從」、「男強女弱」等權力邏輯被運用在工作分配當中，再製性別刻板印象這種權力動態是透過話語、社會建構但被視爲理所當然（take for granted）的形式來創造、維持和強化。因此，分析一項體育組織中，男性的統治地位和女性的從屬地位，需要檢視產生的現象與理解歷史，回望特定性別配置邏輯的「正典性」，提出質疑或甚至挑戰。故此，首先得要回到中華職棒的發展史。

中華職棒（下簡稱「中職」）成立於西元1986年，成立初期，啦啦隊的組成與於球迷觀戰文化相互作用，是市民社會在長期噤聲後，終迎來解嚴、能

量釋放的展現。球迷會自發性的組織應援，如兄弟象的飛刀組、盜帥組。儘管當時拆椅子、丟瓶罐、跳下球場「拚輸贏」，甚至還有「割喉事件」、「象迷圍巴」¹等案件，現今看來不入流、粗鄙、剽悍，滋擾不斷的球賽，是屬於各階層台灣人民摸索的時代。

球團作為資方當然也不會坐視不管，為了培養起自己的應援團隊，也在與韓國的交流下成立自己的啦啦隊，第一支始祖為2006年的La New Girls，其後亦有統一獅 Uni-Girls、兄弟象 Passion Sisters 等，也可透過命名邏輯知道，應援團隊的性別預設。隨著2009年爆發的假球案，有一批世代的球迷遠離球場、新球團將觀戰經驗中產階級「仕紳化」（gentrification），球迷們將形塑球場文化之責拱手讓給了球團（陳子軒 2023），於是，球迷自發的鼓聲、嘶吼聲，被球團官方的電音樂曲所取代。

此外，隨著韓式應援的主流化，台灣也發展出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應援風格，專為球員寫應援曲，還有相對應的啦啦隊隊員作為應援主力，像是中信兄弟啦啦隊 Passion Sisters 成員崑崙的代表作「炸裂陳子豪」、富邦悍將啦啦隊 Fubon Angels 成員丹丹的成名曲「范國宸應援曲」。近年來，也有許多球團招募韓國隊員，如轟動一時的李多慧、李雅英。女性看似有更多表演機會，薪資與代言費也水漲船高，「球員打球、啦啦隊應援」的配置，彼此都有獲得資本報償，一切似乎都是眾望所歸，然而，這樣的應援生態也引起了部分球迷的不滿，質疑中職淪落為「啦啦隊附屬棒球隊」，引發一系列本質、共存、剝削與主客體之間的討論。

啦啦隊到底應該被放置在什麼位置？是陪襯、是球場的必要元素、還是喧賓奪主的客人呢？若要釐清啦啦隊的存在，或許該從啦啦隊的工作屬性開始探問。近幾年，來自組織研究、工作社會學，甚或關注親密商品化等不同領域的女性主義學者開始關注「身體工作」（body work）或「身體勞動」（body labor）的理論化（陳美華 2017）。舉例而言，外貌工作（appearance work），所涉及的「身體/情緒管理」（body / emotion management），使身體被模

¹象迷圍巴，發生於西元2008年其前因為「割喉事件」，係為時任統一獅球員林岳平守住分數，經兄弟象球員休息室時，比出割喉手勢向其挑釁，引起球員與球迷的不滿，怒火中燒，賽後，甚至有球迷圍著統一獅球員的巴士，投擲加油棒，情況一度失控。最後，警方出動驅離球迷，才終於平息事態。此事件後成為中華職棒史上的經典。

資料來源：<https://time.udn.com/udntime/story/122833/7953452>（取用日期：113年12月21日）

塑，甚而承受痛苦，啦啦隊透過舞動，如何做、如何被看待、如何感知，產生什麼效果，皆是啦啦隊這份工作所需要聚焦的議題。

啦啦隊是講求互動的工作，要隨著球賽進展帶動觀眾的情緒，工作者的身體時常成為服務內容的一環，甚至被認為「出賣自己的身體、性和性別展演也是工作的一部分」（McDowell 1995: 93）。因此，啦啦隊時常穿著能夠充分展現異性戀審美的女性服飾，學會保持微笑、捕捉鏡頭等身體技術（Tyler & Handcock 2001），得要在媒體行文、粉絲凝視，甚至球團契約下維持體態、外貌，換言之，在Foucault(1979)的影響下，資本得用肉體、感覺、情緒上全面馴化啦啦隊員的身體。

回到運動現場，體育向來被稱作男性氣質崇拜的場域」（Anderson 2005），其中霸權性別意識形態透過穩定且強大的秩序來建構和重建男性霸權。霸權的特徵之一是，處於從屬地位的群體常常接受現狀，儘管這可能對他們不利。透過家庭、教育、國家等認知對立和社會模式的連鎖系統，建立在統治男性和順從女性的具體化基礎上，因此可以推測，在這樣的系統下，有一套「霸權女性氣質」的制度運作，並與霸權男性氣質建立並合法化了一種等級制度和互補關係，藉此保證了男性的主導地位和女性的從屬地位。

當前，體育運動中的女性身份不斷被檢視，女性氣質正與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和後女性主義等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進行談判。從商業邏輯、球迷劃分（本質迷與啦啦隊迷），運動中的性別、階級、勞動等議題。台灣棒球因為啦啦隊快速發展的短短十年間，累積「職業棒球」、「啦啦隊」、「球迷」之間關係的討論，以及三者間微妙的平衡。當圍繞啦啦隊的討論時，我們不能忽略，儘管幾乎所有的啦啦隊隊員都是女性，但那些最有權力發揮實質影響力的人——例如球團、媒體中擔任領導職務的人，通常是男性。誰能夠公開選拔成員，又哪些女性可以被選入啦啦隊，在場外採取受人的性政治，並得到較高的可幹性 (fuckability)²，用以操作自由女性主義在運動中賦予女性個人權力的理想。

² 此處援用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 Amia Srinivasan 著作《性的正義》（中譯），可幹性並非只能輕易性交的對象，而是指人們和誰性交之後能獲得地位，關於可幹性的現實，其實都是政治上的事實。（161-2）

在棒球發展的軌跡中，「棒球迷」的定義承載著多重概念，不只是國族、也不只是競技，可能早在時空的變革中成爲一種日常休閒娛樂與觀賞價值高的表演。當我們討論起棒球這項集體記憶時，仍須留意，性別意識形態的霸權性質對於理解啦啦隊角色相關的話語權。因爲許多女性，包括啦啦隊本身，可能都是維繫壓迫的本身。

如何理解啦啦隊，幾乎等於直接理解「棒球運動」這項多元文化的載體如何被形塑。

三、正文

(一) 臺灣中華職棒啦啦隊概況

當前中華職棒共有六名隊伍，旗下啦啦隊分別爲Passion Sisters中信兄弟啦啦隊、Rakuten Girls 樂天桃猿啦啦隊、Fubon Angels 富邦悍將啦啦隊、Uni Girls 統一獅啦啦隊、Dragon Beauties 味全龍啦啦隊、WING STARS 台鋼雄鷹啦啦隊。每隊約有 20-30 名拉拉隊員不等，總數約落在 130 名。

入行門檻無高技術性要求，舉中信兄弟啦啦隊2024年的招募條件³，只需「熱愛棒球及籃球、具備舞蹈專長，可配合訓練及演出、樂於與他人合作、能夠適應團隊合作環境」即可報名徵選，隨後才有面試等環節，雖在各球團招募條件中無明定報名者性別，仍能透過命名邏輯，輕易接受「啦啦隊=女孩」的預設，儘管如此，仍有少數非典型男性投入，例如從事表演工作多年、現任職於味全龍的「小螞蟻」。

爲保障球團利益，甄選應聘的啦啦隊成員須簽署專屬合約，成功通過面試成爲其中一員的女孩，也會在協商之中，選擇一個屬於自己的號碼衣，強化大眾記憶與識別的標示。至於經紀公司與球團的合作，主要可以分成兩種模式。

³ 詳見中信兄弟臉書官網：<https://www.facebook.com/share/4Uioz5xw347iKx3C/>（取用日期：113年12月25日）。

一種是如樂天與富邦，將啦啦隊的經紀業務，交給同屬於球團母企業下的子公司/部門負責；其二，如中信兄弟，是由與球團長期合作的經紀公司負責啦啦隊事宜。當然也有外包機制，在主場活動，由球團找經紀公司負責安排表演活動，不過這較常見於籃球文化中，職棒文化更傾向培養自己的啦啦隊伍，一方面形塑品牌形象，另一部份也是預算考量。

球團對啦啦隊的主要支出是在出場費，一名隊員每次表演，通常是新台幣5,000到7,000元，高人氣成員可達每場1萬元。啦啦隊會有班表，例行賽一場例行賽約需8-10名女孩，全年60場主場，其餘費用則在培訓、編舞、治裝等費用，一年花費相較於經營一支職棒球隊，以球團角度來說，則是相當划算的投資。

此類簽署經濟合約的表演工作者，其薪酬與簽約計價模式，較難透過行政院主計處、勞動部等官方機構得到準確數據，僅能憑業內人士的口述窺探虛實。在新聞報導與相關人士的第一手資料表示，啦啦隊是女性集中、高工時、低工資的工作。對於「高工時、低工資」的弔詭，可推測啦啦隊常以建構對棒球的熱血、閃亮明星夢、演藝工作跳板等方式包裝，並藉此招募成員，但日常勞動體制卻是按班表出勤、間歇性工時、按件計酬的方式模糊了僱主轉嫁的待工成本，以「帶給球迷能量」、「氛圍掌握」、「走紅可以接代言」等心靈雞湯式的話術剝削其勞動力，才進而造成啦啦隊底薪低、出場費亦無保障的窘境。能夠藉啦啦隊身份取得高人氣，跨界參與其他影視作品的現象多半是M型化分佈，薪資與機會多半仰賴自身經營粉絲關係、社群操作等能力。

(二) 自由、身體與美感勞動——啦啦隊女孩的自我賦權

一般而言，與球團或經紀公司簽署合約的啦啦隊女孩除了球賽時應援，也能透過各種管道進行副業，例如在個人社群平台業配商品、皆商案或展場工作，有幾位啦啦隊女孩在自媒體頻道經營也頗有成績，甚至跨界至傳統綜藝節

目、電影或唱片。一說是透過啦啦隊作為一種得到螢光幕的跳板，另一說是啦啦隊的薪酬不足以維持生計，得要靠其他工作才能打平收支。無論哪一種說法，都足以說明參與啦啦隊的女性擁有多棲在多重領域的能力與本事。

既然啦啦隊的收入或可能比最低薪資還低，那這些女性為什麼願意投入？有些人可能出於使命感、有些人為了追夢、也有些可能純粹出於喜歡，不可否認，這些選擇的概念層次上是個人先於社會，個人的本質獨立於經驗的社會之外。個體擁有自我決定的權利，不需要依賴他人的決定或意見。意即，啦啦隊成員出於個人選擇，能得到機會，藉此發揮潛能。

在這樣的個人選擇之下，有許多啦啦隊女孩都得以大放異彩。例如樂天女孩啦啦隊總隊長「籃籃」，以領導力與協商技巧為人所知，能夠有效調解球團和女孩之間的權益問題，同時，也進軍傳統影視，曾經入圍金鐘獎綜藝節目主持人；中信Passion Sisters成員「希希」，因本身對棒球的理解與熱愛，更藉此身份成為中信兄弟 Twitch 實習主播，負責播報、分析賽事；有「最強外援」美名的韓籍味全小龍女隊長「李多慧」，在韓國追求群像的啦啦隊文化中過於亮眼，不為韓國社會所期待，因此轉來台灣發揮。自幼打下肚皮舞與跆拳道基礎的她，舞蹈表現被粉絲津津樂道，身體柔軟而力道強勁，拍點精準，被粉絲轉載到各個社群平台上，收攬不少「路人粉」⁴，廠商紛紛洽詢代言意願，身價水漲船高，是一個在經濟資本上相當成功的例子。

啦啦隊女孩在螢光幕前光鮮亮麗，唱跳俱佳所帶來的高人氣與收益，是否有先決條件？以筆者管窺之見，這些風格殊異的女孩們擁有的共同特質就是源源不絕的正能量，試這些女孩的存在稱作「首席球迷」，不僅是觀賽第一線，還得要帶球迷應援，並在球隊落後、輸球時安撫球迷，傳遞運動場上超越勝負的感動。一般而言，一場棒球賽約落在3-5小時不等，啦啦隊成員們必須在沒有空調的炎炎夏日、沒有遮雨棚的雨天，邊跳邊笑，是一件十足耗費體力與精神的工作，這樣高度的情緒勞動（emotion labour）通常會被稱作「敬業」，是啦啦隊女孩之必須。

⁴ 路人粉，為時下網路用語。係指平時雖沒有積極關注特定偶像&對象，卻「僅是路過，也會被迷上」的粉絲受眾。

除了維持正能量之必須，長相也是普遍被認為的基本條件，儘管審美見仁見智，不過關於啦啦隊女孩如何「維持美貌」，可藉由幾位啦啦隊女孩的自媒體帳號略見一二。以李多慧為例，其 YouTube 頻道上傳影片中，有「啦啦隊的自我管理」、「啦啦隊的髮型秘密」、「紀錄上班的一天」等⁵，紀錄了她在上場應援前需要付出的美貌管理，例如飲食、避免出汗暈妝的方式、搭配衣服的妝容色彩、髮質的保養、造型的設計等等……是一系列繁瑣、費力的功夫。

身材當然也列在外貌的審查標準中，前樂天女孩經紀人 Stanley 曾表示，「她們如果變胖了，球迷的相機最銳利，自己的照片可以修圖，但粉絲拍的照片無法修，所以這點根本不需要我盯。」，顯示，啦啦隊女孩的身材是一種被高度檢視、有外在壓力（粉絲鏡頭、經濟公司）的約束、並因此內化成一種職業道德的標準。

「成為啦啦隊女孩」不僅是個人自主下的決定，且具有契約保障女性的自由權利，在這個過程中，女孩們無一不付出自己的身體/情感/美貌勞動，以求得此身份，這個選擇也不被外界干擾；看向結果，這個選擇成為個體意願的展現，因為這個身份，啦啦隊女孩得以藉由舞蹈等身體展演的方式得到經濟機會、提高報償，在確保經濟基礎的前提，進一步達到自我實踐（顧燕翎 2019: 34-85），可將此歷程解釋為——成為啦啦隊即是一種自我賦權（empowerment）。

（三）資本主義、媒體與商品化——當啦啦隊女孩成為客體

1. 資本主義邏輯：球團的啦啦隊經營

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球團和商業經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台灣啦啦隊的目前主流應援方式，是LaNew在2013時為了改善低迷的進場人數、吸引球迷

⁵ 詳見李多慧個人YouTube頻道「이다혜 李多慧」：https://www.youtube.com/@lee_dahye（取用日期：113年12月26日）。

而提出的策略改變，在觀眾席擴增加油團平台，使得啦啦隊和球迷有更多的互動，而後啦啦隊漸漸邁向偶像化的經營。由此可知，啦啦隊不僅僅是用來帶動場上氣氛的活動，它更成爲了經營者手中的行銷工具之一，並且與觀眾的消費行爲密切相關。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可以用來分析這一現象：啦啦隊員被當作商品來運作，她們的外貌和形象被轉化爲吸引觀眾消費的工具，進一步加深了她們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物化與剝削。這種現象突顯了資本主義如何利用性別角色來操控消費。

在資本主義環境中，因爲異性戀男性被視爲主要的棒球球迷，經營方爲了最大化利益，啦啦隊員的形象必須迎合男性的喜好，包括他們的身材外貌、服裝設計被刻意塑造成一種「理想女性」的形象——美麗、活力、性感——以滿足主流文化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這種外在的形象不僅是她們表演的一部分，也是她們在商業市場中的價值所在，並且強化男性的市場需求。

此外，現代啦啦隊的偶像化經營強調與觀眾的互動，以及球場外的活動參與和社群網站的經營，雖然某種程度可以讓觀眾更全面了解啦啦隊員，但同時這種交流模式實際上對啦啦隊員形成了剝削。她們必須在球場內外維持一種陽光、清純的形象，這一要求並不僅僅關乎她們的專業能力或是工作表現，甚至關乎她們的偶像形象作爲商品的市場價值。這與馬克思提出的「物化」概念相符，即勞動者（在這裡是啦啦隊員）被剝奪了自主性。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下，任何背離這一形象的行爲，會受到網路及媒體的關注及斥責。這反映出啦啦隊員的自由被限制，也顯示出資本主義和父權結構如何緊密交織，共同維持性別角色和權力的階層性。

從社會主義女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m）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和父權主義是交織且互相助長的兩個系統，構成了壓迫體系。我們可以從啦啦隊的經營中，看見性別壓迫和經濟剝削的相互依賴。雖然啦啦隊員的勞動活動位於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但她們的壓迫來自於一個深層次的性別體系，這不僅僅是經濟剝削的結果，更是由父權體系和性別分工所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父權體

系」下，女性被迫在男性主導的市場中扮演符合性別期待的角色，這種角色的塑造正是資本主義利用父權結構維持性別不平等的方式。

復次，在大眾媒體的渲染中，啦啦隊形象的「性別符號化」愈發明顯，加強女性在球場中被物化、客體化的存在。在台灣的棒球產業中，與啦啦隊相關的新聞，主題多集中於外貌與性感元素，僅有少數會提及她們的專業訓練或比賽助力作用，這一現象不僅影響啦啦隊員的職業形象，也反映了父權結構對女性角色的深層影響。

這些媒體報導不僅是聚焦於啦啦隊員的身材與外貌，更常用浮誇或帶有物化女性意味的字眼描述他們的外表，像是「晃」、「香」，甚至其他具有歧視意涵的用字。久而久之，在媒體的煽動之下，球迷漸漸地產生了「啦啦隊即娛樂商品」的觀念，也容易將啦啦隊與「球賽附屬品」畫上等號。

而在社群軟體的部分，大多數關於中職啦啦隊的貼文內容都聚焦於啦啦隊員的服裝、舞蹈及個人生活照片，而非專業表演影片。許多經營者更喜歡以聳動且浮誇的字眼形容啦啦隊員的身材，卻鮮少討論她們的技術與訓練過程。這種內容的生產與消費，使得啦啦隊的物體化形象在數位媒體中愈發強化。除了傳統媒體與社群軟體之外，令人意外的是球團在進行啦啦隊員的行銷時，也並未選擇以較專業的角度來替他們打廣告。例如樂天桃猿隊曾在2022年為其啦啦隊「Rakuten Girls」推出限量版的「啦啦隊寫真月曆」⁶，然而，這些月曆主要以「泳裝造型」為主打，並附加球迷簽名會活動，強調消費者與啦啦隊員互動的機會。儘管此舉為球隊帶來可觀收益，但也引發對女性形象被商品化的批評聲浪。

根據民視新聞網的一篇報導⁷，樂天桃猿啦啦隊「樂天女孩」的舞蹈總監陸筱晴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啦啦隊的工作不僅僅是外貌的展示，更重要的是專業地帶動氣氛。她提到：「外表只是一環，更重要的是專業的帶動氣氛。」

⁶ 詳見Rakuten Girls FB貼文：<https://www.facebook.com/RakutenGirls.official/posts/pfbid0TM7npGFx7em7m5rCA8LSpnpYRZXxM834bSnPiY185py9WujbUupXBkhKoYU5Tgvtl?rdid=VCdLtkCgMp9o8ed#>（取用日期：113年12月26日）。

⁷ 郭嘉柔，2024，〈台灣體壇「啦啦隊外貌」超重要？遭疑「物化女性」女神澄清：只是其中一環〉。《民視新聞網》，11月18日。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4B18W0353>（取用日期：113年12月26日）。

此外，她還指出，啦啦隊的訓練內容豐富，包括舞蹈編排和現場氣氛的掌控，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專業能力。然而，媒體和觀眾往往只關注她們的穿著和外貌，忽視了她們在專業領域的付出和努力，這也反映了啦啦隊員所面臨的外部壓力和認同困境。

從上述可以看出，新聞報導中的女性經常受到刻板印象所束縛，女性明顯被視為性的象徵。且在父權社會中，女性所呈現出的「適宜角色」（*feminine-appropriate*）更符合了男性主宰的性別分工定義，而女性的角色更依循著大眾媒體被塑造著。（李孟霖 2015）

反觀日本，同樣是擁有棒球啦啦隊文化的國家，其媒體在報導上卻會傾向於以啦啦隊員的專業訓練為主，並強調他們的舞蹈技巧和表演能力，甚至從文化和傳統角度探討啦啦隊的作用及其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儘管日本媒體仍會以「美麗」、「可愛」等字眼強調啦啦隊的形象，但相較於台灣媒體，這些用字相對溫和與含蓄，不會給予閱讀者那麼強烈的觀感。這些對於台灣媒體而言，都是可以效仿與改善之處。

而根據BBC NEWS中文的紀錄片⁸〈「像偶像的存在」：啦啦隊「台式應援」如何幫台灣職棒圈粉？〉，將台灣啦啦隊類比於女性偶像團體，而在各個職棒球隊的官方周邊網站，皆可以看到會有特別的一欄是啦啦隊成員的個人周邊，而各個球隊如何設計這些商品則成爲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可以再舉上文中所提到的「啦啦隊寫真月曆」爲例，可以藉 *Idols and Celebrity in Japanese Media Culture* 這本著作所提到的「非裸露色情」來解釋，而非裸露色情便是軟調色情的分支，而因爲軟調色情的特性使得這種類商品在大眾市場上流通，其商品還有很多種類，例如：髮香卡⁹，而最接近啦啦隊的觀眾席，則會被稱爲髮香區。

除了販賣軟色情以外，還有一些商品是在削弱觀眾與啦啦隊隊員之間的距離感以販賣戀愛感，例如：私服形象壓克力板、戀愛學園系列。而這個手法最

⁸ 影片詳見BBC NEWS 中文官方 Youtube 頻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GAl554I>。（取用日期：114年1月4日）。

⁹ 髮香卡係指啦啦隊女孩的個人照片中夾入真髮，包裝成商品販賣粉絲的商品，類似於韓國偶像的小卡。髮香一詞對比球場的汗臭，女孩是「香」的，應援的時候頭髮都會飄香。

早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成偶像年代，透過握手見面會等場合來拉近偶像與觀眾的距離，更好的販賣戀愛感與其周邊，若啦啦隊隊員談戀愛或結婚則會被媒體大肆的報導，這也讓啦啦隊女孩的私生活暴露在風險當中。

而這些商品推出時，我們不得不去聯想，在以啦啦隊隊員這些形象所推出的商品，啦啦隊隊員有得到恰當的抽成嗎？而這些商品上的形象會不會限制觀眾對於啦啦隊的想像？這種工作促進了女性的經濟與工作權，實則仍鞏固了一套嚴密的父權體制。

(四) 停滯的性別革命？男人打球，女人加油的分工邏輯

綜上所述，啦啦隊的父權載體形塑了一套女性霸權，其另一個面向涉及性吸引力。具體來說，啦啦隊對球迷的異性戀男性具有吸引力。巴特勒（Butler 1990）的理論認為，正是「自然」異性戀慾望的假設將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綁定在等級二元關係中，讓美麗、性感等符號與啦啦隊劃上等號。至今，每年所推出的月曆、周邊商品，無不在強化這種「漂亮女人」的邏輯。

此論述並非要一竿子打翻一船「自願」保持貌美的女性，而是一樁提醒，在觀賞啦啦隊女孩帶來的熱血應援時，得要留意，這種自由的選擇，背後往往帶有更穩固、更牢不可破的結構因素。就好比，一個人的舞蹈實力、或帶動跳的能力，從來與衣著沒有關係，不會因為穿得更短，而呈現更高水準的表現，甚至可能因為過短的裙長而影響發揮。

看待「球員—啦啦隊—粉絲」關係之間的本質協商時，必須得分析台灣職棒場域的性別意涵。這些現象是多元、異質甚至時而矛盾衝突的，一支球團既可以主打運動平權的訴求，也可以同時經營性化女體的應援。運動空間的性別意涵詮釋，絕非全對或全錯的二分法，而須耐著心性觀看這層建制的文化、空間、資本、性別的結構如何被層層疊起，再將這棟違建的高牆一一剷除。

本研究尚未能探詢到產業內部參與者的第一手訪談資料，因故在行動與能動主題上無法多作著墨，仍然，藉女性主義視角的輔助，洞察啦啦隊的濫觴，無疑是支持與強化運動場上男性氣概的輔助性產物。女性在觀眾席，為其所屬的男性球員歡呼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至今，這樣的性別分工、具有性吸引力、被以性化眼光觀賞的女性，在運動場邊依舊受到歡迎。

運動文化中的女性參與，首先得要破除場域中性別分工的概念，為不分性別的體育活動保留空間。儘管啦啦隊成員也有為數不多的男性參與，但盤查帶領成員喊口號、舞動的團長，為何有大多數都是男性呢？

筆者為體育活動的愛好者，必然期待體育環境可以革新、更性別友善。現今，啦啦隊已成為球賽的一環，當然不只是討論是否續存、甚至以「只要啦啦隊帶動一批粉絲，再讓他們喜歡上棒球就好」的思維意圖挑起爭端，就可以解決這種運動性別不平權的問題。現今，啦啦隊儼然成為中職不可分割的存在，甚至，中職發展史上，無論是票房、應援文化、外媒採訪與相對應的國際關注，很大部份都有啦啦隊的一份努力。當我們可以開始想像「像女孩那樣丟球、像男孩那樣歡呼」，或許就是運動場域邁向性別平權的契機。

四、結論

本文藉啦啦隊的個人志向、身體展演、球團經營，粉絲互動等多重面向，理解啦啦隊勞動中身體、性別、工作與組織的複雜關係。目前台灣缺乏對本土啦啦隊的相關研究，無論是勞動、性別或商業面向，多半仍停留在網路新聞、專欄與社群評論中。

本文側重討論商品化、性/別化的身體勞動，正如 Crossley (2007) 所言，社會學因關注人們的行為、互動與實踐，因而始終不像哲學因崇尚心智活動而貶抑、輕忽身體。而身體作為一種分析的背景，除商品化的剝削、性化的

顧慮，尚有情緒勞動與美學勞動的角色於此之間運作，囿於筆者的閱歷有限，未能充分展現各項身體化的分析。

本文將啦啦隊視作一種互動性的身體工作，從啦啦隊成員的個體展現、球團商品化包裝及行銷特定性別符碼的操作、討論社會結構中，媒體與球迷如何觀看啦啦隊的身體意象，並採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與激進主義女性主義理論開啓對話空間。

首先，本文指出年輕貌美的女性身體構成中職啦啦隊的主要勞動力，並以極具發展例的潛在誘因，吸引不同背景的女性（甚至少數男性）投入。

其次，藉由將啦啦隊的勞動概念化成一種具備情感、積極性高的身體工作，鑲嵌在球團契約與個人賦權間的光譜中，強調身體操演是一種商品價值轉換、機會提高、總歸是基於個人選擇的主體認同之上。

接著，談論球團做為一種剝削的資本巨獸，如何販賣女人的性，製作出迎合異性戀審美的商品，以獲得更多的報償；在這樣的基礎上，接續討論新聞媒體的渲染，使得性別刻板印象的霸權體系得以續存。復次，將啦啦隊女孩與「妹迷」的互動視為身體化的情緒勞動，這些賽伯格化的陽具，不僅是凝視，還可能是一種流量交易。女孩們必須讓粉絲感受被關注、被寵愛，並盡可能展現其敬業、親民的精神。這層社會關係，圍繞著販賣自己被觀看的身體所演繹的工作。「偶像化」的職責，養成了一批願意粉絲服務的啦啦隊員、馴化，並不斷複製這樣的勞動。

整體而言，本文以「初探」為題，並盡可能羅列出已知資訊進行延伸討論，賦予中職啦啦隊文化多重面向的檢視。若要深究其縝密結構下的存在，可再從「企業主、國家政府、選手、粉絲」等立場著手，甚至取得官方資料做量化分析。討論啦啦隊向來不是件容易的事，筆者作為性/別研究的學徒，不願大放厥詞，二分化將這群努力的女性想像、書寫成「成功女性奮鬥史」、「當

父權的性工作者」，無論哪一種論述，都可能強化了既定的厭女情結，在自由主義的論述下成爲「不努力維持漂亮，難怪不會成功」、又在激進主義中變成「搔首弄姿販賣性勞動的父權紅利」，諸如此類。

討論啦啦隊作爲個體與群體的存在固然重要，既可讓我們理解個人的能動性，亦能觸碰到結構的壓迫與剝削機制如何運作，任一方皆無法在這項討論中缺席。透過不同觀點的對話辨別各種差異與壓迫，是女性主義理論在多年來的演變、擴散與互融中的使命，期以透過女性經驗來改造充斥暴力、歧視和偏見的父權體系，儘管本文欠缺啦啦隊隊員的第一手訪談資料，筆者呼籲，仍要在衆聲喧嘩中學習尊重不同文化、不同社會脈絡下的個體，以互爲主體的方式相待，擺脫既得利益/優勢者的俯視姿態，避免強加價值觀與他人，開啓坦然、傾聽的對話空間。

參考文獻

李孟霖，2015，《性別在網路新聞媒體運動報導之研究——以天津東亞運爲例》。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子軒，2023，〈啦啦隊愈紅，運動本業恐愈虛——台灣職業運動走向內容農場化？〉。《報導者》，4月8日。<https://www.twreporter.org/a/saturday-features-long-game-rethinking-cheerleading-culture>，取用日期：2024年12月27日。

陳美華，2017，〈美髮作爲身體工作：從苦勞到美感協商的身體化勞動〉。

《臺灣社會學刊》62：1-58。

顧燕翎主編，2019，《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臺北：貓頭鷹出版。

Anderson, E., 2005, *In the Game: Gay athletes and the cult of masculini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utler, Judith,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Crossley, Nick, 2007, “Researching Embodiment by way of ‘Body Techniqu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5 (1): 80-94.

Foucault, Michel,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McDowell, Linda, 1995, “Body Work: Heterosexual Gender Performances in City Workplaces.” Pp. 75-95 in *Mapping Desire: Geographies of Sexualities*, edited by David Bell and Gill Valentine. London: Routledge.

Shaw, S., & Hoerber, L., 2003, “A strong man is direct and a direct woman is a bitch”: Gendered discours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employment roles in sports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17(4): 347–375.

Tyler, Melissa and Philip Handcock, 2001, “Flight Attendan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Gendered ‘Organizational Bodies.’” Pp. 25-38 in *Constructing Gendered Bodies*, edited by K. Backett-Milburn and L. McKie. London: Routledge.

學術論文組（高年級）

【優等】

都市中寵物狗的飼養現況與挑戰： 以美里市為例

翁佑瑄

人文社會學系

作品介紹

本研究以馬來西亞多元宗教與文化交織的美里市為田野，探討都市中人與寵物犬的互動模式及其挑戰，聚焦當地華人飼主、寵物店、獸醫診所及流浪動物收容中心，剖析當地文化形塑獨特的飼養生態：一方面，華人飼主視狗為家庭成員；另一方面，馬來人則因遵循教義而刻意疏離。

文中究記錄了當地居民在宗教藩籬下的妥協與創新，亦以中立的敘事紀錄政府對於流浪動物的政策與處理，打破非黑即白的價值框架，盡力展現各方立場與處境。同時捕捉年輕世代與傳統觀念的碰撞，以及馬來裔突破宗教禁忌的社會意義——「這是一道沒有對錯的選擇題，雙方都在各自的信念中擇善固執。」

本文不僅是學術實踐，更是一份人文關懷的紀錄。透過細膩的文字與影像，將冰冷的數據轉化為有溫度的生命故事，呼籲社會在尊重多元信仰的同時，重新審視當代以人為中心的社會觀。希望在多元與衝突並存的城市中，我們都能以更柔軟的心，接住每一個渴望被愛的小生命。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時代價值觀的變遷，「家犬」的角色和存在目的變得更加多元與廣泛，不同以往作為看家護院、解決殘羹剩飯的角色，寵物狗已然成為一種心靈伴侶或如同家庭成員般的重要存在。以台灣為例，人們將稱寵物狗為「毛小孩」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這種稱呼不僅體現了飼主對寵物的高度情感依附，更是將寵物狗視為家庭的一員或是如同子女般看待的心境，上述文化潮流反映了現代人將寵物狗不僅視為精神寄託，並更進一步模糊了人與動物之間的傳統界限。

然而我觀察到地處馬來西亞東部的美里市，呈現出一種不同於台灣的獨有養狗文化態樣。美里是一個由馬來人、華人、土著所組成的多元社會，其中信仰伊斯蘭教的馬來人，因為宗教的規定無法飼養狗隻，因而當地飼養寵物狗的群體限縮於華人與土著。對這些狗主來說，飼養狗隻的過程中不僅僅要面臨日常管理和照顧上的難題，更需直面社會上的文化差異和潛在的偏見。這些飼主可能會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各種困難，例如：遛狗的地點受到限制、和鄰里的互動容易出現摩擦……等等。這些因素構成了養狗人在美里特有的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挑戰，也進一步塑造該地市區內，不同於台灣的狗隻飼養文化和人犬互動模式。

這也引發筆者產生研究興趣，因此以「都市中寵物狗的飼養現況與挑戰：以美里市為例」為題，旨在深入探討美里市養狗人群的生活現況和所面臨的挑戰，在多元宗教和文化背景下，這些狗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平衡，並形塑出他們與寵物犬的獨特關係。

二、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以當地飼主、實體寵物店、寵物醫院和流浪動物收容中心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各對象代號與介紹如附錄表1）。

(二) 研究方法

1. 深度訪談

因應每一位研究對象的特性設計訪綱，並與上開對象進行深度訪談與對話，藉以還原出美里的養狗生態。

2. 參與式觀察

實地走訪各研究場域，以研究者的身份密切地參與當地人之生活，並觀察各場域內人群與狗的互動模式與社會現象，以搜集第一手資料進行分析，旨在呈現出美里市犬隻飼養的生活實況，並探索其中所反映的文化與社會結構。

3. 文獻參考

筆者參閱並分析當地的新聞報導、政府宣傳海報、以及網路媒體的新聞稿和社群媒體內容等資料，藉此瞭解美里市對犬隻飼養的社會氛圍、政策宣導以及流浪狗問題的社會討論與真實反映。藉由對上開二手資料的分析，進一步挖掘出美里市政府、社會大眾和新聞媒體對於犬隻飼養及管理的立場與態度。上述資料能夠補足訪談中未涉及的宏觀視角，並提升本研究的深度與完整性。

(三) 研究設計

透過與10位飼主的訪談，了解當地人與寵物狗的日常互動模式，包括飼養寵物的便利性、遛狗的地點選擇、以及日常飼養中所面臨的困難。對於寵物店和寵物醫院的訪談，前者作為當地飼主採買寵物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場所，能夠反映出當地飼主的消費習慣和狗隻飼養的需求；後者則為寵物狗提供健康保障與醫療服務，訪談內容涵蓋了狗隻結紮率、常見疾病和醫療需求，以此了解當地寵物醫療資源的現狀及挑戰。

此外，透過實地觀察與訪談流浪動物收容中心，得以更全面地了解美里市對流浪狗的管理和處置方式。收容中心的訪談內容聚焦於當地流浪狗的數量、收容流程、以及安置和人道處理的現況，此研究不僅提供了對美里市流浪動物現象的概況，還揭示了當地社會對於狗隻的看法和態度，以及管理流浪動物的方式對飼主可能帶來的間接影響。

最後，通過上開訪談本研究試圖描繪出一個貼近美里市區的養狗現況，並得以建構出美里市區養狗文化的輪廓。

三、研究分析

(一) 寵物狗飼養現況與挑戰

1. 文化間的相互退讓

在美里，信仰伊斯蘭教的馬來人和飼養狗隻的非穆斯林群體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退讓和尊重的文化模式。由於伊斯蘭教教義對狗隻的接觸有一定限制，飼主們大多選擇在美里中央公園遛狗，更特別的是，當地飼主幾乎不約而同地選擇在每週日下午至傍晚這個時間段帶狗出門活動，我的受訪者們幾乎清

一色地都表示：「週日下午在美里中央公園遛狗是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也因如此週日的美里中央公園內有如「寵物狗聚集地」（見圖1）。



圖1 週日出門散步的寵物狗。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這樣的時間安排讓穆斯林居民可以在其他日子和時段自由使用公共空間，不必擔心意外接觸到狗隻，不過有意思的是，筆者觀察到就算是週日的下午——在這個「遛狗日」，公園內還是不乏馬來人。馬來小孩通常會站在遠處觀看狗，當狗隻靠近時，便會迅速後退，以保持距離。多數馬來人選擇坐在距離狗較遠的海堤上，並未表現出強烈的排斥態度。然而，當有人牽著狗經過時，他們往往會下意識地稍微拉開距離。值得一提的是，仍有一些馬來人並不避開狗隻，能夠若無其事地從狗身邊經過，不會特意調整距離（見圖2）；也有部分人會帶著濃厚的興趣注視在草地上奔跑的狗隻（見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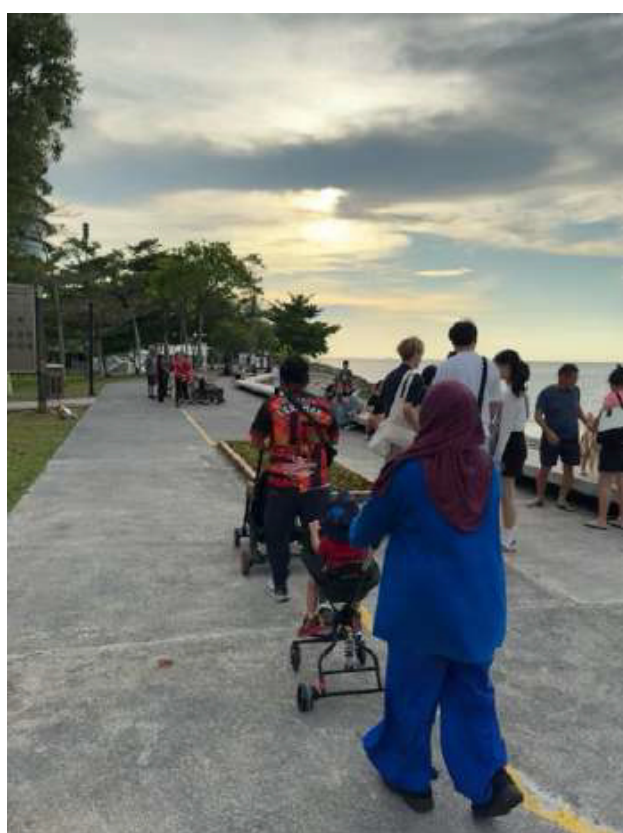


圖2 慢悠悠閒逛的馬來人。



圖3 對狗投來相當感興趣目光的馬來人。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圖4 承蒙C先生的熱情邀約，讓我有機會以「養狗人」的身份
近距離觀察公園內各族群與狗的互動。**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另外，美里中央公園內也非常貼心地設置了狗便清潔袋（見圖 5-1、5-2），不過數量遠遠不夠，時常供不應求，因此大多數飼主仍會選擇自備。G小姐反應不僅需要自備清潔袋，也須攜帶給狗喝的飲用水：「別說狗了，連人都沒得喝！都沒有裝水的地方。」因此狗主人拿著自備水盆給狗喝水的畫面，也成為這裡的特殊的畫面（見圖 6）。



圖 5-1、5-2 被拿的一空的狗便清潔袋。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圖 6 自備水盆的狗主人。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除了「遛狗日」以外的時間，狗隻大多被限制在家中，足不出戶。在與 B 小姐的訪談過程中，B 小姐向我表示真的非常羨慕台灣的自由開放，她說道：「之前去台灣旅遊，就看到你們的狗都可以上公交車，還有人把狗放在推車裡，好可愛跟小孩子一樣。」這裡雖然也可以「自由」養狗，不過僅限於飼養在自己住家的範圍內，不能時刻與寵物狗自由地相處。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了 C 先生身上，C 先生和哥哥共同飼養一隻德國牧羊犬 Mia，和一隻阿拉斯加 Albert。平時都有工作要忙，下班後的時間也因為餐廳、公園、商場等地對狗的限制（見圖 7 至 12），沒辦法時時攜帶 Mia 和 Albert 在身邊，導致它們大部分時間都是被關在家中。C 先生表示：「一週唯一的放風時間就是週日傍晚到美里中央公園去散步的 1-2 小時，除此以外大概就生病的時候是去獸醫，一至兩週去一次寵物美容店洗澡，並且還是以坐在車子上的方式前往。」



(由左至右，上至下) 圖 7 至 12

美里大多數空間皆不允許攜帶寵物狗。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這種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雙方可能產生的衝突，並反映出在多元宗教背景下，人群透過默契和習慣建立共存方式，不過這種約定俗成的退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卻引發了更多問題。

A 小姐小時候曾養過一隻狗名叫 GiGi，和其他的家犬一般，牠也被迫困在四面牆壁之間，不過 GiGi 有著一顆追逐自由的心，令人惋惜的是，這卻成為發生悲劇的導火索。一天 A 小姐開門的時候，GiGi 就從門縫間衝迫不急待地衝出去，不曾想就這樣撞上了疾馳而來的馬來夫婦，那對夫婦騎著摩托車，看到有狗衝過來雖然及時地煞了車，卻仍因為反作用力而摔下車受了傷。A 小姐說道：「因為這件事我們家賠償那對夫婦一大筆醫藥費（記不清多少，

不過以當時來說很昂貴了)，後來我的父親大發雷霆，將GiGi開車載到偏遠地區的山裡扔掉了，當時我還是小孩子，雖然哭的撕心裂肺卻也無能為力，無法反抗父親的決定。」這件事情在她年幼的心裡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傷痕，時至今日這段經歷卻始終讓她對狗保持距離，再也無法像過去一樣輕易地接受牠們進入自己的生活。

2. 熱銷產品背後的文化意涵

地方的文化與風氣，會形塑人們的認知與消費習慣，接著商家會因應這些特點販售符合當地需求的商品，剖析一地暢銷商品背後的原因，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該社會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消費者的心理需求。為了深入研究，筆者在美里曾深度訪談 Tolly Pets 老闆 Z 先生與 L 小姐，另以參與式觀察兩家市區中心的實體寵物店。

Tolly Pets，一家由 Z 先生與 L 小姐創立於 2019 年的寵物店，秉持著「領養代替購買」的信念，Tolly Pets 店內並沒有在販售任何動物，若是有飼主想要送養或領養，都可以透過店內轉介適合的主人與寵物。店內主要以販售飼料、保健品（維他命、葉黃素等）、生活用品為主（圖13至15），在這當中有兩樣商品吸引了筆者的注意力：尿布（圖16）和防咬口罩（圖17）。這兩樣產品似乎在美里的寵物店都是「暢銷冠軍」，總是放在店內最顯眼的位置，庫存量也很足夠，在台灣前者大多用於老年貓、狗，因為隨著年紀增長，膀胱不堪負荷，這時紙尿褲就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滿足寵物隨時便溺的需求，更是能維持家中整潔，與之不同的是這裡的紙尿褲大多被用來預防寵物的生理期，有如動物的「衛生棉」。



(左) 圖 13 、 (右) 圖 14
店內大多以販賣飼料為主。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圖 15 另也有販售寵物狗食用罐頭。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左)圖16、(右)圖17
熱銷冠軍紙尿褲和防咬口罩。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寵物紙尿褲的暢銷，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美里寵物結紮率偏低，J先生曾表示：「我身邊朋友的狗幾乎都沒有結紮，我們家的當然也沒有。原因的話是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而且我覺得擅自幫牠結紮似乎像是幫牠做了一個大決定一樣！很不尊重牠！每個月買紙尿布就好了，不貴，也不麻煩。」

除此以外，店內常備防咬口罩的現象，以側面證實了狗的生存環境遭到嚴重限縮，在長年待在家中的情況下，因為極少接觸到除了主人以外的人事時地物，因而對同類和外界產生極大的恐懼，I小姐就表示：「我們家的兩隻狗，每一次到週日我要帶他們出去散步，牠們就很不想去，會一直叫，終於載到公園之後就會不想下車，要我硬拽出來，常常走個五分鐘就會想家了。」使得寵物狗在外面時會過度緊張，時不時吠叫，促使人類常備防咬口罩，既是為了保護他人，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緩解自身的焦慮。

然而，有趣的是在中央公園實地觀察時，筆者發現狗戴防咬口罩的比率並

不高，店內常備此款商品的用意為何呢？Z先生說道：「一般走在路上沒有規定要戴，所以不是每個主人都會幫狗戴，不過若是要帶著狗去施打政府的免費疫苗的話，政府就有規定一定要帶。」那口罩的熱銷是否與疫苗普及率是否有直接相關呢？很遺憾地似乎沒有，即使政府有提供免費的狂犬病疫苗，家犬的施打率仍然不理想，主要原因不外乎就是美里的寵物狗幾乎「足不出戶」，主人們認為家犬並不會與外界的狗有所接觸。Z先生解釋道：「主要是因為這個口罩不會壞麻，可以一直備著，而且一定會有人要來買，因為把口罩備在身邊總沒有問題的，而且也算是消耗品。」

另外，筆者於市區另尋兩家寵物店進行參與式觀察，筆者發現兩家店驚人地相似。店內面積均不大，販售貓用與狗用商品大約分別為60%和40%，並且狗用商品種類同樣侷限於飼料與罐頭，並無玩具、衣服、寵物食用點心等商品（見圖18）。更值得注意的是，僅其中一家店有販售牽狗繩，且Tolly Pets也不提供這項商品。這樣的商品選擇和消費習慣反映出當地養狗人對寵物的飼養觀念和態度，上開情狀以側面證實當地的狗隻並不常被帶出門，並且飼主似乎大多著重於滿足狗隻的基本需求，而非提供額外的玩樂和社會化機會，抑或是美里當地飼主認為寵物狗無需有除了生理以外的需求，誠如多位受訪者表示：「我的狗跟我玩就好了啊！而且牠們也不喜歡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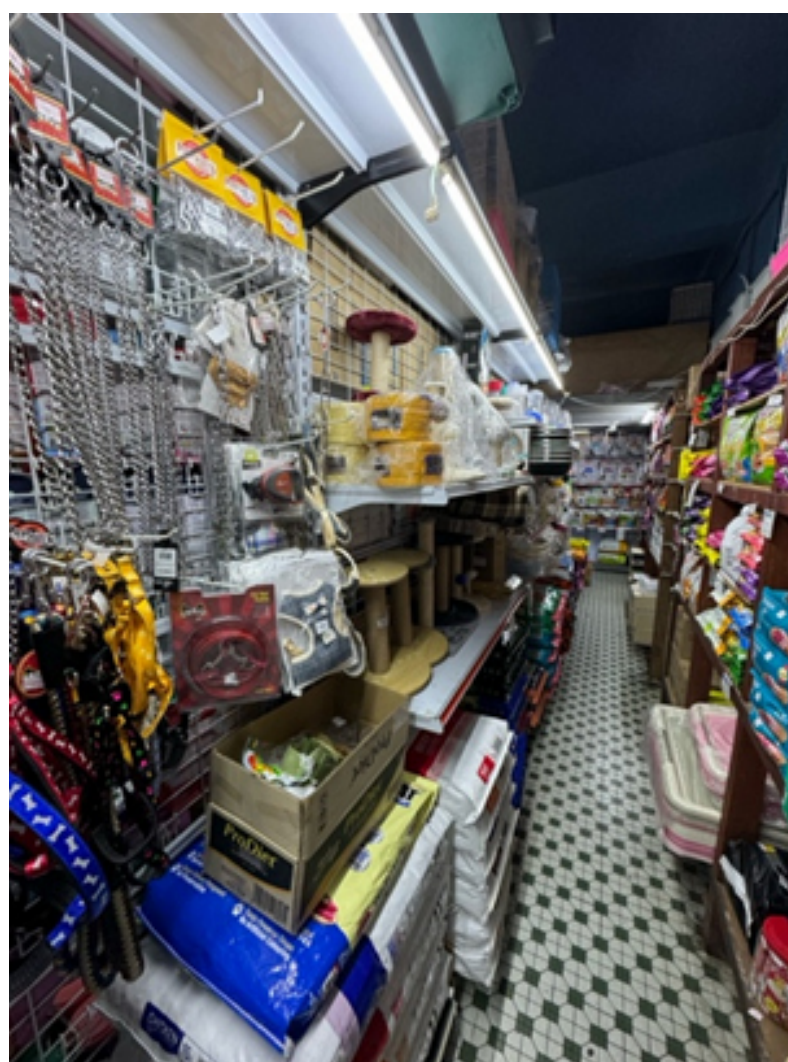


圖 18 商店內僅有的牽狗繩。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左)圖19、(右)圖20

參與式觀察兩家寵物店各有一隻店貓。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3. 寵物醫療資源實況與困境

筆者將研究領域設定於眾多受訪者大力推薦的貝蒂寵物診所（Bettie Veterinary Clinic & Surgery）。筆者將聚焦於當地寵物醫療的現況以及飼主在醫療方面的態度和需求，寵物醫院不僅是動物接受治療和健康檢查的場域，更是反映了飼主對寵物健康的重視程度，藉以想像整體社會對寵物醫療的認知和觀念。

貝蒂寵物診所，其為院長為X先生，X先生起初從事畜牧業相關的貿易工作，因緣際會下認識了是獸醫的Y小姐，為了妻子開了這家寵物診所，如今Y小姐已經成為美里當地聲名遠播的獸醫。

診所外觀並不起眼，好似一家只設有一般門診的小型醫療機構（見圖21），然而正可謂「人不可貌相」，貝蒂其是全美里規模最大，設備最齊全的治療中心，1990年成立至今，已經從業34年，服務項目包括內科治療、外科手術、

牙齒護理……等等（見圖22），用X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我們除了心臟手術這種大型的手術以外，我們全部都能醫治。」言下之意在於，若是連貝蒂都無法醫治，那美里也沒有其他家診所可以進行治療了，如果動物出了什麼意外傷及心臟，在美里等於只能靜待死亡的到來。由此可知，美里當地目前仍然缺乏大型寵物醫院，當面對一些較為複雜或緊急的病例時，現有的醫療資源可能無法滿足所有需求。



圖 21 佔地面積不大的貝蒂寵物診所。

圖片來源：截圖自貝蒂官方臉書



圖 22 貝蒂寵物診所的服務項目，噴灑的是消毒酒精噴霧，避免人類從外部帶入病毒，影響店內正在住院的動物。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另外，Z先生表示：「人們可能不太懂結紮對於寵物的好處在哪裡，再者結紮也是一筆錢，主人大多都覺得沒必要。」根據貝蒂醫院院長X先生提供的資訊：「結紮的話是按公斤數算的，20公斤的母狗大約400馬幣（約3,000新台幣），公的容易做所以更便宜，40公斤的母狗大約600馬幣（約4,500新台幣）。」雖然結紮的費用並不低，但相比於長期的衛生護理來說，這屬於一次性的投入性消費，但許多人仍對此存在疑慮或缺乏相關的知識，這也影響了結紮的普及率。

除此以外，早在20年前（2004年）貝蒂就已經領先全美里引進X-ray（X光機），將X-ray運用於寵物治療，在當地至今仍不普遍，原因在於馬來西亞政府對於X光機器的進口訂立許多規範，例如：放置X光機器的房間大小、房門材質以及厚度……等等，嚴苛的規定加上高昂的稅率，讓許多廠商和診所望之卻步。X先生補充道：「尤其是引進專門用來掃描動物的X光機器投資報酬率實在太低了，我們一個月最多最多就用那台機器5次吧！而且scan一張照片就收你100馬幣（約750新台幣），這麼便宜大多數主人還是不願意，因為他們都覺得沒必要，想要我們醫生只用手觸診的方式診療，他們一是理解不了X光片對診療的幫助，二是覺得沒必要花這個錢。」因此，迄今為止，美里所有寵物診所中所使用的X光機器都是「人」用的，意即截至目前為止，這裡都沒有任何一台動物專用的X光機器。

綜上所述，當地飼主普遍缺少對於結紮和X光檢查等醫療方式的理解，對上述這些醫療手段在寵物健康照護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因此多數飼主不會主動選擇這類醫療服務。由於需求不足，進口商和代理商也不會投入資源引進或推廣這些醫療設備和器材，使得當地寵物醫院即便有心提升醫療水平，也無法獲得先進的器械和專用設備。這種供需不平衡的現象進一步限制了美里市的寵物醫療資源，使得當地的醫療服務無法應對一些較為複雜的病例，進而影響了寵物的整體健康照護品質，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隱藏的風險。

4. 東馬，「包容」的社會

上開東馬的人狗互動，看似處處受限，然而在許多受訪者眼中，東馬卻是一個相較寬容的飼養環境。主要原因筆者認為大概是因為東馬的回教徒與狗有著「井水不犯河水」的共生關係。

因為在地文化的關係，與台灣的公寓式住宅不同，美里當地人大多住在獨棟住宅中，鄰里間很少有要共用空間的情形，D先生曾說過：「我住的社區是一個華人小區，在這裡養狗真的是在平常不過了，幾乎是一家一隻狗。因此在生活中不太會因為養狗而遇到生活上的困難。」在一旁的E小姐補充道：「我家的前後左右其實都是馬來人，但是他們對我的狗都沒有什麼意見耶！甚至會覺得我的狗很可愛。」D先生非常激動的插話：「對對對！我的馬來朋友甚至有摸過我的狗耶！！」我們笑了起來，這個故事彷彿讓我看到了一部分馬來人，在伊斯蘭教教義之下人狗的互動。

與之相比，西馬的社會氛圍對狗則顯得更為不友善，無論是社會觀念還是公眾空間的使用，對狗隻的接納度普遍較低。E小姐就說過：「和我們東馬這邊比起來西馬那邊的人比較極端，那邊種族歧視滿嚴重的，別說狗了，連華人在那裡讀大學都會被排擠。」與東馬相較，西馬似乎對於教義的遵守與要求更加地嚴苛，並且因為土地和人口密度的關係，一如其他寸土寸金的大城市西馬高樓林立，據E小姐說道：「大多大廈的管理條例都是禁止養狗的，住戶彼此間是非常排斥養狗這一行為的，若是被聽到狗吠或是被檢舉，就會被趕出公寓。」聽到這裡我才明白E小姐為何說「東馬是很包容的社會」。不過西馬也並非，一隻狗都沒有，許多有錢的華人會在自己建造的別墅範圍內養狗，養的也是非常昂貴的名種狗，套一句E小姐的話來形容這個畫面：「狗和主人走路都雄赳赳氣昂昂的！」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受訪者均指出，若放眼其他回教國家，其對狗隻的限制和禁忌更為嚴苛，狗經常被視為不潔之物，在社會中的形象有如「病毒」一

般，若是飼養寵物狗不免要飽嚙冷眼。B小姐就曾說過：「之前因為工作的關係時常往返東馬與沙巴兩地，當時因為寂寞所以買了一隻小狗作為陪伴。後來要返回美里的時候，因為要經過汶萊，不僅要申報，申請手續也非常複雜，而且就算我已經符合手續上的所有條件（施打狂犬病疫苗與晶片），汶萊仍然不肯放行，最後是我偷偷塞錢，他才讓我走的。」

（二）狗的社會形象

1. 關於那些「被消失」的狗

本研究既已探討美里人與狗互動模式與社會現象為目的，研究對象就不應限於寵物狗，流浪狗亦應包含在內。然而筆者觀察發現，美里市區內的街道上，幾乎不見流浪狗的蹤跡，原來竟是因為州政府為防範狂犬病，規定只要是「籬笆外、沒有被牽著」的狗，若是接到舉報電話就會一律撲殺。不過 Zero Strays 流浪動物收容中心並不認可這樣的做法。

Zero Strays 是美里最大的流浪動物收容中心，由 S 小姐負責經營與管理（非創辦人），目前收容了 300 隻狗和 70 隻貓，為了落實流浪動物「零撲殺」目標，因此目前中心內面臨著超額負載的窘境。而且令人震驚的是，如此龐大的動物基數，居然僅有 3 位年近 60 的老嫗負責照顧，具體怎麼照顧呢？S 小姐說道：「收容所內的工作算蠻重的，像是帶狗去醫院施打疫苗、晶片、結紮和身體檢查，除了醫療照護以外，還需要每天打掃堆成山的狗大便，不然牠們居住環境會很糟糕，當然還有補充狗糧，其中最為重要也最為勞累的工作便是抓狗。」所謂的抓狗就是趕在政府來「打狗」（殺狗）之前，把狗抓回收容所內，抓狗是一項相當辛苦並且與時間賽跑的工作，S 小姐苦笑著說：「以前我孩子還小的時候，接到消息又要去抓狗，孩子也不能丟在家裡不管，所以我只好把小孩子帶在身邊，我當時常常這樣去抓狗。」

這一抓，就是10幾年，Zero Strays自2013年成立已經拯救無數條生命，可如今卻面臨著被迫停止收容的困境，說到這裡S小姐已經紅了眼框：「我家裡已經養了6隻狗了，你覺得我還能再養幾隻呢.....永遠都救不完，300隻狗，只有3個人在照顧，你能想像60幾歲的人出去抓狗嗎.....這真的讓我真的越做越灰心.....」不過只要想到還有流浪狗正在接受著苦難，S小姐的「救狗之路」就會持續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流浪狗救援之所以辛苦，除了需要與政府爭分奪秒以外，更令S小姐絕望的是：「許多飼主們會拋棄他們的寵物狗。」S小姐就這樣說過：「我們之前有公開我們的地址，結果就很多人把狗丟在收容中心外面，但我們這裡實在收容不下了，只好把地址改成不公開。而且這裡的飼主很多狗養一養，不想養了，就把狗丟到路上，打電話給政府舉報，讓政府來射殺.....」

Zero Strays的存在讓這些受傷的小生命，得以在收容所內茁壯地成長。不過如此龐大的基數，也使人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事實：「美里流浪狗數量之多。」好在仍有S小姐等人，作為「狗」的社會安全網，溫柔地接住了那些與死神擦肩而過的流浪動物們。



(由左至右) 圖 23、圖 24

Zero Strays 內部環境相當整潔，設有專為狗隻處理食物的「廚房」，另有於收容所內出生的小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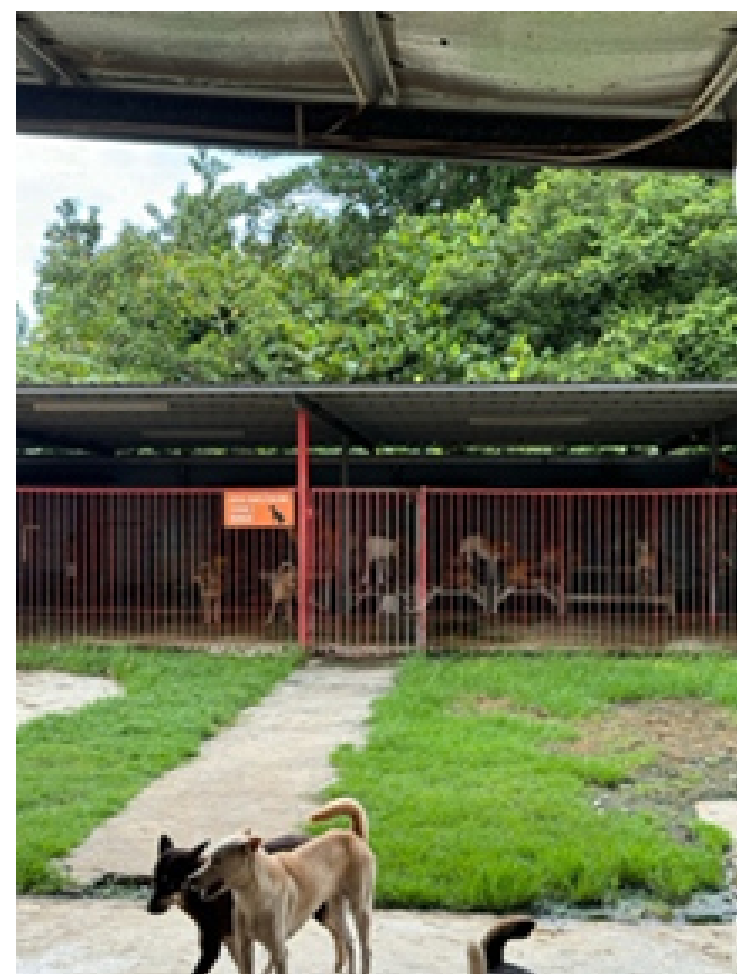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由左至右) 圖 25、圖 26

收容所內不僅毛髮蓬鬆，毛色富有光澤，明顯都受到很好照顧，地上也被清理得很乾淨，沒有任何排泄物，足見 S 小姐相當用心在照顧。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由左至右) 圖 27、圖 28

以柵欄分開飼養較有攻擊性的狗，其餘個性溫順的狗得以於收容所內自由活動。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除此以外，由於當局並未硬性規定狗隻必須結紮或接種狂犬病疫苗，這類

措施在民間的普及率一直偏低，正因如此，流浪狗繁殖的問題無法有效控制，導致路上的流浪狗數量不斷增加，形成政府不斷派出人力前去打狗，Zero Strays 需不斷前去抓狗的局面。

2. 狗的污名化

然而美里市長俞小珊對於打狗的這一行徑似乎也有苦衷。市長曾這麼說道：「當局就是這麼規定的，我們需要跟著他們的規定走，我們要防範狂犬病，而且若是市民打電話來說有狗，我們也不能當沒聽見不做任何處理。」

原來，為了防範狂犬病美里的「打狗」政策已經施行了6至7年有餘，無論是否攜帶狗牌，抑或已注射狂犬病疫苗的家犬，只要被發現於住家範圍外，都有可能被捕狗隊拘捕，且不得以任何理由領回家犬（圖29）。另外，砂拉越州政府亦有提供民衆電話，若是於街上看到狗皆可以通知政府前來打狗（見圖30），除了打狗以外，政府亦有提供免費的狂犬病疫苗，民衆可以攜帶自己的寵物狗前去施打。



圖29 關於狂犬病的新聞報導，市長強調只要是住家範圍之外的狗，一律以人道方式處決。

圖片來源：截圖自網絡新聞



圖 30 砂拉越州政府發佈的打狗電話。

圖片來源：截圖自網路

狂犬病不可否認地是一種致死率極高，並且難以治癒的疾病，其危險性非同小可。不過，這裡需要注意的是。砂拉越州政府在狂犬病的宣導上，似乎過度以「狗」作為宣傳地重心（見圖 31），狂犬病是一種人畜共患病，只要是四隻脚的溫體動物都有機會成為帶菌源，例如：貓、猴子、老鼠、浣熊、臭鼬、蝙蝠……等等，若是使用單一物種宣傳，極容易誤導民衆對狂犬病的認知，認為此病毒僅存在於狗體當中，而忽略了其他動物的危險性，進而與之接觸。為此政府應該採取更為全面的宣傳策略，參酌台灣的宣導海報（見圖 32），透過多元化的宣導方式，確保民衆擁有更全面的狂犬病防治知識，從而在預防措施上做出更明智的選擇。



圖 31 砂拉越州繪製的狂犬病宣導海報，海報上僅有以狗作為宣導的物種。

圖片來源：截圖自網路



圖 32 台灣的宣傳海報，海報上共有 6 種物種，提醒民眾並非只有狗會成為狂犬病帶源者。

圖片來源：截圖自網路

政府以新聞、海報等媒介直接提供電話讓市民檢舉，並派遣政府人員過來處理（抓捕並射殺）流浪狗，此種方式會加深人們對狗產生恐懼，且狂犬病海報上單純以狗的形象作為病毒的傳染源，更進一步加深民眾對狗與危險的聯想。除此以外，政府人員經常在眾目睽睽之下當街處置流浪狗，J 先生就說過：「政府的打狗小隊在小區裡面打狗，他們抓住其中一隻淺黃色的菜狗，牠奮力掙脫控制，卻也還是挨了一劑毒針，最後只能顛顛巍巍地走向公園深處，隨後倒在地上嚥下最後一口氣。而且那隻過世的菜狗，屍體也並未立即被回收，在公園內靜置了好些天才消失。」這對目擊者尤其是孩童造成了強烈的心理衝擊。上開種種，不僅加深了社會對狗的負面印象，亦可能提高民眾遺棄與檢舉率，並且由於並未實施強制結紮措施，流浪狗持續繁殖，形成了流浪狗數量遲遲無法減少的惡性循環。

筆者不敢斷言撲殺狗隻對疫情完全無效，不過筆者相信這樣的殺戮並非長久之計，那狂犬病又該如何防範？也許捕捉、絕育、釋放（Trap – neuter – return，縮寫為 TNR）或許會是一個好方法，TNR 是一種以人道方式管理和減少流浪動物數量的方法，藉由對流浪狗施以絕育手術，使之無法繼續進行

繁殖，從而控制流浪狗的增加速度，並且配合施打狂犬病疫苗，或許可以很好地抑制流浪狗與狂犬病問題，並且藉此緩解流浪動物中心「狗」滿為患的現況，以及解決政府需一直不斷派出人力打狗的問題。

(三) 未來展望

1. 逐漸消失的藩籬

筆者於訪談的過程中發現，隨著時代的推進，年輕世代的人們對於狗的接受程度往往越來越高。我的訪問者中以H小姐最為年長，H小姐曾說過：「我的女兒就有養狗，她常常把狗抱上床一起睡，而且養狗的花費真的很高，剪一次毛就要好幾百塊，我真的理解不了，之前試過阻止不過卻和女兒吵架，最後只好妥協。」

值得注意的是，據Y小姐所述，近日馬來西亞境內的馬來籍獸醫有日漸增加的趨勢，追究其原因竟是因為教育體制的關係。馬來西亞當局為馬來籍學生設立許多保障名額，Y小姐說道：「假設獸醫系一年收100人好了，大概只有10-20個名額是給華人，土著更少，其他的都是馬來人的名額。」日漸增多的馬來籍獸醫，促使越來越多的馬來人逐漸對「狗」改觀，Y小姐笑著說：「別說狗了，要當獸醫豬都得解剖，我的馬來同學還不是都這樣過來了。而且西馬那邊有一名獸醫網紅，他會把自己的行醫日常發上Tik Tok，當然裡面就包括幫狗診療。」這名獸醫的影片下雖然仍有來自其他人的謾罵聲：「你怎麼能碰狗！」、「你不是一個合格的伊斯蘭教徒！」，但同時也有：「Lovely Dogs（美好的狗）」此類溫情的留言，然而這些謾罵聲，並未使他停止他的步伐，他不僅持續更新影片，並且還相當以自己的工作為榮。

這名獸醫也並非例外，來自西馬的馬來籍男演員 Ben Amir 因為在 insta-

gram 發布了一張輕拍其山路嚮導犬頭部的合照（見圖 33），引起許多網民的不滿，他們在貼文下批評他違反伊斯蘭教義，更有甚者出言恐嚇要求他退出演藝圈，不過 Ben Amir 並沒有退縮，在受口誅筆伐之際，他不但保留了貼文，還發文為狗聲援道：「You cannot tell me these sweet beings do not have an amazing mind and soul. Dogs can teach us about love, life and companionship. (你無法否認這些可愛的生物擁有著驚人的智慧和靈魂。狗能教會我們愛、生活和陪伴的意義。)」（見圖 34）



（左）圖 33 Ben Amir 感謝狗狗一路的保護與帶領、

（右）圖 34 Ben Amir 為狗狗發聲。

圖片來源：截圖自 Ben Amir 個人帳號

綜觀上面所述，在文化鎔爐的馬來社會中，有跨越宗教藩籬觸碰狗狗的馬來人，亦有堅守教義拒絕與狗接觸的回教信徒，雙方都在各自的信念中擇善固執，這是一道沒有對錯的選擇題，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共生和共榮，在不改變對方的前提下，尊重對方的選擇。

四、研究結論與限制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以及文獻分析等方式，研究發現本研究以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以及文獻分析等方式，揭示了當地人與狗之間複雜的社會關係。在文化鎔爐的馬來社會中，有跨越宗教藩籬觸碰狗狗的馬來人，亦有堅守教義拒絕與狗接觸的回教信徒，雙方都在各自的信念中擇善固執，這是一道沒有對錯的選擇題，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共生和共榮，在不改變對方的前提下，尊重對方的選擇。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目前仍有許多挑戰需要解決。首先，當地多數飼主因為周遭環境以及氛圍，認為寵物狗每週出門一次就足夠，並且因為較少與外界接觸，亦無需結紮或施打狂犬病疫苗，然而醫生建議狗每天應散步 2-3 次，以維持健康和良好心肺功能，且不論是施打疫苗或是結紮，都是相當重要的醫療照護行為。目前台灣，已將「台灣動物保護法」納入刑法，若是未依規定為寵物施打疫苗將遭裁處新臺幣 3 萬元 ~ 15 萬元罰鍰，另外若沒有幫貓狗結紮且未提出申報，或未經申報即讓貓狗生小孩，可能面臨新臺幣 5 萬元 ~ 25 萬元罰鍰。上述顯示台灣社會上至政府下至人民，對動物保護的意識已有顯著的提升，與之相較，美里作為一個友善的旅遊城市，似乎在人與狗的互動中，仍以人作為主要的考量對象。

其次，當地的寵物醫療設備和環境有待提升，例如應放寬醫療設備進口限制，並提供補助以強化當地的寵物醫療資源。此外，政策方面也需進行調整，以結紮代替撲殺以控制流浪狗數量，並避免以過度針對狗隻的方式進行宣傳，這些政策的改進將有助於改善狗在當地的社會形象，打破惡性循環。

最後，本研究因研究時長、語言不通等因素，因此仍有許多問題未完全的深掘與探究，筆者由衷希望本研究將拋磚引玉，使更多人關注美里乃至穆斯林社會之中人狗互動文化中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

附錄

表1 各研究對象代號與資訊介紹

10 位飼主	年齡與職業	結識方式
A 小姐	40 歲+，直銷	透過客家公會介紹
B 小姐	30 歲+，貿易	透過客家公會介紹
C 先生	30 歲+，直銷	A 小姐介紹
D 先生	20 歲+，大學生	A 小姐介紹
E 小姐	20 歲+，大學生	A 小姐介紹
F 小姐	30 歲+，直銷	A 小姐介紹
G 小姐	30 歲+，不願透露	於公園中因遛狗結識
H 小姐	50 歲+，教會幹部	同學的訪談對象
I 小姐	40 歲+，美容業	同學的訪談對象
J 先生	30 歲+，健身教練	Z 先生（詳情請見下文） 介紹
Tolly Pets 實體寵物店	年齡與職業	結識方式
Z 先生與 L 小姐	30+，Tolly pets 老闆與老 闆娘	透過客家公會介紹
Bettie Veterinary Clinic & Surgery 獸醫診所	年齡與職業	結識方式
X 先生與 Y 小姐	40+，獸醫與獸醫診所老 闆	透過客家公會介紹
Zero Strays 流浪動物收容中心	年齡與職業	結識方式
S 小姐	40+，管理收容中心	透過客家公會介紹

學術論文組（高年級）

【優等】

科學城大學：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內的 半導體行動者看大學、半導體世界的關係

林于婷

人文社會學系

作品介紹

本文探討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如何與臺灣半導體產業緊密連結的研究，透過歷史回顧與訪談、並關注「矽世界」的發展脈絡，描述交通大學如何透過電子工程教育、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培養大批半導體人才，並與新竹科學園區形成共生關係。此外，文章也探討了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浪潮下，高等教育機構的「企業化」現象，以及產業界如何影響學術發展，進一步深化大學與半導體產業的互動模式。最後，揭示陽明交大如何在人才培育、技術創新、土地與資源整合等方面，成為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關鍵支柱，並探討大學在科技發展中的角色與挑戰。

一、前言

「交通大學自1958年在臺復校迄今62年，成為推動臺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搖籃，更培育出無數頂尖人才，在世界電子科技領域中攻下一席之地。臺灣科技發展的歷史中，充滿著許許多多交大人努力奮鬥的故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

1980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立，40季年後的今天，竹科製造全球所需一半以上的晶片（也就是積體電路或IC），以及超過90%的先進製程晶片。從1980年代生產計算機、電子錶與按鍵電話必須用到晶片的工業基地，到現在成為啟動筆電、平板、智慧手機與AI設備的先進製程晶片的供應鏈中心，竹科因此被稱為臺灣的「護國神山」。「護國神山」的背後，是依靠許多不同的機構、組織、技術、研究、勞工結合，所達成的「產業神話」。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目標在於使臺灣從日益衰退之傳統產業，轉型為以高科技為製造為主的經濟結構；而其政策執行方式主要是「仿效矽谷模式」，對內藉由連結企業、學術單位、研究機構、大學來形成一個「良善治理」、適合科技產業聚集的環境（蔡偉銑 2014: 429）。其中，從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規劃、成立，到其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的數十年間，交通大學在各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行動者，從原本為一教育、研究機構，嚴然已經演變成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一部分」，透過培養大量的科技人才，支撐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技術。隨著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技術物的演變（矽的擴張、進化）（從CMOS晶片到半導體），交通大學也隨著該技術物的蓬勃發展，改變其培養人才的方向。從「交大電子系/所」，到最新創立、由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所出資的「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更彰顯交通大學與「矽世界」中心的強烈連結，也代表交通大學，身為一個教育機構，已然成為科學城多重宇宙中的一個中心宇宙。

「交大60多年來已培養近10萬『交大幫』，在電子產業形成不容撼動的影響力，交大幫貢獻台股總市值達45%。前20大企

業中的7家電子業，交大校友皆擔任這7家企業的創辦人、董事長、總經理。」¹

「竹科的多重宇宙」課程，探討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將之視為一個宇宙政治過程，並將竹科看成是多重世界的構成，其中，「矽世界」正在成為該宇宙的主導力量，試圖壓制其餘世界臣服於其規則之下。²然而，本文試切入「矽世界」的中心之一——研究、教育單位，也就是目前筆者所就讀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分析從原為提供高等教育功能的研究機構，因為「矽世界」的主導力量，進而演變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最大的勞力、技術、資金、甚至是土地擴張的單位（如璞玉計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座落於新竹市大學路，緊靠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在科學園區籌備之初，政府提及成立科學園區的目地之一為「推動工業機構與學校之建教合作，為八零年代科技世界預作準備。……」。而台灣科學工業園區應以新竹高速公路特定區最為適當，因該區已有優良之學術環境：精華大學、交通大學工學院、工研院等……。」³在選址的過程中，美籍專家也再次強調，成功的科學園區需有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支撐，而新竹的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與工研院正可辦這樣的角色，成為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推手。陽明交大自新竹建校以來，以理工科系為其擅長領域，擁有權國最領先的科技研發（製造臺灣第一部電腦、第一部電視發射機、第一台雷射、第一枚電晶體、第一個積體電路、成立我國第一座半導體實驗室等），也培育出最多的IEEE Fellow、最多的工程領域的美國工程院及中央研究院院士，並且在業界有將近約500位總經理或董事長及校友。⁴其中，交通大學在民國104年所成立的「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更是因為「矽世界」所影響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內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最直接的範例。

因此，本文試以焦點人物訪談，進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的世界，分析此研究、教育機構中的人/非人物體，是如何被吸收進入「矽世界」的？在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中的行動者相互的運作方式為何？高等教育在科學城、半導體的發展中該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¹ 63年見證筆路藍縷到群山拔起，交大幫盼再建台灣護國醫療山。科技網，李鴻運，2021-07-02。

² 竹科的多重宇宙，課程介紹。

³ 科學園區籌建計畫草案（國科會、經濟部、教育部報告），50頁。民國六十六年元月十一日。

⁴ 林慧宜（2007）。「企業型大學」介入高科技地域發展的嶄新經驗：以國立交通大學推動「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為例。

二、文獻回顧

(一) 科學城治理的新挑戰

新竹自科學工業園區計畫以來，出現更多別於以往城市地景的大樓、工廠、高速鐵線和晶片廠房，從而確保了新竹地區的人口與工商服務業數量增長50%。新自由主義化將世界帶入了另一個新時代，以往都會區域 (metropolitan regions) 的擴張行動，也形構出新都市問題。

(二) 新自由主義及星球都市化下的 (科學城) 大學

而面對新時代的新現象，必須尋找或創造出新的觀念，才能有效再現新的現象與掌握新趨勢。如今，在新自由主義與星球都市化 (planetary urbanization) 下，面對巨型都市 (多核的、跨越多個國家、超越任何單一都會區域) 之間的競爭壓力，政府無法只單單一倚靠中央政府的幫助，形塑出所謂帶動產業的「科學城」，商業協會、貿易團體、銀行、研究機關、大學成爲參與經濟發展與科技現代化計畫的行動者，甚至被「企業化」。而交通大學在新竹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如此，從一開始的提供教育與研究的象牙塔角色，到如今演變爲與產業界相生、或是支撐產業界的勞動力輸送帶。

三、「成為」科學城大學之路

(一) 「為國所用」的新竹交通大學

在科學城內，有兩所支撐著新竹科學城技、研究的大學機構，一爲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二爲國立清華大學。不過，現今兩所大學在科學城內所扮演的行動者功能大不相同，交通大學明顯更擁抱矽的世界，甚至爲科學城壯大、擴張

之重要力量，而為何緊鄰科學城的兩校，會造成如此差異呢？讓我們從兩校在新竹復校之初開始比較。

新竹清華大學復校的起點源自於梅貽琦先生，時任教育部「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1953年，他在美國收到政府電報，請他負責籌備復清華大學事宜，梅貽琦決定先設立原子科學研究所，培養核能專業人才。

而新竹交通大學的復校原因，源自於旅美校友趙曾珏博士。1950年代，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雷達研究，當時美國電晶的發明，讓電子科學進入新的時代，因此其倡議中華民國政府應成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以培訓電子工程人才為國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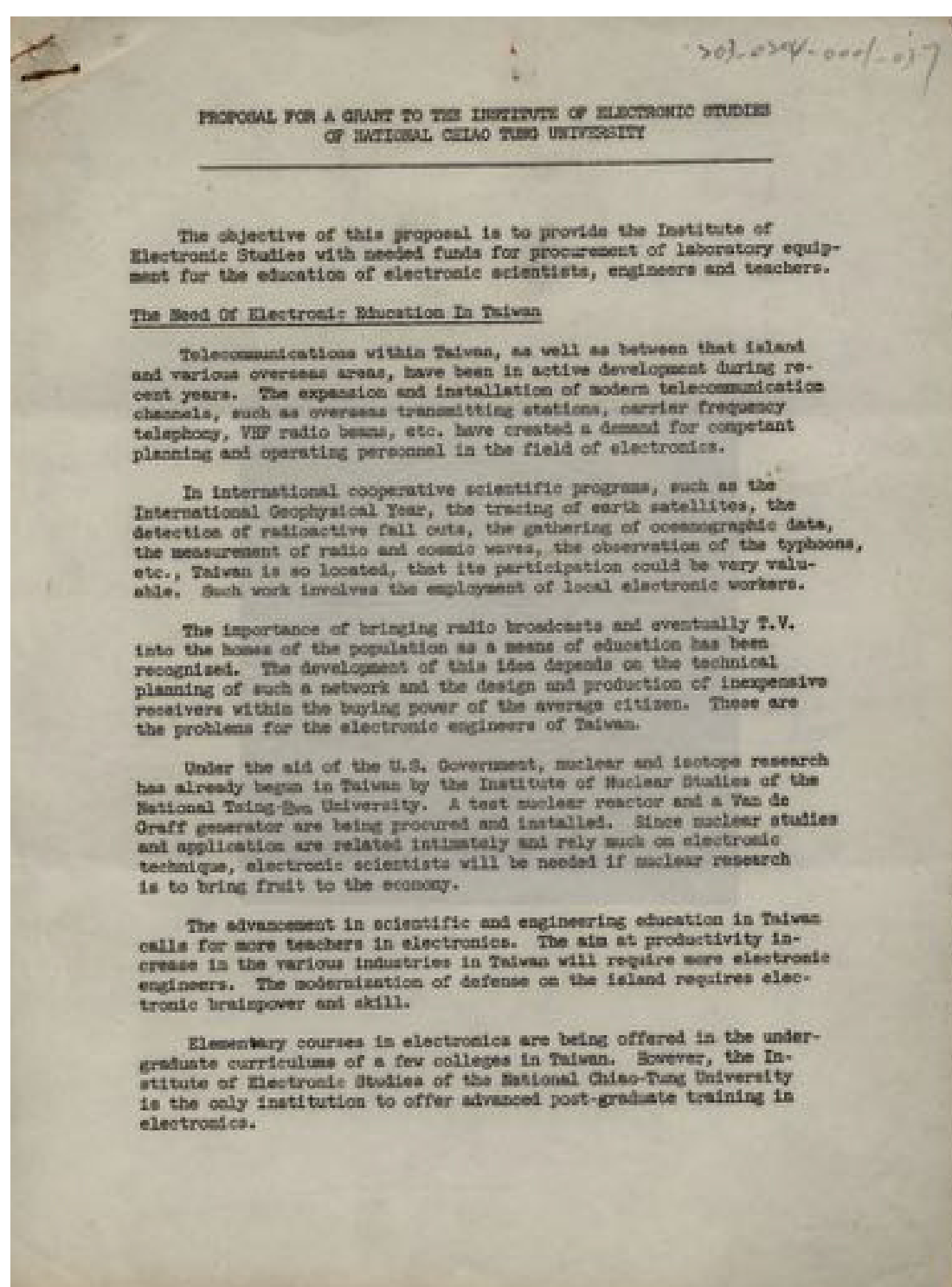


圖1 Proposal for a Grant to Th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Studies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⁵

⁵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籌備委員會（1958）。 *Proposal for a Grant to Th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Studies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交通校區典藏，典藏號：203-0204-0001-037。此份檔案為籌備新竹交大復校時，向美國申請設備、經費補助之文件。內容提及臺灣交通大學設立的必須性：「近年來，臺灣境內以及該島與海外各地區之間的電信一直在積極發展。現代電信渠道得擴充套件和安裝，如海外發射站、載頻電話、高頻無線電波束等，對電子領域的競爭性規劃和營運人員產生了需求。」

當時的政府也想要發展半導體產業，而這必須就要有充足的專業人員。爾後，其促請在習之教育、交通、經濟及國防四部長官，協助電子研究所建立，並由教育不籌備交通大學在台復校事宜，並聘請前校長陵鴻勛為主任委員，李熙謀為副主任委員；校地則由新竹縣政府捐贈土地，在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⁶中提及：「研究所找地點很困難，剛巧新竹縣長鄒滌之非常熱心，他曾在內地求學，並且是學電學的，他對於研究所設在新竹很感興趣，因為清華大學已在新竹復校，他認為二個很有名的大學能設在新竹，感到非常興奮，願由縣政府捐給交通大學所需要的一部分土地，既然有這樣的憑藉，就籌備起來了。」由上述可知，新竹交通大學與新竹清華大學的成立（包含教育方向、人才培訓、校地、教師、籌備委員、校地等）與國家機構及發展規劃可說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關係，可以說是在以「為國所用」的目標下，籌備兩所大學，而兩校選擇的人才培訓方向卻大不相同。筆者認為這也是新竹交通大學為何有別於清華大學，是新竹科學城「得天獨厚」的發展夥伴。

國立交通大學研究院電子研究所課程草案

一年級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應用數學 I (Applied Mathematics I)	3	應用數學 II (Applied Mathematics II)	3
電子迴路 (Electronic Circuits)	3	網路理論 I (Network Theory I)	3
網路理論 II (Network Theory II)	3	電磁理論 I (Electromagnetic Theory I)	3
總計	6	總計	9

* 應用數學 I 程度相當於補大數學本科數學 I 及 II 校三學分，兩科計算於碩士學位所第三、四學分之內。

二年級			
一、電信組 (Communication System)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基礎理論 I (Electromagnetic Theory I)	3	微觀電子學 (Microscopic Electronics)	3
通信科目 論文	3	論文	5
學術討論	0	學術討論	0
總計	9	總計	8

二、電子管組 (Electronic Tube System)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電子物理學 (Electronic Physics)	3	真空管 (Vacuum Tubes)	3

圖 2 品名：國立交通大學研究院電子研究所課程草案⁷

第一屆電子研究所課程研究草案，可見電子學及電磁學相關課程。

⁶ 沈雲龍訪問、林能士、藍旭男紀錄（1982）。《口述歷史叢書》，〈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

⁷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籌備委員會（1958）。國立交通大學研究院電子研究所課程草案，交通校區典藏，典藏號：203-0204-0001-040。

當時外界一想到半導體研究，就想到交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國內只有交大有相關的研究設備，可以做實驗。1964年任職於西屋電氣公司的交大校友凌宏章捐贈一組簡單的晶圓測試儀器，並在電子所所長李熙謀的支持及聯合國專家 McNall 的指導下，建立了臺灣第一座半導體實驗室，後與張俊彥、郭雙發教授合作，成功研製矽平面電晶體，這是臺灣第一顆自行研發的電晶體。

1966年，在凌宏璋教授的指導下，研制出臺灣第一枚積體電路，這可以說是臺灣半導體產業的起點，也是科學城發展茁壯的種子。從那時起，半導體課程的研究與教學就成為交大電子所的重點教學之一，交大在那段期間，成立電子工程系的博士班。為了與世界接軌，交大1968年董浩雲講座支持下，聘請國際知名電子物理學者施敏博士回台任教一年，教授半導體元件理論，這也開啓國念半導體學術研究與高等研究人才訓練之先河。而張俊彥教授是施敏在臺灣的一為學生，也是交大培育的第一位本土工學博士，並於1964年與張瑞夫、郭雙發共同建立臺灣手作半導體研究中心（Semiconductor Research Center, SRC），一手推動建立國家毫微米元件實驗室，之後為了推動國內IC設計產業發展的大型計畫，矽導計畫也是由張教授擔任主持人。

（二）1970年代：科學城的起點——新竹交通大學

新竹交通大學不僅開啓臺灣的半導體教育，也是影響臺灣積體電路產業先驅。臺灣最早的三家半導體公司，都與施敏、張俊彥有關。施敏成立第一家台灣本土半導體公司環宇電子，而張俊彥成立萬邦電子與集成電子。萬邦電子是臺灣本土第一家電子電晶體封裝廠，1971年由張俊彥教授在新竹新豐鄉設立，由交大負責技術研發，萬邦負責生產，可以說是國內半導體產學合作的首例。此外萬邦也僱用了多位交大電子系的畢業生，包括台積電總經理曾繁城、聯電集團執行長劉英達、聯瑞積體電路總經理許金榮、雷添福、蔡藤村、戴寶通等人累積半導體實務經驗，多位工程師後來也成為半導體產業的核心成員（張欣茹等 2006：67）。⁸

⁸ 許增如（2019）。台灣邁向半導體產業王國之路—以發展型國家理論詮釋臺灣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歷程（1974-2018年）。〔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vge73m>。

爾後，臺灣政府才開始介入半導體產業發展。1974年，臺灣政府在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及日後的電子所），負責積體電路工業的推展，以電子錶為技術引進的載具，自美國引進積體電路設計及製造技術。⁹1975年，當時國科會主委徐賢修認為，新竹有清華大學、交通大學、食品研究所與工業技術研究院等研究機構，科技氛圍濃厚，因而倡議將「科學工業園區」設在新竹。徐賢修向當時的正院長蔣經國建議設置「科學工業園區」的必要性是：「在政治上可以號召旅居海外一流科技人才回歸建國，樹立國際形象；在經濟上，影系統的輸入所需的工業，對國內工業的製造管理與市場方面可產生啟發作用；在教育上可推進建教合作，提供高級知識學人以及大專畢業生有挑戰性創業與就業機會；在國防上可配合國防工業之發展，因為高科技設計製造能力是國防工業的根本。」（徐賢修 1995）。工研院於1975年決定委建「CMOS 示範工廠」，所成立的招標審查委員會，張俊彥亦是其中一位委員，因而選定 RCA 電晶體技術。1977年，臺灣首座生產七微米、三吋晶圓的積體電路示範工廠於工研院竹東院區落成，開始生產電子錶 IC（陳鸞鳳 2018：393）。同年，新竹交通大學半導體中心納入教育部正式編制，執行國科會國家電子大型研究計畫，並支援全國各大專院校從事半導體研究。1976年工研院的CMOS Pilot Plant 關鍵幹部：曾繁城、劉英達、陳錦塘、黃顯雄、邱羅火等都是從交通大學半導體中心畢業的博士或碩士，也成功地完成了CMOS 的研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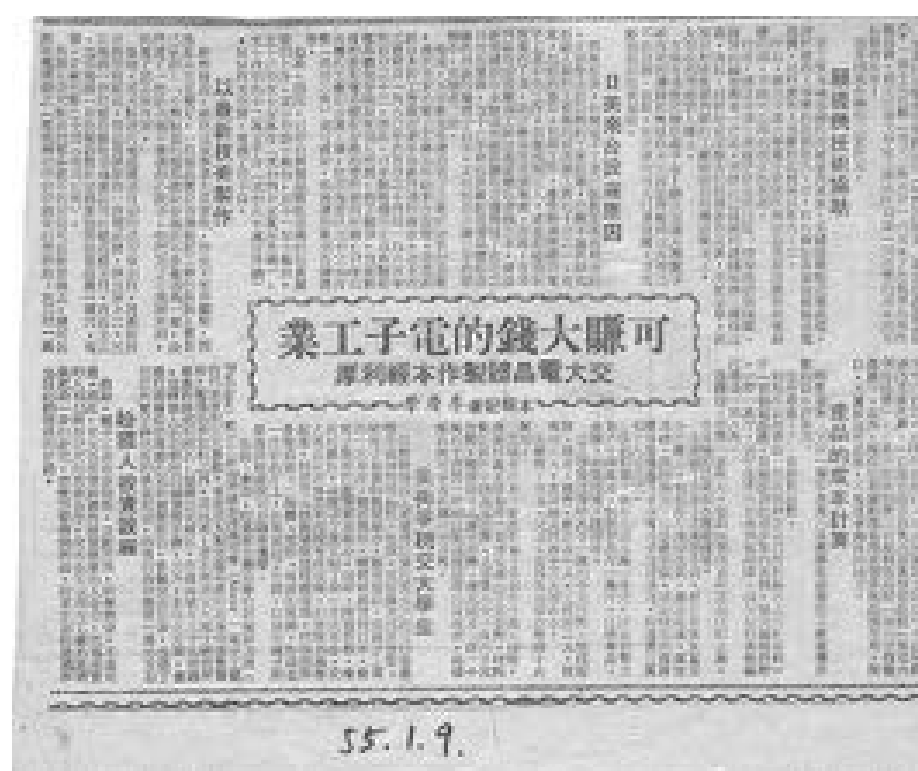


圖3 品名：報紙剪報，郭雙發教授提供。

1966年報紙大幅報導交大電晶體製作技術新、成本低、外國徵聘
交大學生，當年交大講師郭雙發呼籲國人投資設廠。

⁹ 半導體產業。台灣工業文化資產網。文章網址：<https://iht.nstm.gov.tw/form/index-1.asp?m=2&m1=3&m2=75&gp=21&id=2>。
檢索日期：2024年6月20日。

(三) 1980 年代 ~ 2000 年：科學園區與大學的相生

「如果以整個80年代來看，在前期交大的大學生畢業出國比例還是會比較高，像是我們常常都需要幫學生寫很多推薦信，讓他們去申請國外的學校，但是到了後期人數就減少很多，甚至還出現了只有個位數的狀況。主要原因在於隨著臺灣半導體產業廠商的增加，其他電子相關產業也帶動起來，整個產業市場對於人才的需求大增，就漸漸有比較多的交大學生選擇在臺灣唸研究所，或是直接進入就業市場。中後期以後，交大研究所畢業生直接投入到電子相關產業的人數也更多了，自然影響到出國求學人數。我想，這是1980年代交大學生跟臺大學生在出路選擇上算是不太一樣的地方，因為在當時大學生都仍然以出國為優先選擇的時候，已經有不少交大學生投入到臺灣正在發芽的半導體產業中就業，從基層的代工中取得經驗，然後再去進行提升，這就是為什麼早年竹科裡面幾乎都是交大人，而後出現有所謂的「交大幫」這樣的稱呼。」

——無我心寬：吳重雨口述歷史

1980年代，聯華電子、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先後成立，新竹科學園區裡也開始有了熱絡的產業活動，而早先演練人類-金屬連結的新竹交通大學，也提供科學城大量的工程師、創意家（勞動者），成為科學城運作的要素之一。在1987年，張俊彥返回交通大學，擔任交通大學研發長，並在任期內推動在交大設立國家毫微米元件實驗室，其在當時是國內大專院校擁有最完善半導體製程設備的實驗室。當年電子電機科系的碩士班、博士班同學，若要研究半導體相關技術，十之八九必須向國家毫微米實驗室借用設備做實驗。

(四) 2000 年 ~ 現今：——新竹交大

「期交通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以史丹佛大學與矽谷產

業界結合為學習對象，積極引入外部資源及企業化經營，此實為本校永續發展及晉身世界頂尖大學的不二法門。……結合創新育成研發園區的發展，以提升本校的競爭力。……回顧交通大學的發展歷程，空間不足是最大之痛，在高等教育競爭日趨激烈，各校紛紛重新佈局，擴大發展規模之際，為確保本校的學術領導地位及校友的社會影響力，本校應積極籌設新的校區。」¹⁰ (周素卿 2007: 10)

2000年，新竹交通大學參與「璞玉計畫」，協助地方政府執行其計畫，目的在於無償取得璞玉計畫範圍內的一百公頃的土地作為交大新校區。相較於其他大國立大學被動地等待土地撥用，交大擁抱科學城，利用科學城發展計畫，主動取得土地。自此，交大也成為矽世界併吞土地的媒介。

2002年，張俊彥於校長推動「國家矽導計畫」。該計畫是以產品導向為基礎進而推動及發展的策略，主要目標有三大方面：（一）建立全球設計平台；（二）開創矽智財中心；（三）推動創新設計產業。在以上三個目標及重點之下，決定台灣發展系統單晶片（System on Chip），使得台灣IC設計及製造產業互相鏈結，大大提升台灣半導體科技層次，同時順應產業及科技發展的潮流。在「國家矽導計畫」之下，積極引進矽導專長種子師資，因此，台大、清華、交大、成大及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在IC設計及製程教授名額均大大增加，落實相關課程的開授及人才培育，以此利用種子師資的優質人力，可以發揮矽導計畫的人才培育訴求、及研究水準的提升。張院士亦積極推動「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以「前瞻創新技術研發」為主軸，期望在未來幾年內，能建立台灣豐富的矽智財（SIP）、整合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EDA），藉此提供優質的IC設計環境，供台灣及全球系統設計廠商使用。如此垂直整合的效果，將使得台灣在半導體、資訊與電子產業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¹¹

2015年，新竹交通大學獨步全球，創立世界第一個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¹⁰國立交通大學璞玉計畫暨新校區推動小組（2000）新校區展望。文章網址：<http://www.nctufamily.com.tw/nctu1.asp/>. [2006.11.16]。

¹¹育才無數，臺灣半導體界開路先鋒——張俊彥院士，蘇炎坤，科技大觀園網。文章網址：<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3/detail?ID=7b1d5e16-7e8f-4060-a788-1fd7391fec72>。

主要目標是為臺灣半導體產業培育國際性的人才，並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等知名工學校合作雙聯學位、課程等，為臺灣半導體人才培養接上世界的軌道、也使世界半導體人才進入臺灣半導體教育界，而筆者將會在下一章節對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模式有更近一步的解析。

「林奇宏校長表示，因應全球半導體產業人才多元需求，除需要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也需要跨領域、跨文化的人才。台灣身處半導體產業供應鏈重要戰略地位，在政府力推半導體高階人才培育計畫後，陽明交大除成立產業創新研究學院培育高階人才，同時將觸角延伸至大學部基礎人才的培育，於今年8月成立半導體工程學系籌備處，宣示擴大半導體人才庫，以及啟動培育半導體人才之新里程碑。陽明交大電機學院成立研究型大學第一個半導體學系，將是擴大半導體人才「向下扎根」最關鍵的一步。」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學院¹²

2023年，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將設立「半導體工程學系」，設立原因為半導體產業的人才缺口現象，此也為培養高階半導體人才——技術物的演練者，之勞動訓練工廠。從新竹交通大學復校時設立「電子研究所」，到如今設立「半導體工程學系」，代表著新竹交大在與台灣其他國立大學參與地方截然不同的角色。筆者認為，原因起因於新竹交通大學一路以來探索矽世界、結合矽世界的軌跡，幫助新竹交通大學接軌新竹科學城發展計劃的列車，而同時身為列車長與乘客的新竹交通大學，將繼續與半導體產業一同駛向矽世界的終點。

四、科學城大學內的行動者

(一) 設立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民國110年，政府通過《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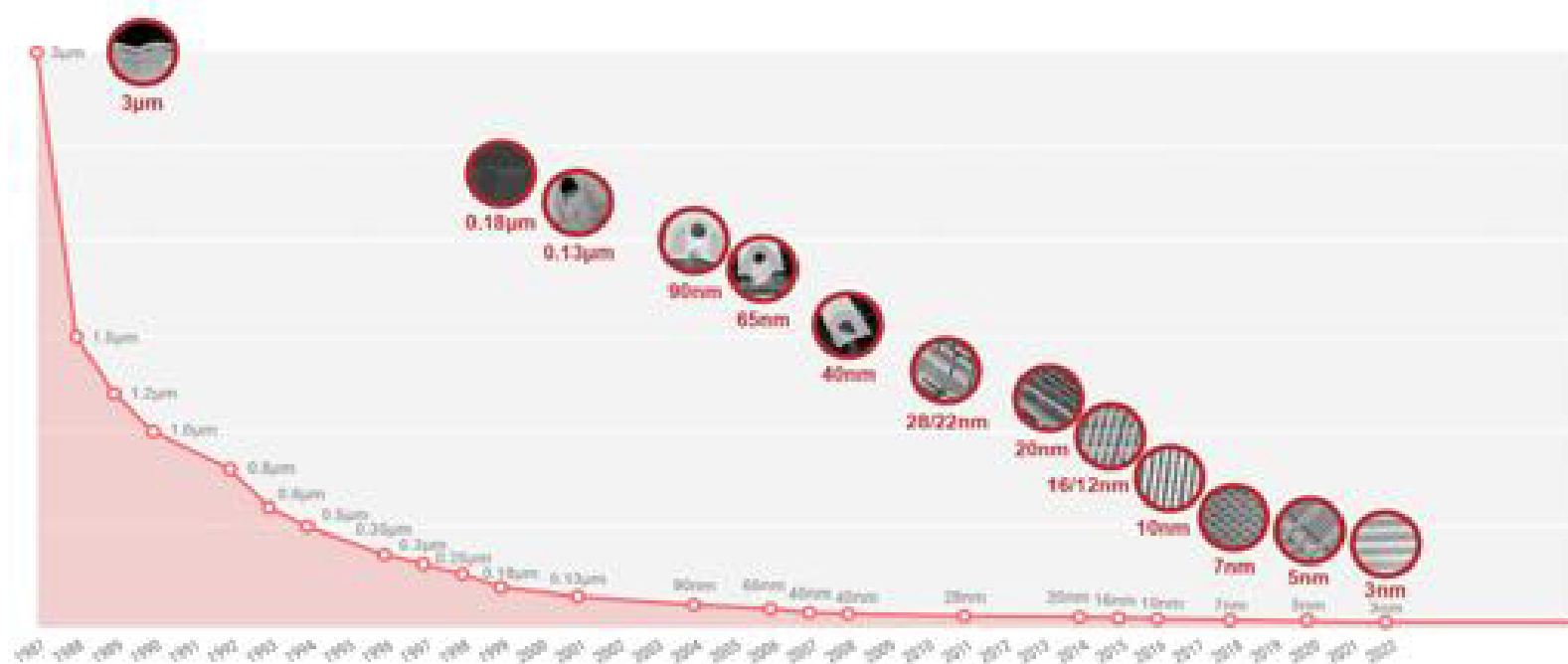
¹²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學院（2023），電機學院「半導體工程學系」明年招收第一批學生。文章網址：<https://ece.nycu.edu.tw/latestevent/Details.aspx?Parser=9,3,23,,,2357>。

(簡稱創新條例)，鬆綁部分教育法令，鼓勵產學合作，在國立頂尖大學設置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產官學共同培育人才，也助人才能無縫接軌進入產業，隨之法條下，六所半導體產業學院因法而生，而新竹交通大學早在2015年已率先「全球」，成立「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不過，「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的成立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民國102年的產業學院補助計畫，而是因為當時教育部推動大專院校國際化計畫，並讓學校自行訂定策略及深化優勢特色，而創立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的張翼院長當時就根據新竹交大的特色，創立了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他說：「台灣半導體研發是從交大起家，學院成立之初，更與前台積電技術執行長、現中央研究院院士胡正明教授，共同執行科技部支持的國際頂尖異質整合綠色電子研發中心計畫 (I-RiCE)。回顧台灣半導體發展的歷史，從過去與國外企業、實驗室合作，一路走來發展到今，實力全球有目共睹。然而，要在技術、研究、結構上有所突破，必須與國際接軌，培育更多優秀人才，方能更上一層樓。如何在激烈的競爭力中一路領先，基於這樣初衷、框架而成立了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¹³。除此之外，當時的臺灣半導體產業也出現了兩個危機，一項是人力缺乏——碩博士半導體研究人力的缺乏¹⁴、中國廠挖角台廠的人才，造成半導體產業的人才斷層及外流；另一項則是技術的限制——摩爾定律的極限¹⁵，「摩爾定律」(Moore's Law)由英特爾共同創辦人摩爾(Gordon Moore)提出，說明晶片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量，每兩年變成2倍，這也就意謂電腦的運算速度每隔兩年會變成2倍；同樣運算速度的晶片價格每兩年會變成二分之一。但隨著半導體製程微縮至奈米以下，摩爾定律是否還能突破物理極限、持續發揮功用，一直是半導體產業界的研究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2014年，全球第一個以半導體產業導向定位的國際化學院——「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應運而生，設有奈米學士班(民國113年更名為半導體工程學系)、碩士班、博士班三種學位學程，課程結合電機學院(電子、電機)、工學院(材料、機械)、以及理學院(電子物理、應用化學)，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培育具全球移動力的專業高階人才，鞏固台灣半導體產業於國際上之影響力，最終希望學院研究能引領產業，產業能支持學院。

¹³【高教育才】護國產業人才危機 半導體學院成解方？，科技生活網。文章網址：<https://www.techlife.com.tw/Article/41006>。刊登日期：2014年10月21日 4 14

¹⁴林佳誼、鄭婷方，人才大斷層！半導體三大寧靜危機，遠見網。文章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20966>。刊登日期：2015年9月30日。

¹⁵尹慧中，張忠謀：摩爾定律將死 但物聯網應用帶來新機會，鉅亨網。文章網址：<https://m.cnyes.com/news/id/986169>。刊登日期：2014年3月28日。



**圖 4 台積電公司歷年的積體電路製程演化，
可以看見從 2011 年的 28 奈米快速縮小至如今的 3 奈米。**

圖片來源：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 一個竹科勞動力的誕生

2016年，在臺北醫學大學護理系就讀的淇姊，因想當醫生而選擇重考，但重考的成績卻不如預期，醫學系大多採生物科，而她的高分科目卻是物理與化學，他回憶，當初老師拿著落點分析的紙張給他，上面清一色都是清、交大的理工科系，這也打消了她攻讀醫學院的念頭。根據自己的成績優勢、以及對理工科領域的不確定性，她便選擇了涵蓋不同理工學院領域的奈米學士班，因為奈米學士班的課程設計是從四大核心課程（主要有兩項領域：半導體材料及固態電子元件領域、半導體晶片設計與微系統整合領域；四項課程：半導體物理與元件、半導體製程、數位積體電路，類比積體電路）中，選擇兩項修讀，也就是不必馬上選擇自己要專精哪個領域，是一個有「過渡期」的科系。一開始入學的她並沒有對自己所念的科系有什麼太大的思考，直到系上舉辦的「學長姐回娘家」活動，她才發現原來自己所選的科系與半導體、新竹科學院區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當時她內心驚呼道：「原來我所學的課程，未來就是要去科學園區工作啊！」，所以大二時，她早早的就開始步入進入半導體產業的路。

第一步，就是準備推甄碩班。她提及，在大學階段時，班上的導師便一直

鼓勵同學未來進入碩士班，以便在半導體產業獲得更優渥的薪資。大二下，爲了順利推甄碩士班，她便以大學生身份加入某專題研究，該專題研究的指導教授來自材料與工程學系，主要研究方向爲半導體製程後段的封裝。第二步，就是進入碩士班。她回憶，當時她的大學同學幾乎都選擇進入碩士班，而沒進入碩士班的同學，大多數都沒有繼續待在半導體的產業內。不過因爲淇姊大學時成績並不優異，加上對於其他研究領域的興趣，所以推甄時她轉向申請先進材料半導體實驗室。她形容，與產業鍊下游的後段封裝相比，先進材料半導體是更貼近半導體元件的研究，也能更認識半導體產業的樣貌。因需研究半導體元件材料，她也開始踏進「無塵室」做實驗。她提及，學生進入無塵室的控管非常嚴格，學生需先修習與相關課程，再來要進行無塵室的公安考試，最後則是進入無塵室內每個不同機台的機台考試，爲的就是減少無塵室內機台的損壞，也可見學生在進入無塵室前的道道關卡。在短短的一年碩士生涯中，她也感受到台灣半導體產業在世界的重要地位，而自己也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感覺就像自身的研究正在推動著世界的進步，也堅定自己想要進入半導體產業的想法。爾後，她便決定要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爲何這麼亦然決然？她認爲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就半導體產業來說，擁有不同學位的求職者，薪水條件有天壤之別。二，認爲在學生階段直接就讀碩士班是機會成本很低的選項，若工作後才決定要讀博士班，那還需承擔辭職的機會成本。三，除了整個產業的趨勢以及教授、學長姐的推動外，博士班提供的獎學金也很優渥，所以不用擔心錢的問題。以上三項原因，將她推向了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的最高學位——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博士班。

在博士班內，她開始執行許多與半導體內的知名企業進行產學合作案，包含穩懋半導體、台積電、鴻海等，大多都是與該公司的研發部門進行研發新製程方案、或是新材料的合作，她解釋，因爲業界公司大多不想冒險使用公司的機台進行實驗（因其有可能因爲新材料而造成機台的污染或損毀），而跟學校單位合作不僅可以請學界使用學校的機台實驗，也可以與學界共同研發新的方案。對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的實驗室來說，產學合作也是一個必要條件，因爲他們認爲學界需要與業界結合，才不會有閉門造車的情況。

最後，我詢問她認為交大（或是高教、大學）在半導體的世界內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與產業界的關係為何？她認為學校與產業界是互利共生的狀態。因為考慮到獲利，有時產業界在研究上會相對保守，不過學術界沒有獲利的問題，所以學術界的研究可以大膽的刺激產業界（產業界都會派出代表參加半導體的研討會）；而產業界又會提供許多實務經驗及研究經費，支撐學界研究。不過，不管是學術界或是產業界，她都認為這是一個擁有非常大競爭力的領域，因為該領域的所有行動者都在搶盡先機、以及刺激創新，所以身為研究者的她也很常擔憂自己的研究會無法創新。

五、結論

從新竹交大在臺灣復校，到如今新竹交大設立半導體工程學系，我們可以看到新竹交大在半導體產業代表著不同的角色，也與產業、研究單位有著不同關係。1964年，張俊彥等人創立臺灣第一間半導體實驗室，培育了第一批半導體的人才；1966年，交大半導體實驗室成功研發出臺灣第一枚積體電路，開啓臺灣半導體產業的先機；1971年，交大張俊彥院士等人就在新竹縣創立臺灣第一家電子電晶體封裝廠——萬邦電子，而其與交通大學的技術合作，也可說是半導體產學合作之始；1976年，交大執行國科會國家電子大型計畫，主要研究半導體元件及積體電路技術發展，在臺灣的1970年代可以說是除了工研院外，研究半導體的重鎮；1980年代，臺灣的半導體製造商增加，縱使民間並不看好半導體的發展，新竹交大仍培育了許多半導體的基層工程師進入半導體產業，讓這批基層工程師先於其他大學的人才，擁有半導體的實務經驗；1990年代，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提出，新竹交大也創立了國家毫微米實驗室，這也是當時臺灣最齊全的半導體製程設備的實驗室，筆者認為這也代表新竹交大將半導體與半導體研究單位元素吸納，並融入大學的半導體教育；2000年代，新竹交大執行矽導計畫及璞玉計畫，矽導計畫欲引領整個臺灣半導體產業升級、而璞玉計畫則是與政府合作，以科學城發展計畫取得校地。新竹交大透過產業、政府、研究單位的緊密合作，成為半導體產業發展方向的引領者，也是半

導體世界併吞土地的行動者。如今，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與半導體工程學系的創立，也代表著交大與產業、研究單位的關係改變，不僅只是研究計畫的合作、或是單向人才的流入，而是產業、研究單位與大學共同進入大學端培養半導體人才。至此，產業、研究單位與大學共同為臺灣半導體教育鋪上一節節高速鐵路軌道，滿載著半導體世界的行動者，投身半導體世界的下一個極限。

附錄

(一) 訪談大綱

- 甲、家庭背景
- 乙、請以時間線梳理你從高中到目前為止的「學習」歷程
 - i. 此學習不侷限於正式的學習方式，可能包含：印象深刻/學到最多的課程、某老師的專題、某老師的實驗室、講座、產學合作計畫、競賽、實習、社團等。
- 丙、請問您當初為何會選擇就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奈米學士班
- 丁、請問您當初為何會選擇就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所
- 戊、請問您當初為何會選擇就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際半導體博士班
- 己、請問你目前/將來有打算進入半導體產業嗎？
 - i. 你覺得這個產業吸引你的最大原因是什麼？
 - ii. 你覺得你目前在半導體的世界裡面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 iii. 你希望未來的你可以在科學園區/半導體產業內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 iv. 你覺得交大在半導體的世界內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二) 報導人資料：淇姊

- 甲、2013.9 - 2015.6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系
- 乙、2017.9 - 2021.6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奈米學士班 110 級
- 丙、2021.9 - 2022.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碩士班
- 丁、2022.2 - Now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博士候選人
- 戊、研究領域：氧化物半導體與鐵電元件的開發與優化。
- 己、研究工作：增強記憶體儲存系統的功能和效率的先進半導體元件的設計、製造。

參考文獻

- 尹慧中，2014，〈張忠謀：摩爾定律將死 但物聯網應用帶來新機會〉，《鉅亨網》，3月28日。<https://m.cnyes.com/news/id/986169>，取用日期：2024年6月17日。
- 吳重雨，2023，《無我心寬：吳重雨口述歷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 李鴻運，2021，〈63年見證筆路藍縷到群山拔起，交大幫盼再建台灣護國醫療山〉，《科技網》，7月2日。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id=0000613699_0P172PNB8CSR9XL7C3V5A。取用日期：2023年4月22日。
- 沈雲龍訪問、林能士、藍旭男紀錄，1982，《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第1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林佳誼、鄭婷方，2015，〈人才大斷層！半導體三大寧靜危機〉，《遠見網》，9月30日。<https://www.gvm.com.tw/article/20966>。取用日期：2024年6月17日。

林冠年，2023，〈星球都市化：新竹都會區域發展的理論初探〉。《建築與規劃學報》23 (1&2): 1-31。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6068238-N202308260007-00001>。

林慧宜，2007，〈「企業型大學」介入高科技地域發展的嶄新經驗：以國立交通大學推動「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論文。 <https://doi.org/10.6342/NTU.2007.01298>。

科技生活網編輯部，2021，〈【高教育才】護國產業人才危機 半導體學院成解方？〉。《科技生活網》，4月14日。 <https://www.techlife.com.tw/Article/41006>，取用日期：2024年6月17日。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09，〈半導體業〉。《台灣工業文化資產網》，無日期。 <https://iht.nstm.gov.tw/form/index-1.asp?m=2&m1=3&m2=75&gp=21&id=2>，取用日期：2024年6月20日。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學院，2023，〈電機學院「半導體工程學系」明年招收第一批學生〉。《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學院》，9月28日。 <https://ece.nycu.edu.tw/latestevent/Details.aspx?Parser=9,3,23,,,2357>，取用日期：2024年4月20日。

莊雅仲，2021，〈「老鷹回來了」：從新竹科學城到有機共和國〉。《考古人類學刊》95: 45-87。 [https://doi.org/10.6152/jaa.202112_\(95\).0002](https://doi.org/10.6152/jaa.202112_(95).0002)。

許增如，2019，〈台灣邁向半導體產業王國之路——以發展型國家理論詮釋臺灣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歷程（1974-2018年）〉。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https://hdl.handle.net/11296/vge73m>。

陳鸞鳳，201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發展〉。頁391-407，收錄於韋煙灶主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300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黃應貴、林開世主編，2019，《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臺北：群學出版社。

蔡偉銑，2014，科學園區籌建計畫草案（國科會、經濟部、教育部報告），50頁。民國66年1月11日。

蘇炎坤，2018，〈育才無數，臺灣半導體界開路先鋒——張俊彥院士〉。《科技大觀園》，10月16日。<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3/detail?ID=7b1d5e16-7e8f-4060-a788-1fd7391fec72/>，取用日期：2023年6月20日。

學術論文組（低年級）

【特優】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 一天的實錄》中以馬廷奈家為例 比較台灣鄉村的社會型態

蕭廷睿

人文社會學系

作品介紹

以《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天的實錄》中馬廷奈一家為例，試圖分析兩個家庭中的組成以及家庭成員間的互動，並進行比較，最後再歸納整理。希望透過兩個家庭間的比較，進一步推論貧窮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當中的影響力，且嘗試探討貧窮是否為影響家庭成員向上流動的主因。

在初讀這本書時，就深刻地感覺馬廷奈一家的生活值得深入探討。馬廷奈一家的組成結構完整，除了父輩是近乎典型的大男人主義外，子輩自身的互動與父輩的互動，都很值得進行分析，並探究其互動的方式，進而推展到一家人的相處模式。這一家人的生活背景與台灣早期農、漁村，這類以第一級產業為主村落的生活模式大相逕庭，於是我想透過尋找兩者相同之處，討論在兩個鄉村社會中人們如何生活。

首先，我想在馬廷奈一家的家庭分工及成員的互動上多著墨，接著延伸討論相似的模式如何存在於台灣鄉村社會中。

要了解馬廷奈一家就必須從父親——丕多羅談起。墨西哥是相當典型的父系社會，一個家庭的誕生、組成絕對和一位父親推不了關係，父親在家中大多也是一個絕對威權的存在。我們得以看到，丕多羅在家中最主要負責的分工是出外耕地賺錢，身為家中唯一且至關重要的經濟支柱，丕多羅必須勤勞的工作維持家計。但令人扼腕的是馬廷奈一家無法守住錢財，作者在這裡特別使用一句「他們前一天的收入，都會在第二天用盡」來暗示馬廷奈一家並無儲蓄的概念。對於這項說法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其實馬廷奈一家並非無儲蓄觀念，而是他們根本無法進行儲蓄。從丕多羅的角度看來，他想做的事情並非縮衣節食留下那豆點大的財富，而是進行一場投資。

丕多羅的投資並不在自己的莊稼上，他與許多台灣農村的經典案例一樣，付出許多資源在自己的兒女身上。我們可以從他對大女兒孔威塔給予相當高度的期望上發現。丕多羅的做法和我的外公相似，兩者都是必須倚靠農產品養家糊口的男人，對於下田耕作這件事情，他們都認為是由男人負責的工作。於是，丕多羅培育大女兒前往師專，希望他成為老師以後可以讓家中的經濟得到舒緩；我的外公的六個小孩都是女兒，所以外公的作法是讓最會讀書的大女兒好好讀書，不需要參與家庭代工。將資源集中投注在一個孩子身上，這種孤注一擲的作法在台灣相當常見。

接著我想談談丕多羅對於威望、權力的抱負。丕多羅在村落裡因為在天主教與基督新教間游移使得村民對他頗有微詞。雖是如此，但我看到的並非村落，結構的鬆散與否，而是信仰如何為一個傳統村落帶來莫大的影響。在丕多羅的例子中，我們得以知曉村中的人由於無法接受丕多羅加入基督新教而對他感到反感，這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情。人們總是會對新穎而未知的事物感到害怕，因此我認為村民這樣的反應並非全然是厭惡，當中必定包含了畏懼的情緒，他們害怕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被顛覆。因為在以教會為中心的村落中，信仰一定多少與權力產生掛勾。依照這樣的推論看來，人們對丕多羅感到畏懼就有了另一種解釋。

同樣的，在台灣亦是如此。我們不難在許多鄉村地區的聚落中看到宮廟的存在，在我的經驗當中，宮廟不但是一群信仰的中心，更是最早期的集會所。在原住民的文化中有因部落討論事情時而誕生的集會所，宮廟就是漢人社會的集會所。除卻決定村莊的大小事，更是當地居民談笑風生的地點，因此宮廟之於教堂。我的外公所居住的村落位於桃園新屋的蚵間，在這個村莊當中一樣有一間廟宇在居民們的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地位——福興宮。福興宮以七位夫人為主祀，七位王爺為副祀。因為七位王爺是主要出來替信眾辦事的神明，加上台灣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根深蒂固，於是當地誕生了由各家男性所組成的王爺會。王爺會主要處理宮內事務外，對於村莊的影響力也不可忽視，因為村莊中許多事宜與福興宮掛勾，於是信仰中心也間接成為權力中心。

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西方社會、東方社會，信仰在一些政府權力無法到達之處，或是居民根本無法理解任何規範的小型社會裡發揮極大的作用，甚至間接成為社會規範。人們會質疑國王的命令，卻不會質疑耶穌說過的話；人們會謾罵政府頒布的法令，卻對神明的指令格外注意。而這樣的信仰中不乏人為的干涉，所以生活在這些地區且想觸碰權力的人，就必須從信仰下手。當然，這裡並不是批判有心人士透過信仰綁架多數民衆，而是單純討論一項事實。因為我們無法肯定每個個體想觸碰權力的目的為何。

以父親爲主的段落結束後，無法忽視的一定是家中的總管母親——埃斯丕蘭扎。埃斯丕蘭扎在我的解讀中是一段典型的女性悲歌，從嫁給丕多羅以後就注定無法幸福。其實這一切也和丕多羅當初迎娶埃斯丕蘭扎的目的脫不了關係。丕多羅要的是一個乖舛且刻苦耐勞的妻子，並不是一位與他共持這個家庭的夥伴。埃斯丕蘭扎在他的生命裡也一直處於被動選擇的角色，這件事情讓埃斯丕蘭扎嫁給丕多羅這件事情後成爲了一個悲劇。她無法對自己的生活有主控權，而是接受、適應丕多羅所做的決定，更難過的是，她必須適應丈夫外遇的事實。在家中已經貧困至極的情況下，埃斯丕蘭扎必須專注於如何維持家計，讓一家老小不餓著肚子，還得承受來自丕多羅的審視，就算埃斯丕蘭扎做的再好依舊比不過那位會讀能寫又曉得賺錢的優拉利亞。是阿，人總是想辦法得到自己無法獲得的東西，貪婪並不會因爲貧窮而消失，而是因爲擁有的已經夠少，於是不該獲得的，就會被無止盡放大。

不過，小女兒馬克利娜似乎看破了這件事情。她和母親不同，她安於現狀且享受現狀。從馬克利娜對於婚姻的看法就能發現，她並無法接受男人像父親丕多羅那樣對待他的另一伴。我想，或許是馬克利娜的世界不夠大，她過著半軟禁的生活外，生在小村落的她沒有辦法見識到各式各樣性格不同的男性。因此不會嚮往愛情，更不可能談到婚嫁。馬克利娜對於婚姻的態度除了受到母親的影響外，也受到姐姐孔戚塔的影響。孔戚塔對於婚姻的態度無論擺在哪個時代都令人髮指。原有大好前程的孔戚塔遭到家暴後還反覆回到丈夫身邊，雖然作者並未描寫馬克利娜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但她一定無法苟同這件事情。畢竟，沒有人願意看到自己的家人受苦。

與馬廷奈一家相似的是：我的外公也有女兒，且他的孩子都是女兒。外公與外婆的感情也相當融洽，並沒有丕多羅對埃斯丕蘭扎那樣的行爲。或許是外公對於女兒們戀情嚴格把關，或許是女兒們從小觀察父母間的互動。我的五位阿姨（最大的阿姨已於中學時期因白血病離世）的歸宿都還不錯，嚴格來說我們似乎不能進行一個如此不嚴謹的比較，但我想表達的僅是原生家庭是如何影響孩子。這樣的影響也不一定有著理論公式，孔戚塔與馬克利娜就有了不一樣

的抉擇。

最後，在經過一輪的比較下，我赫然發現其實無論貧窮與否並不能成爲一項定義家庭互動的依據，貧窮是一個背景、框架，生活在貧窮的家庭要如何在這個背景下生活、創造無限的可能最終還是必須回歸到人的身上，尤其是決策者的身上。我母親的家庭雖說不和馬廷奈一家貧窮，卻也曾經是一個貧窮的家庭。兩個家庭由於家中威望最高的父親對待一家人的方式不同，也產生不同的結果。這並不是一個可以歸納出正解的事情，我們也僅能以自認爲不好的事蹟爲借鏡，莫走冤枉路，有能力時也幫助別人別踏上這段路。我想，這就是一個就讀人文社會科學系的使命吧。

學術論文組（低年級）

【優等】

朝鮮女足的強盛

——威權統治下的自然性

王泓鈞

人文社會學系

作品介紹

在人類學的學習當中，「自然化」這個族群發展中的其中一個概念讓我帶來啟發。本作品以朝鮮女子足球隊的成功為例，探討威權體制下「自然性」如何影響社會價值的形塑。透過政治宣傳、社會制度與階級誘因，國家意識與愛國情懷在人民心中被內化，使「為國爭光」成為驅動運動員拼搏的核心動力。本文結合「想像的共同體」與「自然性」的概念，試圖理解北韓女足在嚴格體制與有限資源下，如何展現強韌的競技實力與團隊凝聚力。

本研究不僅關注體制如何影響個人意志，也希望引發對於群體向心力與社會動員的思考。當個人信念與集體價值相互交織時，形塑一種共同目標。這樣的凝聚力值得深思和學習。

一、前言

韓國統一部發布了《2024年北韓人權報告》，在其中，由脫北者的證詞中歸納北韓（朝鮮）居民的生活處境，包括資訊控管、人身自由等人權迫害。一直以來，北韓的人權議題都是在國際上經常受批判的破口。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北韓的女子足球隊贏得了20歲以下女足世界盃冠軍，淘汰賽中擊敗了西班牙、美國和法國；同一年，朝鮮17歲以下女足贏得了U17世界盃桂冠。這引發了一個矛盾的問題：在資源極度匱乏、資訊受嚴格控制的環境下，為何北韓女足能夠在世界舞台上展現如此卓越的競技實力？

對此，我想到了老師在族群與種族的單元中有提及過「自然性」的概念。這種概念是一種社會建構，使特定的文化、意識形態、權力結構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存在。連結到上述議題，北韓透過政治宣傳與社會制度，使特定的價值觀（如對領導者的忠誠與為國爭光的使命感）內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讓其權威和統治被視為無需質疑、難以更動的情況，就屬於自然性所掩蓋的結果。

這種自然性的現象，以致「愛國主義」在百姓的心中逐漸播種，增強北韓人民堅韌的民族性。所以，北韓人民對於國家、統治者的敬愛和尊重，讓「為國爭光的使命感」紮根。而以此凝結的「團結」，也許就是朝鮮女足奪牌的致命武器。

二、內文

（一）紀錄片《HANA, DUL, SED》

布裏吉特·韋爾奇（Brigitte Welch）這位奧地利電影製作人花了5年時間跟拍北韓女足，他獲得了前所未見的許可能夠實體與北韓女足接觸。在紀錄片

中，他說：

「其實北韓女足就跟其他就跟北韓大多數事情有著相同的跡象，國家對於女足運動的超級影響力源於地位最高的那個男人。當然了，她們會把每件事都直接向領袖匯報。沒有他的指導、支持和需要，這些就不會發生。」

從他的這幾句話中，我深度地感受到「愛國主義」深耕在女足運動中。追本溯源，這種愛國主義到底是如何潛移默化地植入北韓人民的潛意識當中，促使愛國主義不斷被自然化（自然性的過程）。進一步地來看，我們還可以探討「想像的共同體」如何透過「自然性」的機制發揮作用。

(二) 想像的共同體

從族群的角度切入，「想像的共同體」簡單來說是一種特殊文化中的人造物，其並非天然存在，而是透過歷史、政治與文化建構出來的社會想像。

從北韓的威權統治來看，金氏家族 3 代掌權近 70 年，在此期間，三位金氏統治者（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不斷塑造「主體思想」的意識形態，強調人民需完全效忠勞動黨的偉大領袖。在這其中，領導階層和平民百姓逐漸產生階級，並且，人民也會共同爲了領導者和國家而產生尊敬和忠貞。甚至，他們還會利用一些洗腦手段，例如，統治者尊稱、生辰日作爲節日和打造雕像等等。

久而久之，當這種意識形態逐漸自然化後，在北韓人民心中的這種階級地位絕對是理所當然的，這就導致了民族意識與國家忠誠之「想像的共同體」誕生。

(三) 階級制度下對於加入女足運動的誘因

布裏吉特·韋爾奇 (Brigitte Welch) 說：「進入國家隊還意味著可以出國，朝鮮人不經允許是不能出國的。」其實，參加國際賽事讓他們有機會見識到外面的世界，接觸不同文化、觀點和生活方式，這種經歷不僅能夠打破國家的界線，還能夠開拓自己不同的視野。

韋爾奇又說：「住在平壤而不是農村地區，似乎是一種特權。」而作為首都的平壤，資源和機會往往比農村地區更豐富，生活條件也更好。因此住在平壤似乎成爲一種特殊的地位象徵。

由這兩個誘因，能夠看出在階級制度下，人們想要向上流動的野心。從球員的角度來看，這不僅是一種國家的榮譽和責任，更是一種少數人才能夠享有的「特權」，使他們可以弭除些微的國家限制。或許，這是讓他們重新審視自身所處的環境的機會，但更具體的說，這暗示了在嚴格的階級結構下人們內心深處的渴望和追求。

三、 結論和啟發

「我跟拍的球員說，『這些美國人比我們高很多、壯很多，因為她們吃得飽，有我們沒有的很多東西』。但我們的意志非常強大，無人可比。就我來看，她們都熱愛足球，但領袖和國家才是最大的動力。」韋爾奇回憶道。的確，從女足球員的口中說出來的語氣是非常真摯的，這種偶像崇拜、愛國主義似乎已經完美地融入北韓人民的生活中了。

在布里吉特·韋爾奇的紀錄片和見證中，北韓女足的成功反映了其威權體制下的社會動員模式，並展示了「自然性」的力量如何塑造人們的信念和行動。這種對國家領袖和集體榮耀的追求，並不單單來自一群單純熱愛足球的年

輕女孩，而是根植於深度層次的文化塑造和國家意識形態。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何在賽場上她們能夠發揮出如此強大的韌性和決心。而最終，這種內化的責任感與使命成爲了她們在比賽中超越體能劣勢、擊敗他國隊伍的無形動力。

對我而言，建構在某種不論是球類運動或是國家的熱情上，這種純粹的炙熱真的很吸引我。撇開北韓極端的迫害人權行爲，這種真摯的向心力，不正是社會所需要的凝聚嗎？倘若，我們都正向地朝同一個共同的信仰而努力著，何嘗又不是一件好事？

得獎作品
(文藝創作組)

文藝創作組

【特優】

在雨中尋回的溫暖

王泓鈞

人文社會學系

作品介紹

這篇散文講述了一場大雨中的心靈碰撞。女孩與敘述者共同經歷的瞬間，從對一位老人的冷漠無視，到女孩內心的反思和懊悔，最終他們重回尋找那位老人，並得知他在別人幫助下成功趕上火車。故事圍繞著善意與自責，展現了日常生活中的細微關懷與人性中的溫暖。女孩的善良和內心的掙扎，強調了每個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傳遞善意，改變周圍的世界。

這篇散文源於我對「善意」這一情感的深刻思考。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常常忙於自己的生活，而忽略了周圍那些需要關懷的瞬間。這篇散文我希望藉由一個看似平凡的小故事，提醒我們每個人，無論是隨手伸出的援手，還是一句關懷的問候，都可能帶給他人關懷和溫暖。而這種善意，雖然不求回報，卻能在無聲無息中帶來世界的溫暖與希望。

關懷他人所散發出的「善」來溫暖；有時也像黑夜裡的燭光，即使微弱，也能，有時像冬天下的暖陽，在刺骨的寒冷中，為人們帶這份善照映前方的路，驅散一片陰霾，為周圍帶來光亮。

群帶來生機；是無私的，如大樹傾其一生，為眾意是純粹的，像清澈的溪水，在寧靜的山間中潺潺流動，為河流中的魚生庇蔭，卻從不計較回饋；是真摯的，如陽光灑落大地，毫無保留地將光明與希望帶給世界。

風雨在街上不斷拍打，街角燈光在雨中顯得格外模糊，潮濕的空氣和冰冷的體感也逐漸瀰漫整個城市。撐著傘的我跟女孩，此時正匆忙躲避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雨。這時，一位低矮的男人，手上拿著一塊破舊的紙板當作遮蔽大雨的工具，從我跟女孩的正前方迎面而來。他走過來，撥開那塊破舊的紙板。這時，出現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被大雨淋濕的老人。雨水打濕了他破舊的衣衫，並且，身形疲憊，駝背的姿態讓他顯得更加佝僂。他緩過身子，用低喃且遲緩的語氣向女孩詢問：「請問，現在幾點了呢？」女孩露出一股疑惑的表情，似乎沒有聽清楚老人詢問的話。然而，當時的我正忙著帶著女孩過街避雨，雨滴沿著雨傘滴落，腳邊積水已經不斷泛起漣漪。而且，因為紅綠燈已經在倒數，4、3、2……，我必須趕緊帶著女孩過馬路。所以，當我看到她沒有立即回應，僅是帶著些許困惑的神情，我便以為沒什麼大礙，拉起女孩的手，快步穿越馬路。

又走了一陣子，雨勢漸小，不過，女孩的面色看起來越加凝重，她眉頭緊鎖、步伐沈重。女孩突然說：「我想了一下，他剛剛好像是在問我時間欸？原本，我以為他是奇怪、莫名其妙的人，因此我的身體下意識地避開那個老人。現在回想，他似乎僅僅是用很單純的口氣詢問我現在的時間。」她繼續若有所思地繼續說著：「我沒幫助到他，如果他錯過火車，又或者是錯過了很重要的約，在老人不太會用手機的情況下，他孤立無援該怎麼辦？」我回答：「他會

繼續去問別人，沒關係的。」他又回答：「如果其他人也像我一樣直接避開、不理會呢？」女孩的話中，不斷散發著無所作爲的自責。她停下脚步，看向街道的那一端。那裡依舊燈影朦朧，行人來來往往，老人早已不見蹤影。但她的內心，卻像是被滲透進雨水，變得沉甸甸的。

我看著女孩憂鬱的神情，感覺自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其實這也沒辦法怪妳，因為我們大多數人看到陌生人，第一反應都是防備，而不是幫助。今天，你不是害了他……」我停頓了一下，思考接下來的話語。女孩卻沒有等我說完，低聲喃喃道：「但我也沒有幫到他。」女孩不斷被內疚的陰霾籠罩，善良的內心受到挑戰，掀起了愧疚的波瀾。

她低下頭，深吸一口氣的說：「小時候，我有一次放學後在學校門口等媽媽來接我。可是，那天下了大雨，她一直沒來……我站在屋簷下，穿著濕透的衣服，看著來來往往的家長，把一個又一個小孩接走。我想問路人借電話，可是沒人願意理我，他們只是匆匆地看我一眼，就快步走開了。」她苦笑了一下，「我記得，有個阿姨把雨傘舉高，像是害怕我會沾濕她的衣服，然後就頭也不回地走掉了。當時的我，站在那裡，覺得自己像是個透明人，或者……根本就不重要。」我愣住了，原本只是想安慰她的我，這時候才發現，這場大雨不只是淋濕了她的衣服，也揭露了她內心深處的一道疤痕。

「如果是你，你會停下來嗎？又或者是，你會回頭去找他嗎？如果，我內心的愧疚過意不去，還是我回頭去找看看，能不能有機會幫助他。」女孩打起精神的說。

陰霾散去，雨後的太陽逐漸探出，我們踏上回程的路上，決定回頭幫助那

位老人。重回當地，低窪的水坑仍舊積滿雨水，空氣中瀰漫著發霉的泥土味。「你看那邊！」女孩很驚訝的說。我向前看，看到的是被雨淋濕的紙板被遺棄在地上，似乎是那位老人留下的。不過，特別的是，紙板的旁邊，掉落了一張微濕的紙條，上面寫著：「下午16:00，要記得上火車，桃園火車站前站的大門進入，往南下的自強號，兒子上。」果不其然，老人其實只是想要詢問當時的時間，以趕上那班前往南部的火車。

女孩看著那張微濕的紙條，手指顫抖地拾起它，目光緊盯著上面的字跡，聲音有些發抖地說：「他真的……只是想問時間……」她的眼神從紙條轉向我，眼眶泛紅，語氣裡帶著懊悔：「如果……如果他因為錯過火車，見不到他的兒子呢？如果這是他們很久以來唯一一次的相見機會呢？」她深吸了一口氣，像是在壓抑內心洶湧的情緒，然後說：「我連回頭去看的勇氣都沒有，甚至還把他當成了奇怪的人……」話到這裡，她終於忍不住，淚水沿著臉頰滑落。她緊咬著嘴唇，輕聲自問：「如果他真的沒趕上火車，那會怎麼辦？他會不會在這座城市裡徹夜徘徊？會不會在寒冷的雨夜裡，孤單地坐在某個車站的長椅上，等著一班永遠不會來的車？」

我輕輕地握住女孩微顫的手，語氣放柔：「妳真的覺得，這是妳的錯嗎？」如果妳真的冷漠無情，現在根本不會站在這裡，更不會因為一個陌生人而掉淚。」我還繼續努力地安慰著他：「妳的心，會這麼痛，不是因為妳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妳太善良了，妳比誰都希望這個世界能夠更好。而妳的心意是真誠的，而這份善意，終究會影響妳遇見的每一個人。或許下次，妳會停下腳步，也或許，妳會提醒別人也多看看身邊的人。而這樣的影響，遠遠比單次的幫助或許來得深遠。」

就在女孩低頭懊悔的時候，一道溫和的聲音從身後傳來：「你們是在找剛剛那位老人嗎？」我們倆同時回過頭，看見一位中年男子站在不遠處，手裡拿

著一把已經收起的黑色雨傘。他看起來剛淋過雨，衣袖還帶著些許濕漉漉的水痕，但神情卻很輕鬆。他走近幾步，對我們露出一抹微笑：「剛剛那位老人，我有幫他攔了計程車，送他去火車站了。」女孩的眼神驀地一亮，急忙問道：「真的嗎？他趕上火車了嗎？」男人點點頭：「是啊，他原本在路邊看著時間，顯得有些焦急，我就過去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他必須趕上火車，因為他的兒子等著他，可是他剛剛問人時間時，沒有人理會他。」男人笑了笑，「還好，他的火車還沒開。我看雨下這麼大，就直接幫他叫了車，讓司機載他到車站去了。」女孩緊抿的嘴唇微微顫抖，眼神裡透著驚訝和感激。「所以……他應該趕得上，對嗎？」她輕聲確認著，像是在尋求一絲安慰。男人溫和地點頭：「沒錯，他應該已經見到他的兒子了。」女孩的身體微微放鬆，原本緊繃的肩膀也稍稍垂下，她慶幸的笑著：「還好……真的，還好有人幫了他！」

我看著她，輕輕地說：「妳看，這個世界並不會因為我們的一次錯過就變得冷漠無情，總有人會選擇伸出援手，而這份善意會一層層地擴散開來。」女孩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點了點頭，嘴角微微上揚：「嗯……但我希望，下次我也可以是那個停下腳步的人。」

雨後的天空逐漸放晴，太陽從雲層間探出一絲光芒，將濕漉漉的街道染上一層溫暖的顏色。空氣中瀰漫著清新的泥土氣息，水珠從葉片緩緩滑落，在陽光下閃爍著細碎的光澤。

女孩輕輕伸出手，指尖觸碰著被雨水浸濕後更加透亮的花瓣，眼中閃爍著純粹的溫暖。她的善良不張揚，像這場雨後的陽光，悄然無聲地灑落在人們的心上。她總是默默地關心身邊的人，為受傷的小動物留下一點食物、為陌生人遺落的物品細心放置、為疲憊的朋友送上一句輕聲的問候。她的善良不需要言語宣揚，卻能在人們最需要的時刻，帶來體貼與力量。

我開始反思，自己是否也曾忽略過這樣的小小善意，是否曾經錯過過身邊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她的存在，像一盞柔和的蠟燭，點亮了我內心深處那片渴望被溫暖的角落。她身旁，我感受到一種無需言語的安慰，也許這就是那種無法言喻的力量，女孩讓我重新相信，這個世界依然充滿著美好和希望。

或許，這場大雨不僅洗滌了街道，也讓世界變得更加清澈明亮。善良並不總是轟轟烈烈，它可以是無聲的守候，是不求回報的付出。這份溫柔，像是涓涓細流，悄然改變著周遭的一切，卻又讓人感覺到它的無限力量。

文藝創作組

【特優】

濁水溪上的渡口與渡船媽

廖鎮邦

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作品介紹

《濁水溪上的渡口與渡船媽》是一部以濁水溪沿岸渡口文化為主題的繪本，透過圖像與敘事，重現台灣河川渡口的歷史與信仰。濁水溪是貫穿南投連結彰化的障礙與孔道。在南投境內，濁水溪畔的兩岸居民交通往來仰賴渡船，形成獨特的「渡口文化」。其中，「渡船媽」的信仰，象徵著人們對於安全渡河的祈願。

本作品的創作靈感來自於「台語講古：名間地方故事繪本」計畫，原本期望以台語傳承地方故事，但在執行過程中，考量到讀者接受度，最終改以華語呈現。作品透過細膩的繪圖與故事敘述，希望讓讀者理解濁水溪的過往。

本作品曾參與地方文化計畫，並獲得來自南投縣文化局的支持，但未曾投稿其他比賽。期望透過本次金筆獎，讓更多人認識台灣河川交通的歷史記憶。



濁水溪上的渡口

與

渡船媽



我們是渡船媽，兩位守護濁水溪兩岸旅人的神靈。在這片土地上，我們看見了無數的人們，他們帶著希望與敬畏來到我們的面前，祈求能夠平安渡過這道灰色的濁水。我們守護著他們，就像當初唐山到臺灣，守護他們渡過「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的黑水溝。

在還沒有混凝土防波堤的時代，灰濁溪水每三十年就分岔為虎尾溪、西螺溪、東螺溪，不定時在雲林或者彰化奔馳、呷人、吞沒兩岸的每一寸田園、每一寸房舍！

濁水溪上有三組主要聯外渡口路線，從上游到下游分別是集集渡——溪洲仔渡、永濟義渡——濁水溪渡和二八水渡——香員渡，他們都是溪北溪南兩岸對應橫渡的碼頭。這些渡口是人們交通往來的門戶，也是他們對我們的信任的象徵。每當人們站在河岸邊，我們能感受到他們的心情，有些是充滿信心的，有些是懷著不安的，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會先來到我們面前，點上三炷香，輕聲祈求我們的保佑。

最上游的北岸渡口叫做集集渡，跨過溪水抵達南岸，就是竹山的溪州仔渡。這裡橫渡的距離短，但是水流最湍急。

永濟義渡位於中游北岸的濁水村，跨過溪水抵達南岸，就是竹山的濁水溪渡，也就是現在社寮紫南宮一帶。那是我最為熟悉的地方，因為這裡有我最虔誠的守護者——董文。他和他的家人為了讓更多人能夠安全渡過濁水溪，付出了無數的努力。



還記得那一年(1854)，香員腳的大水來得突然，洪水如同猛獸一般吞噬了村莊。人們驚慌失措地逃往高處，無助的呼喊聲此起彼伏。當我看到董文毅然決然地站出來，用他的大半積蓄雇用勇敢的濁水村人，帶著糧食游泳去拯救那些被困的村民時，我心中充滿了敬意。我用盡我的力量保護他們，讓他們能夠順利到達村莊，將食物送到那些饑餓的人們手中。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人類的勇氣和善良，也更加堅定了我要守護他們的決心。

這個壯舉當時被人們津津樂道，連住在彰化縣城內的舉人陳肇興，都間接透過竹山的親戚得知，於是寫了《大水行》這麼一首詩紀念傳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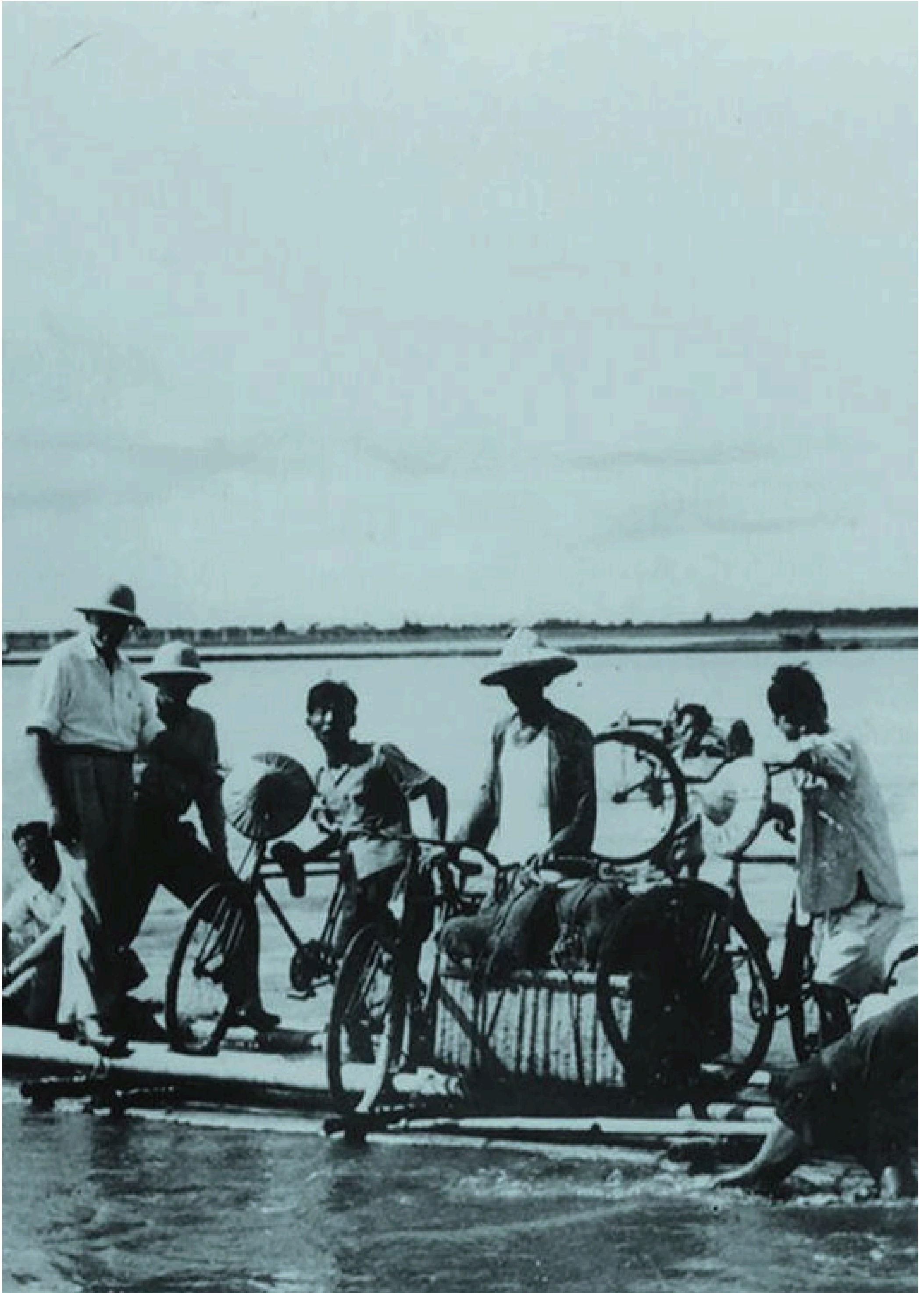


此後董文便企圖說服彰化官員，籌備永濟義渡，讓來往的旅人不用受到船夫的漫天喊價，船夫也不用被逼迫強渡暴漲的溪水，而且不收渡船費，這些我都看在眼裡。後來兒子董榮華接手，官員不但支持，還立了永濟義渡碑公告，並且同時在濁水村跟社寮，兩個碼頭上都蓋了間小廟供奉媽祖，那就是我們，也因為我們守望渡船，所以大家都稱呼我們是渡船媽。



香員渡是最下游的渡口，這裡的河水寬闊，也因為香員腳的沙洲將濁水溪分為二條水流，而最平穩。但在夏季，當濁水溪的水位暴漲時，這渡口也變得險惡無比。我常看到那些挑著擔子、牽著牛的旅人，小心翼翼地踏上竹筏，眼中充滿著對未知的恐懼。他們的祈禱聲在河風中飄蕩，我們聽得清清楚楚。我用自己的力量讓水流稍稍平緩一些，讓竹筏能夠順利渡過。每當看到他們安全上岸，我們心中也感到無比的欣慰。

每次有船要出發前，旅人與船夫都會到碼頭上的小廟，祈求順風順水。香火的煙霧在空中盤旋，那是他們對我的信任，也是我對他們的回應。無論濁水溪如何洶湧，我都會在這裡，守護著他們，陪伴著他們渡過每個艱難的時刻。



多年來，我們看著董文的子孫們繼承了他的心願，繼續維護著這些渡口，守護著每一位旅人。兒子董榮華建起了永濟義渡，讓更多人能夠安全渡過這條大河。孫子董鍾奇也參與了集集長濟義橋的建設，在草嶺和風空地區修建了吊橋，讓更多人能夠安全渡河。我知道，他們祖孫三代是我們最忠實的守護者，我的力量也透過他們，傳遞給了更多的人。



濁水溪上的這三個渡口，承載的不僅是交通的便捷，更是人們對生命的敬畏與對我們的信仰。我陪伴他們度過了無數個風雨交加的日子，看著他們在逆境中互相扶持，看著他們在希望中勇敢前行。

在這片土地上，我與濁水溪共同見證了無數的悲歡離合。溪水的聲音伴隨著人們的日常，從清晨到日暮，從春夏到秋冬。每一次渡船划過水面，每一聲竹篙擊打水面的聲音，都是這片土地生命的脈動。人們知道，濁水溪無法被馴服，但只要我在，只要人們心中懷有信念，他們就能在這條河的兩岸交通往來，與水共生。



香員腳，那片讓我們跟董家結緣的沙洲上，還有著濁水溪每年氾濫留下的濁水土膏——這是人們寧可淹水也要居住在沙洲上的原因。但是當渡船被馬路與水泥橋取代後，交通不便的問題，就讓這裡只剩下兩座空蕩蕩的竹山國小香園分校的校舍。但那片土地上依然留著人們的足跡，每當我們站在河邊，看著夕陽下的濁水溪，我彷彿能聽到過去的聲音，看到那些曾經為了生存而努力的人們。這是一片充滿故事的土地，而我們將繼續守護這些故事，讓它們隨著濁水溪的流水，永遠流傳下去。



